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荣誉出品

2018
总第155期
09
RMB30元/HK$40元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8971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247/G2
邮发代号 80-253
www.dili360.com

CHINESE HERITAGE

中華遺産

最中国的地名


专辑 上

国 中国为何叫『中国』？
地区 『九州』去哪儿了
省 『两广』曾经是『一广』
市 东西南北何处是北京？
县 最稳定的基层
乡镇 塘浦泾浜是江南？

ISSN 1672-8971






中华遗产
再现最美的古典中国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華遺産
梳理华夏文明
叩击历史星空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華遺產

叩击历史星空 梳理华夏文明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期刊

《中华遗产》杂志·月刊·每月1日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 ISSN 1672-8971 **国内统一刊号** / CN11-5247 / G2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丰工商广字第0051号

编辑出版 / 中华遗产杂志社 **社址** /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 **邮编** / 100101

总机 / (010)64865566 **网址** / www.dili360.com **会员热线** / 4006-521-360

主管 /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协办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支持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

定　　价 / 中国大陆·人民币30元
港 澳 台·港币40元

中华遗产·微博订阅号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博号“中华遗产”
关注中华遗产杂志微博订阅号

中华遗产·微信订阅号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遗产娘”
关注中华遗产杂志微信订阅号

中国国家地理畅读·微信小程序



随时随地畅读《中国国家地理》《博物》《中华遗产》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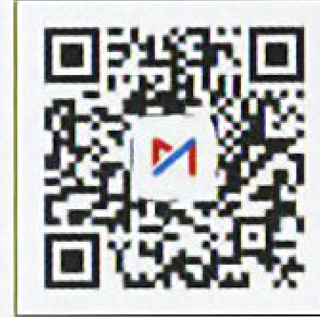
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使用

中国国家地理·微信订阅号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dili360”，关注中国国家地理微信订阅号

中国国家地理 ● 手机视频



探索未知世界　寻觅自然奇观
观看方式
安卓手机用户 下载“咪咕视频”客户端：
导航>合作专区>中国国家地理
即可安装中国国家地理手机视频客户端
无限精彩 尽在中国国家地理手机视频
观看节目2元 / 条 包月15元 / 月(不含GPRS流量费)

特别承诺／本刊凡出现印装差错，一律由印厂调换。
制版 /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3号
印刷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 100176　**电话** / (010)67876655



地名，你可以视之为活化石，它凝固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地理、人文的认识；它更背负着人们对故土、家乡情结的付托，随着移民而流浪；或者，它也是一条通道，联结了今天的我们和过往的历史。




10


20

地名之理

国

地区

省

市

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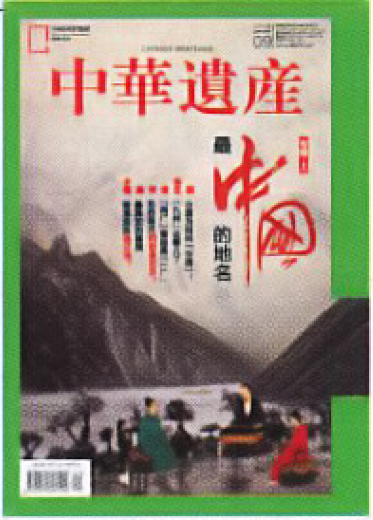
乡镇街道

地名之最

封面故事

地名是地理与人文碰撞的结晶，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图为创意摄影《三峡游记》。古画中人仿佛穿越时空，在三峡听琴，长江泛舟。与解读地名异曲同工。

作者 / 黎明



请君只看洛阳城

撰文／黄秀芳

地名如人名，不过其得名原则更为复杂多样。一地之名从何而来？专家学者说，或是因自然造化，或是由人文赋予。比如山东的泰山，古时又曰太山，太即大之意。“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可不是大吗。

地名既产生于自然或人文，无论繁简，就都负有一地的自然或历史信息。因此华林甫教授在其《中华地名史话》一书中有很精要之句：“地名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名之重，尽在其中。

地名有多重？请看看位居中原腹地、史称“天下之中”的洛阳的前世。

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方位名称——阴阳，山南、水北为阳。洛阳即位于洛水之北。然而孰知，洛阳最初竟以山名，称郏鄏（Jiárǔ），郏，为雒（洛）北山名。当时谁在此居住？传说是黄帝。但郏鄏一名，却不是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有载：“成王定鼎于郏鄏。”周公在洛阳营建陪都成周，建成后将九鼎放置于此，以示定都。郏鄏到西周时仍在使用，遑论其前。

到夏朝太康为王时，传说太康赶走了斟鄩（zhēn xún）部落，又就地建都。《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史书，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太康、后羿、夏桀，曾先后在斟鄩统治夏人。

斟鄩在哪？伊河与洛河交汇的洛阳盆地。为啥如此肯定？因为是周武王说的。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首都偏居西北，对殷商遗民难以掌控啊。于是他对叔叔周公旦说：“自洛汭（ruì）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从洛水到伊水之间，平坦无阻，那是夏人住地。周武王又说，我曾经南望三涂山，北眺太行，回看黄河，只有洛、伊之间，离天下之中不远，最宜建都。洛阳的地利，使其始终受青睐。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寻找“夏墟”，结果位于古洛河北边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惊世而出，而其地望与斟鄩恰好相合。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等等符合王都的要素，学界基本认为偃师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那么，洛阳曾经叫斟鄩？

“洛”何时到来？在殷商的甲骨文中有[illegible]，为水、河加各。在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里，有人认为它指的就是洛水。“各”意为“十字交叉”，那么洛就指河水似网络状流淌。洛水在汇入黄河前，一路有涧水、伊水、瀍水汇入，确实如网。商汤灭夏时，在夏墟旁建了新都，叫西亳（bó），西亳即今天的偃师商城遗址，其西南6公里，便是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说，在甲骨卜辞中，商王居住的城邑，称“洛”或“洛师”。那么，洛阳曾经叫西亳？

周武王在天下之中洛阳建新都的愿望，后来由周公实现了，即成周洛邑。成周既立，有造反之忧的殷商遗民，也被迁往新都，偏居西北的周人，西有镐京，东有洛邑，东西两京首尾相顾，周的江山稳如磐石。而当“洛邑”到来时，“洛阳”之名也即将浮出水面，那是在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因地利而承载了夏商周三代历史之重的洛阳，还有新故事。

九月令

节气

白露

南京人喝白露茶、酿白露米酒

福州人吃龙眼，温州人吃十样白

太湖渔民祭禹王

秋分

祭月，竖蛋，吃秋菜，送秋牛图

节俗

中秋节

安徽堆宝塔，香港舞火龙

苗族跳月，傣族拜月

侗族偷月亮菜，高山族跳托球舞

是月词

凭高眺远

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

桂魄飞来光射处

冷浸一天秋碧

玉宇琼楼，乘鸾来去

人在清凉国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

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

起舞徘徊风露下

今夕不知何夕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

何用骑鹏翼

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念奴娇·中秋》——宋·苏轼



《龚野遗墨迹·十二月令山水图册之九》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九月入秋，天气转凉，凫鸟远去，鸿雁欲归。在画家龚贤的笔下，地处南方的金陵（南京），山野间不见飞鸟，石苔林木亦不似炎夏时那般浓郁。汩汩泉瀑从远处山腰上流泻而下，拍打着山脚的碎石，汇聚成浅浅溪流，蜿蜒淌过近处的孤岛。隐匿于山中的三两间茅屋，虽未见人迹，亦不难想象其主人坐拥这一方美景的快意畅心。

龚贤（1618-1689年）
明末清初画家，“金陵八大家”之一，作品不拘古法，被后人奉为一代独创主义大师。

最的地名



地之有名，如人身有衣。地名，你可以视之为活化石，它凝固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地理、人文的认识；它更背负着人们对故土、家乡情结的付托，随着移民而流浪；或者，它也是一条通道，联结了今天的我们和过往的历史。地名之价值意义何在？地名产生之道理何在？从这里，读懂『最中国』的地名。

川峡四路
行省
直隶
江南西路
河北路
广南东路
山东东路
两浙东路
岭南道
江南道
省

应天府
南京
市
扬州
北京
京师
河南府
洛阳
顺天府
西安
开封
津市
荆州
徐州

息县
权县
那处
绛县
蓝田
县
秭归
鄠邑
眉县
猗氏
武功
华阴



中国地名何处来？

撰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 魏大帅

地本无名，名由人造。中国地名源远流长，其中隐藏着什么有趣的信息？

霞浦

县境西南有霞浦江，东流入海。又有霞浦山，海中有青、黑、元、黄四屿，日出照映，江水如霞彩。故山以江名，县以江名。

《霞浦县志》

地名如诗

图为福建霞浦的海滩。“霞浦”之名，和它的景色一样优美，如此诗意的地名，在中国遍拾皆是，如雁荡、云栖、瑶琳、仙游、灵隐……虽未身临其境，也能从地名中感受到梦幻般的美好意境。

供图／视觉中国

地名的诞生

地名是一种生存技能。动物对自己生存和活动的环境都有一定的记忆，或曰领地意识。这是动物的本能。比如大草原上的狮子，能辨认去哪里狩猎、去哪里喝水，也能找到回家育仔的路。它们通过咆哮和尿液气味标记领地，这种独特的气味，就是狮子们在大草原上标记的“地名”。

人类也不例外。考古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迹，多在水旁河谷，即证明早期人类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着特定的需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说：“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打猎，到何处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地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还必须知道气候的特征以及地方的种植的可能性，他们不但要辨别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当人们为了和同伴交流，对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标记，地名就诞生了。

一个地方有了名字，就有了人气，不再蛮荒。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下游流域，由于战国以前没有统一的河床，经常是洪水滔滔，泛滥横流。人们不得不居住在地势高亢的地方，躲避水患。渐渐的，在这种高坡台地上就形成了聚落，被人们冠之以“某丘”之名。这种地名，象征着居住的安全，直到现在，这些地区还保留着众多含“丘”字的地名。相应的，黄河中游地势稍高，没有太多水患，人们便选择在地形平坦又近水流处居住，所以这里的地名多含“原”字。

土方打到哪儿了？

下图为商代甲骨文，其中有一句“土方征于我东啚（鄙），𢦏（灾）二邑。𢀛方亦帚（侵）我西啚（鄙）田”。其中的“方”“啚”“邑”“田”都是典型的地名用字。这句话详细记录了异族入侵的具体地点，从中也可以看出，商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地名系统。



土方征于我东啚（鄙），𢦏（灾）二邑。𢀛方亦帚（侵）我西啚（鄙）田。

——土方侵害我国东部边境，毁坏了两个小邑，𢀛方也侵害了西部边境的田稼。

单字地名不够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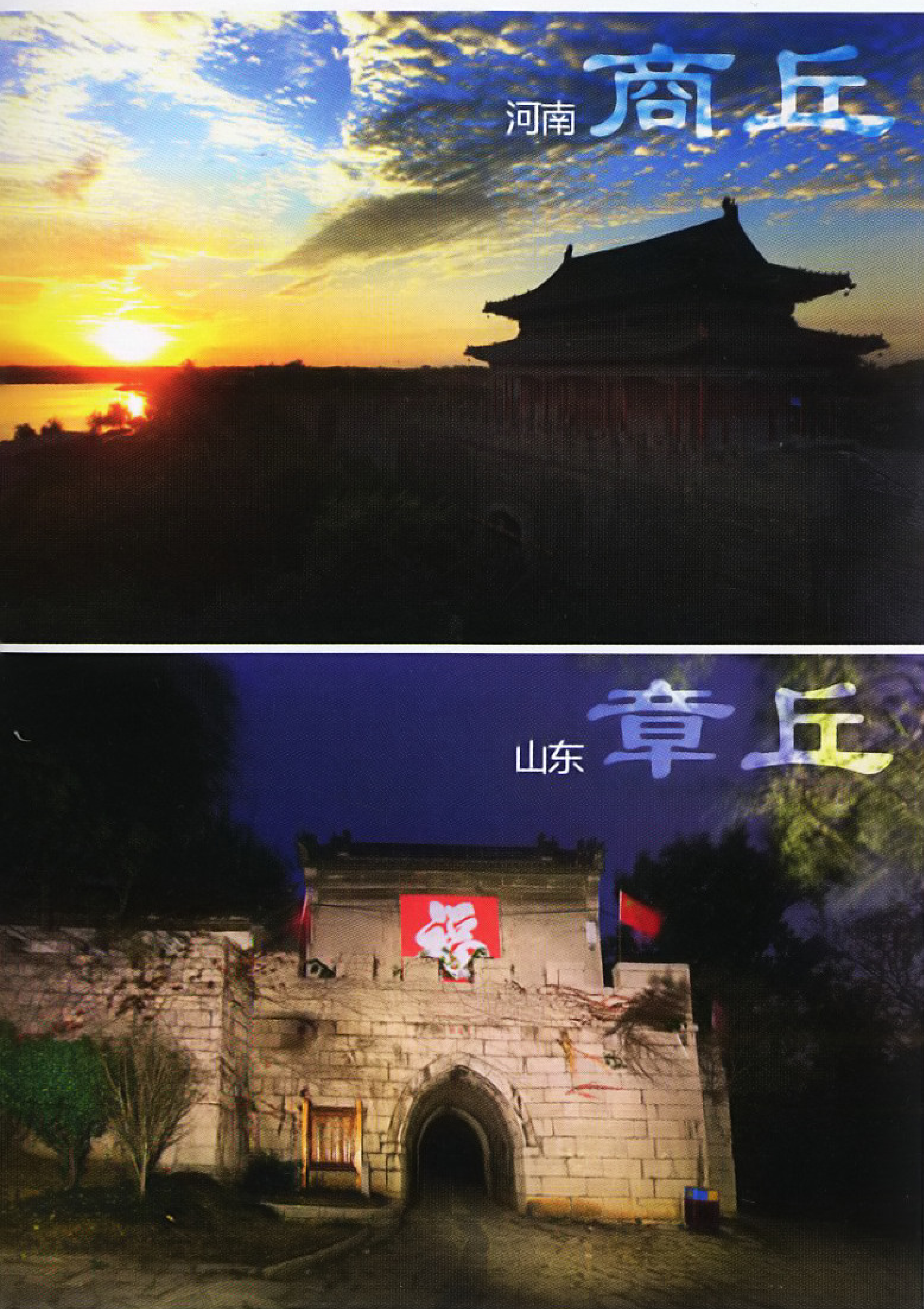
在早期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对地理事物的认识能力也不足，所以地名大多以单字的形式出现。比如“河”特指黄河，卜辞中的“商”表示奉有商人祖先宗庙的城邑。后来，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单字地名已经不足以涵盖全部的地理范围。为了避免重复，就在单字地名的前后加上修饰性的单字，构成双音节地名。如“商”被加上了表示方位的“中”，成为新的地名“中商”，以此与东南西

北四方区别开来，表示王畿附近，商王国的中心区域。商朝的都城殷墟附近有一条河名叫“洹”，后来加上方位字“东”,就形成一个新的地名“东洹”。到殷商后期，又发展出“大邑商”“天邑商”等地名，表示对王都的尊称。最后做为基字的“商”，代表的范围反而扩展成了整个商王国。

春秋战国时期，国人对全国的地理形势已经有了很直观的认识，对全国主要的山脉、河流、湖泊等地貌形态,都赋予了唯一的名字。读《山海经》,就能看到很多生动的地名，而且空间跨度非常大。

地名中的考古密码

中国地名的源远流长，是其他文明罕有匹敌的。



早在先秦时代，先人们标记的自然地理地名，往往代代相传，成为后世政区名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西汉时期泰山郡的蒙阴县,《汉书·地理志》称其县名来源时指出,“《尚书·禹贡》：蒙山在西南”，山北为阴，所以在蒙山东北侧的县名就叫作蒙阴。《禹贡》中有“九江孔殷”（意为水势盛大）一句，所以后世就设置了九江郡、九江府等政区。

再往前追溯的话，甲骨文中的许多地名都延用至今，比如“京”“亳”“郑”“卫”等。还有“邑”“丘”“单”这些字，属于通名，类似于现在的“省”“市”“县”，我们只要在前后加字就形成了某地特有的“专名”,比如“唐邑”“丘商”。这种“专名+通名”的命名方式，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国的地名有着数千年的积淀，所以有的考古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会特别注意打听、研究当地的地名，从中发掘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比如，如果一个地名里有



黄河下游许多“丘”

先秦以来，黄河下游地区洪水频发，人们只好居住在高坡台地上以避水患，渐渐的，这些聚落被冠以“某丘”之名。这些地名，代表了人们对安居的追求，直到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还有很多含“丘”字的地名。

摄影、供图/魏文慧、视觉中国、东方IC

名词解释

通名与专名

地理通名，指的是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地理实体，如“江”“海”“省”“市”。地理专名，是区别通名的特定名称，如“鸭绿江”“渤海”“广东省”“成都市”中的“鸭绿”“渤”“广东”“成都”。有的通名曾经作为专名用，如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江”就是长江的专名，“河”就是指黄河。也有一些通名固化为专名，比如“州”，有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名固化为专名后，又加上了新的通名——“市”，变成苏州市、杭州市、扬州市。

“坟”“陵”“岗”“都”这些字眼，就要留心了，这里可能有古代墓葬、建筑的遗址。比如夏朝的王城冈遗址，就是因名而发现的。

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叫做“亳”，将一些迁移居住过的地方也命名为“亳”，所以这个地名就反映了商人族群的分布和迁移的历史。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宋代灭亡后，由于黄河屡次泛滥，泥沙淤积，逐渐被深埋在地下约3-10米，城址无从考证。据史料记载，东京城东南有一座水门，因汴河水经此通向扬州，所以俗称“扬州门”。考古工作者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开封城的东南方有一个“杨正门村”，推测其是从“扬州门”演变而来。经过挖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东京外城的东南角。这种情况很多见，古代城市、建筑都不见了，地名却保存至今，为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线索，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地名考古学”。

自带画面感的地名

汉字是表意的，所以汉字地名不止是一个空间范围的代号，它本身也具有丰富的含义。一个美好的地名，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

中国的很多地名都是诗化的，充满了画面感。比如仙居（位于浙江，原名永安，宋真宗以其山水秀丽，“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下诏改为仙居），弥渡（位于云南，民国《云南行政纪实》中说：“古时溪河横流，行人迷渡，因名迷渡。后以迷字欠雅，更名弥渡。”），雨花台（位于南京，相传梁武帝时期，有高僧在此设坛讲经说法，讲到精彩处，漫天落花为雨，落地为石，遂称雨花石，此地也得名雨花台）等。看到这些地名，你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一幅幅美好的意境，心生向往。

用地名“重构”世界

当人们把美好的词赋予一个地方，地名本身也与当地的风景一起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得益彰。比如坐落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原名“落袈山”“罗家山”，本是一座普通的小山。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先生嫌它太俗，巧用谐音的方法改成“珞珈山”，顿时美感爆棚，如今是一处名胜。

佛经中有“布怛洛迦”一词，意为光明山，是观自在菩萨的居处。浙江舟山的“普陀洛迦”（即普陀山）和西藏的“布达拉”，都是由此音译而来。“珞珈”与此谐音，游人走在花繁林茂的珞珈山中，或许会产生置身佛国的想象。这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特殊观念，用日本汉学家武田雅哉的话说：“当中国人有条件自己构造出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设计出来的世界，看起来是师法于自然，但其实又跟真实的自然完全不符，而是带着非常强的人为的设计感，而这种设计，真正的原型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理想世界。”

“普陀洛迦”“布达拉”都是如此，人们通过赋予地名，将自然界的一座海岛、一座山峰“构造”成了理想中的美妙佛土。

中国人对“名”有一种执念，相

链接

甲骨文的地名用字

在现有的约5000个甲骨文字中，有500多个地名用字，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类。自然地理类，涵盖了河、泉、山、阪麓等地形地貌，人文地理类则包括城郭、房屋等人工建筑。甲骨文最重要的造字方法是象形，这为汉字地名赋予了独特的画面感。



泉：泉水因为数量多，且规模一般都不大，所以有必要加上前后限定词，以便对某一具体的泉水定位。如“西泉”、“来泉”、“洹泉”。



河：河单独用时，一般特指黄河，由河衍生出的地名有“河东”、“河邑”等。



丘：指一般的高地或台地。商人的活动区域在黄河下游，这里地势相对低洼，河水常易泛滥，所以商人多居于平原上地势稍高处，以避水害。由此产生了许多带“丘”字的地名。



山：只能用做通名，不能用做专名。甲骨文中出现的山名有“九山”“三山”“小山”等。



京、亳、高等字可能来源于商代上层人物的高层建筑。



甲骨文的“郭”为一个城池的形象，本是一个地名字，后来成为姓氏。周代的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是为郭姓的一大源头。

信有其名必有其实，诸子百家有“名者，实之宾也”“按实定名，循名责实”“制名以指实”等等论述。地名，是中国人改造现实、“构造”理想世界的一种方式。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是崇尚自然，喜欢天然的山水、草木、花鸟、云霞，反对人工造作。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古代的名士们恰恰最热衷于给自然景物题名。脚步所到处，山崖、石壁上留下了无数题刻和诗文，而且非常富有想象力。比如，天然的岩洞，被比附为仙界的“三十六洞天”，名之曰“洞灵真天”“极玄大亢天”“紫玄洞照天”等等。山河岩洞题满了以后，连形状奇异的古树、怪石也不放过，题名曰：老人峰、关公挡曹、周王拉车、仙人下棋、童子拜观音……就算是悬崖峭壁，也要冒险爬上去刻满文字。这种行为，在别国可能会被指责破坏自然，但中国人却习以为常。

给山川丘壑题名，是中国人征服自然的方式，人们巡游其间，仿佛造物主给自然万物取名字。而且，这些名称所包含的思想和意趣，远远超出了自然景物本身，成功地按照人们的理想“重构”了自然。用武田雅哉的话说，只有经过如此命名的事物，才具备了欣赏的价值，反之，“不经比拟即非自然”。

责任编辑／陈伟峰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中国地名如何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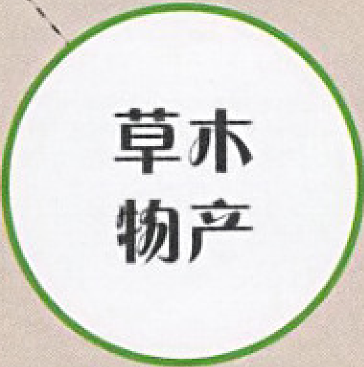




即由两个不同地名组合成的新地名，如江苏由江宁（即南京）和苏州构成，广东封开县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成。



地名中，受山水影响的占了绝大部分，其中不乏很多直接以山水之名为地名的情况。如五台县因五台山得名，澜沧县以澜沧江得名。







或是假借所谓的祥瑞征兆，如宝鸡、麟游；或是希冀长治久安，便带有"宁、安"等字眼；或有绥靖镇压之意，如抚远、靖边、定西等。



商周时期的方国虽久已灭亡，但往往国名化为地名，留下深刻的烙印。让后人可以根据县名获知故国之所在。



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因中国处于北半球，且山水多呈东西走向，故山之南与水之北向阳，反之背阴。



以山、水、关为界，按照方位，划分出不同区域，如河南、河北、河东、河西。前二者至今仍为省名，后二者曾是历史上的政区之名。



来自于建置之时的帝王年号，如浙江绍兴、福建政和、上海嘉定，瓷都景德镇因宋真宗景德年间设置官窑而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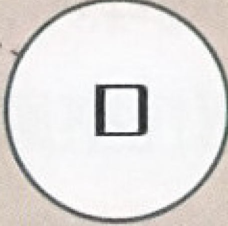




回避帝王名讳，是帝制时代的特色，地名也不例外。如启封避汉景帝刘启之名改称开封。













呈线条状的河流界限明确，不同段位都投射在地名中。河流源头处为"某源"，如浑源、婺源、济源等；位于水边，取"临""浦""皋"等字，如临汾、临潼、临川等；河流汇合处多用"合"，如合肥、合川、合漳；河流盘桓曲折处用"曲"，如河曲；与"源"相对，下游或出海口多称"门""口"，如海门、江门、江口等。



近现代为了纪念革命先烈，靖宇、左权、黄骅等县市被改为今名；任丘、尉氏等地源于历史人物；黄陵、灵丘等则是源于人物陵墓。



汉武帝东巡至闻喜时，闻南越大捷，改名闻喜；再至获嘉时，闻南越吕嘉叛乱伏诛，遂以地置县，赐名获嘉。此类地名因一具体历史事件而产生。

参考资料：陈正祥《中国地名的分类》



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多少地名？追溯古籍，甲骨文记载500余处，《汉书·地理志》涉及4500多，《水经注》记载达1.5万，宋元以来地方志约有500万之多……地名之多，分布之广，令人咂舌。但是幸亏它们是有迹可循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陈正祥等人，都曾探讨过中国地名的分类。左页图表展示了分类的具体条目，本页地图标注了其中几类，地理与人文对地名的影响清晰可见。
图例
呼兰 山水地名
榆林 草木物产地名
济南 方位地名
宝鸡 寄意地名
绍兴 历史纪念地名
宝鸡：因春秋秦文公之时，有陈宝鸡鸣之祥瑞，唐肃宗时改名宝鸡。
凤翔：凤鸣岐山，故名。
麟游：隋时仁寿宫中获得白麟，遂以此称县名。
济水是古四渎（江河淮济）之一，后被黄河改道侵占，遂消失不见。然而因济水而诞生的济源、济宁、济南、济阳等地名，是济水曾经存在的最佳明证。
牧野之战后，周天子分封天下，《荀子》载，共立七十一国。它们集中在以陕西、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带，现在这片地区的许多地名都可以追溯到这些诸侯国。
以年号为地名始于东汉末年，两宋时期达到了高潮。留存至今的年号地名共10处，除这里标注的外，还有河南登封、陕西淳化、江苏宝应，其中宋代的就占了8处之多。
当早期汉文化向民族地区蔓延发展时，中原王朝设置的郡县名称，便多带有浓重的儒家教化色彩。在现代文明意识影响下虽颇多改易，但仍有一些留存至今。
呼伦贝尔
呼兰
辽源
辽阳
滦县
滦南
榆次
五台
榆林
榆社
济阳
济南
济宁
济源
麟游
宝鸡
凤翔
新郑
商丘
上蔡
息县
邓州
随州
海门
嘉定
绍兴
合川
湖口
景德镇
庆元
政和
永泰
兴国
遵义
江口
昭通
彝良
修文
安顺
安宁
三水
江门
黑龙江
嫩江
呼伦湖
贝尔湖
呼兰河
松花江
长白山
西辽河
东辽河
辽河
老哈河
滦河
永定河
渤海
黄河
太行山
青海湖
渭河
秦岭
洛河
淮河
黄海
东海
嘉陵江
渠江
涪江
岷江
汉江
长江
太湖
鄱阳湖
洞庭湖
沅江
资江
湘江
赣江
雅砻江
大渡河
红水河
北江
绥江
西江
南海

石钟山之名
苏轼的误会

撰文／苏蘅

苏轼在探索石钟山的得名之后，自认为获得真知，甚至还不忘嘲笑前人几句。然而，在后人进一步的探访中，苏轼也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但古人何以对一个地名的来源投入如此之大的热情？

元丰七年（1084 年），苏轼行经湖口（今江西九江湖口县），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顺路游访了位于此地的石钟山。由此诞生了一篇千古名作《石钟山记》，讲述了自己探究石钟山得名缘由的故事。有趣的是，对于石钟山得名的探索，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竟持续了一千多年，苏轼只是其中的一个“过客”。

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探险家，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录了他的观点：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在他之后，唐代贞元十四年（798 年），隐居庐山的白鹿先生李渤寻访石钟山，在水潭中遇到两块石头，叩击之后皆发出声音，一块清脆响亮，一块厚重模糊，停止敲击后，余声经久方歇。因此作《辨石钟山记》一文，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得名之由，郦道元错了。

与两位前辈相比，苏轼更具探访精神，月明深夜，在山石“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恐怖氛围中，苏轼乘舟直至绝壁之下。所见也因此别有气象：山下多穴罅，水波涌进，有“噌吰”之声如钟鼓不绝；且大石中空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二者相互呼应，苏轼恍然大悟。

在《石钟山记》中，苏轼感慨道：“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苏轼探求得来的缘由，和郦道元差不多，但更为详细。然而，当苏轼提笔嘲讽李渤时，或许想不到数百年之后，自己也会沦为他人嘲讽的对象。

乾道三年（1167 年），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泛舟湖口，他发现石钟山由南北两山构成，分别称上下钟山，上钟山有一石高四尺，扣之硿硿然；下钟山有一石宽一丈多，叩击有声，其他石头却不行。因而周必大认为李渤之说或有根据。

直到此时，人们均认为石钟山是因声得名，只是对声的来源分为两派：风水石的共鸣发声说，石头叩击有声说。到了明清，有人更进一步地提出另一类观点：因形得名。

仍旧是地理学家打了头阵。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地理学家罗洪先经过湖口，此时湖面尚未涨水，山麓尽出。罗洪先沿山麓攀爬，又入其中，发现此山里里外外都像钟的形

状。原来如此。于是他批评苏轼没看到全景，难怪有失偏颇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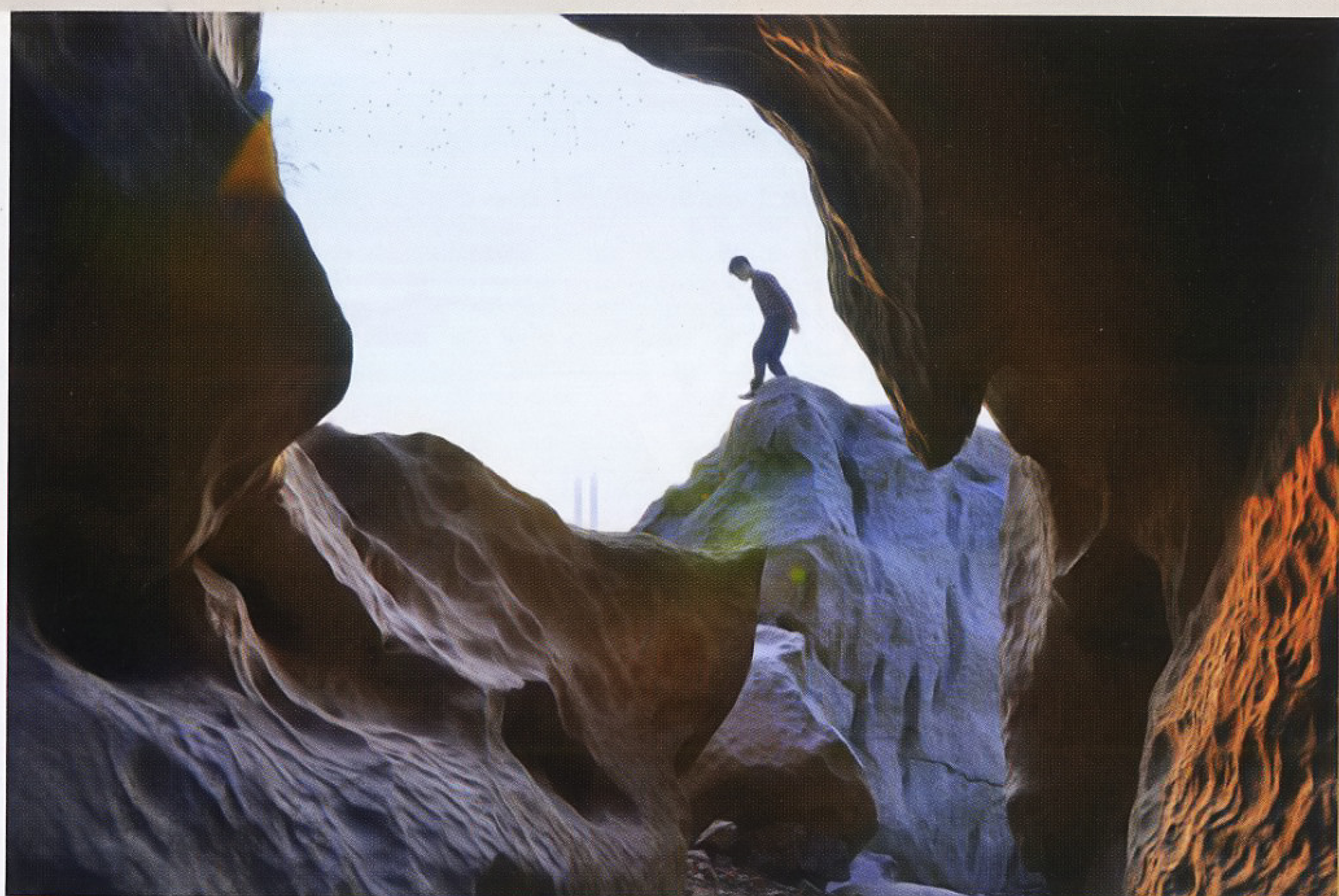
清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大将彭玉麟在与太平军征战之余，也颇有闲情逸致地追复先哲脚步，来到石钟山。彭玉麟发现："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形论而不以声论。"两年后，彭玉麟和曾国藩再度登览石钟山，曾国藩作了一番"打脸式"的评论："东坡叹李渤之陋而不知坡亦陋也。"

彭玉麟的总结，给持续一千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但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区区一座石钟山，古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探究其名称来源？有一个与石钟山有相似的故事。

重庆下辖有一个大足区，"古昌州地志"解释说，当地土地肥沃，人民生活美好，以至于身体肥胖，连脚也大了，故称"大足"。这个解释无论怎么看都令人觉得奇怪。有道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明代时就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此人名为郭子章，隆庆年间进士，好出游，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可谓徐霞客的先行者。当他来到大足时，县令道出的说法和志书完全不一样：这里土地贫瘠，人民贫苦，以至于经常逃避赋税。之所以叫大足，或许是因为山中有巨人足迹。这个说法也很不合情理，郭子章在翻阅了一番史料后，终于获知真相：唐代武则天时有年号为大足（701年，使用了10个月），此地正是唐代所设置，故而以此命名。

无论是石钟山，抑或大足，其实都凝聚了同样的内核：地名来源。早在东汉初年，史学家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对一些地名的渊源做了解释，如瓜州得名于"地生美瓜"，这是人们探究一地之名的开端，此后，这一精神得到了后人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明代，一部阐释地名渊源的集大成之作诞生了——《郡县释名》，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郭子章。此书第一次将散见于地志、官私史书、档案中的地名解释，汇编在一起，同时进行综合研究，探求地名发展的规律。

可以说，地名的本义固然重要，但对其本义的探索，从另一个维度彰显了地名的价值。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探索地名的古人）在地名丛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给地名注入了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





因形得名

在苏轼等前人求索基础之上，明清时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石钟山是因形得名。正如上面的两图所示，石钟山山势上锐下宽（下图，供图/视觉中国），内部呈空穴状（上图，供图/东方IC），内外俱似钟形。但是，只有当枯水期或落潮时，人们才能进入内部洞穴之中，窥探其形。这也正是苏轼无法探求真相的直接原因。

责任编辑/安洋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刘扬



故土难离

2018年初，西安、天津等地推行的落户新政策，人们戏称其为“抢人大战”。截至5月14日，已有40万人落户西安。这40万迁居西安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按照今天的话来说，是新西安人。在如今，人口的流动已不算稀罕，对于个体而言，定居一线城市，还是件高兴事。“故土难离”也几乎不被提起。但在古代，大规模的迁居、移民多出于无奈，往往伴随着血泪与战火。图为擅长“侨乡移民题材”的旅美华人画家司徒绵的油画作品，描绘的了晚清移民登上轮渡遥望故乡的场景。
作者／司徒绵

罗浮路
泉州村
晋江里
粤秀路
新广路
陈家宅

跟着地名走的 故乡

撰文／寒天

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移民中，除了带走金银细软，人们更把家乡的名字一并带走。故乡的痕迹，被留在了地名上。重庆的“里”多为湖广填四川时的湖北移民命名，上海的“宅、巷”代表北方移民，而“弄、库、里”代表南方移民。如果说，沉积岩层是记录地质历史的书页，那么地名，则是先祖在移民时留下的脚印。

吴家厅
严家角
泰山新村
河州工村
铜安里
安溪里

会馆记忆：
湖广填四川

洛带镇坐落于成都东郊。明清之际，一群客家人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迁到此地。于是洛带出现了广东、江西、湖广、川北四大客家会馆。下图的地方戏表演，就在洛带湖广会馆内。是清代湖广籍（今湖南、湖北）移民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捐资修建的。其下那座黄色琉璃瓦盖顶的建筑，是广东会馆，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广东籍客家人兴建。

摄影／余茂智

刘太公最近闷闷不乐。

身为人子，刘邦有些纳闷：自己真刀真枪打下了江山，一统天下，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连带着自己的爹也从普通的老头一跃而成太上皇，过上了神仙一般的日子，怎么老头儿反而不高兴了呢？

"老爷子当初在家乡丰县（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住着的时候，身边都是贩夫走卒，天天斗鸡踢球，以此为乐。现在住在长安的深宫里，哪儿还有这种乐趣呢？"太上皇身边的人一席话，让汉高祖恍然大悟，原来父亲大人是犯了思乡病。要说高祖手笔也是真大，为了哄父亲开心，直接在长安附近的骊邑（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造了一个和丰县一模一样的城。高祖大手一挥，丰县的男女老幼全都搬到了新城，连狗羊鸡鸭都带来了，由于新城的街巷布局、房屋建筑实在太像旧城，动物们一进城，就纷纷进了自己的"家门"。左邻右舍老朋友全都在身边，曾经的娱乐活动也去而复返，太上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座城被命名为"新丰"，由于城里的居民并非世家子弟，都是普通的乡下人，后来留下了"新丰多无赖"的名声。因为是"新的丰县"，所以将城命名为"新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一个简单的名称，正说明了两座相隔几百公里的城市的渊源，至今，丰县仍然是丰县，而新丰则变成了"临潼区新丰街道"。

丰县到新丰的移民规模并不大，但因是皇帝家事，遂被记录在《西京杂记》中，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但地名随移民一同迁徙的故事，在历史上不只有新丰。

南徐州
"漂浮"的侨州如何落地

如新丰一样，将故土之名原封不动地冠在新家，就仿佛自己从未背井离乡，也许是很多移民聊以自慰的方式。可惜，如高祖筑新丰这样喜气洋洋的移民事件，在中国移民史上少之又少，"安土重迁"的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血液中，因此世上大规模的移民，或者是为戍边、躲避战乱，或者是为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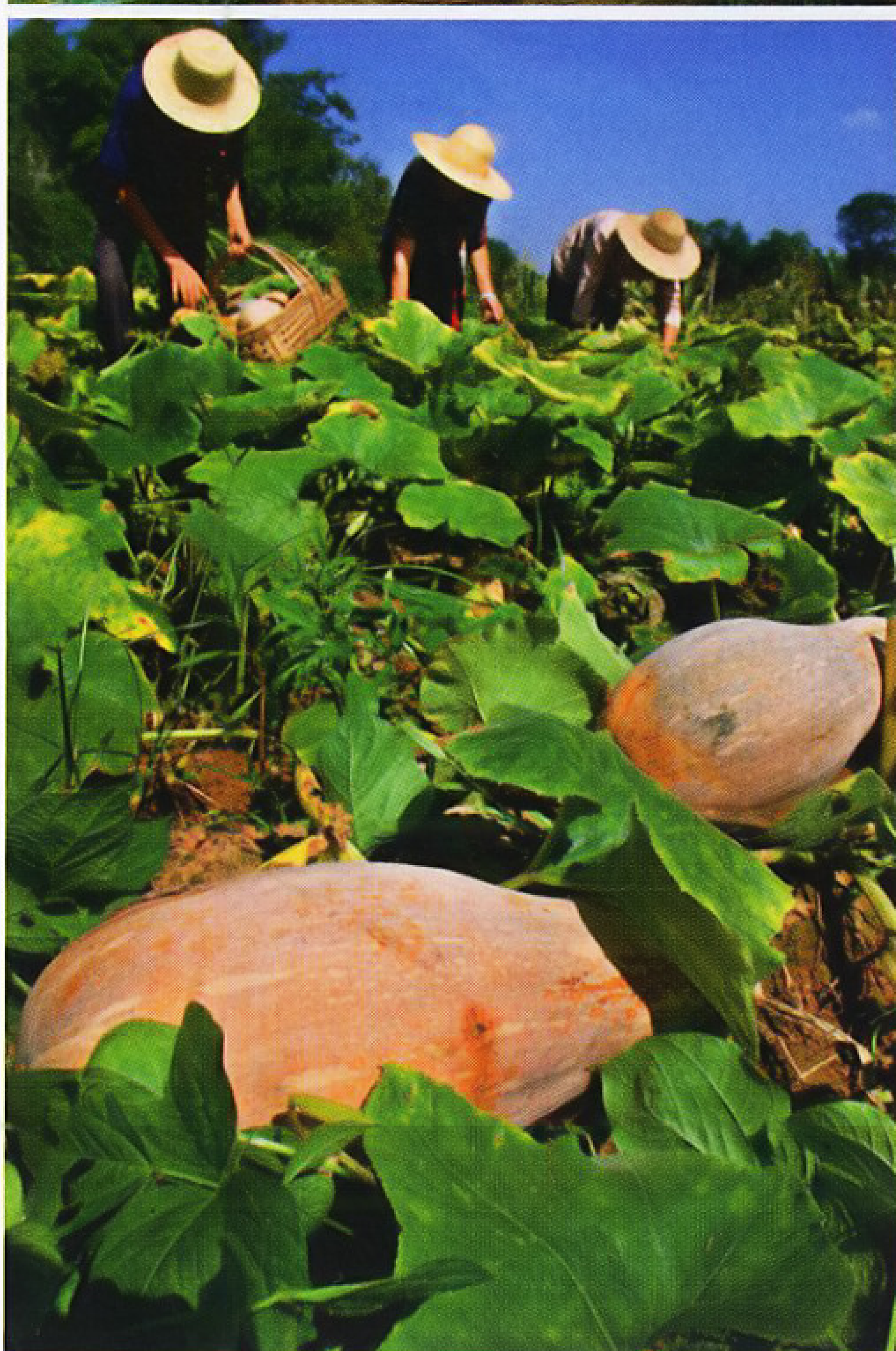
翻检《宋书》，可以见到一条有意思的记载："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和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是什么关系？这就要从衣冠南渡引发出的侨州郡县问题说起了。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此后，西晋帝室南迁，建立东晋，世家大族也随之迁徙，往往是举族行动，规模庞大，据学者葛剑雄估算，进入南方的人口超过百万。东晋政府对这些人的管理方法是，设置一批侨州郡县，即把北方原郡县地名，原样照搬到南方。这样流亡士族得以保持自己的籍贯，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如司州弘农郡人流寓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北省武穴市间长江两岸地），因此在寻阳侨立弘农郡；徐州琅邪国人随司马睿渡江，因此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侨立琅邪郡。《南齐书》记载，其总体原则是"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皆取旧壤之名"。

当然，这些侨州郡县并没有实际的领土，只是和当地政府平行于同一块土地上的另一套政府机关，专门管辖侨人而已。

听起来容易，可实际实施时，其混乱程度超乎想象。魏晋时期，各地大体沿袭汉末形成的州、郡、县三级体制，设置侨郡，使全国一下子涌现出十几个侨州、上百个侨郡、几百个侨县，数目多得让人都说不清。南朝史学家沈约在写作《宋书》时就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







由于两百年间战乱频仍，移民一波一波地进入南方，侨州郡县的名称因此也不停地更换，政府不断尝试合并郡县，但又试图把原有的土地割出一块，让侨州郡县真正落地。当时南北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南朝时而收复一些北方失地，转瞬又得而复失，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使得时至今日，研究者依然难以还原每一个地名的流转过程。

再说回《宋书》那句"南徐州备有七州之地"这句话，"南徐州"自然就是徐州的侨州了，最初永嘉之乱时，幽、冀、青、并、兖、徐州的流民，相率度过淮河。当时徐州的辖区大概包括今江苏长江以北和山东南部地区，

物种记录移民史
除了地名忠实地记录着这里的移民痕迹，我们的餐桌上也有着记录者。上图中的辣椒、玉米、南瓜都是外来物种。它们的种子大约在明朝时就已飘扬过来来到中国。只是这些植物在四川境内大面积种植，几乎都与"湖广填四川"发生在同一时期，可以说，这次移民浪潮，对于改变四川的饮食，有着特殊的作用。
摄影/余茂智

徐州的淮南部分并未沦没，于是东晋政府就在徐州的淮南，又侨立幽、冀、青、并、兖其他五州。

晋安帝义熙中，刘裕北伐，收复了徐州全境，但此时政府决定保留淮南为徐州，而将新收复的淮北称为“北徐州”，也就是说，原来徐州的辖区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州。可毕竟淮北才是原来徐州的州治所在，于是刘宋永初二年（421年），国家决定恢复徐州的淮北部分“徐州”的称号，而淮南部分则改称“南徐州”。

“南徐州”的州治在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镇江市，因此京口一度也有“南徐”之称。至于之前侨立的幽、冀、青、并、兖五州，则被不断地省并，最终留下了一个南兖州拥有实土。此后历经宋、齐、梁、陈，各州不断更名，直至隋统一全国，方才重新厘正全国混乱不堪的行政区划，如“南徐州”这样的名字，也永远地消散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南徐”作为京口的代称，还偶尔以典故的形式出现在后世的诗文里。

在此后的历次移民中，如侨州郡县这样复制粘贴式的重命名似乎并不多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放弃了故土之名，虽然州、郡、县的名字难以更改，但对于小如村、巷、弄堂，移民们仍握有一定的命名权，这也成为后世移民地名的主要命名方法。

上海：来自全国的后缀

初到上海，对着地铁站名会有些恍惚。娄山关路、金沙江路、常熟路、昌平路、西藏南路、曲阜路……不过短短几站，好像已经走遍全国。不过可别被上面的“复制粘贴”误导了，这些路名和移民没什么关系。

1863年，英、美租界决定对租界路名进行调整，因租界为两国共管，为了避免矛盾，便决定使用中国的行政地名来命名，规则是以省命名南北方向的路，如新疆路、西藏路、云南路、广西路；市则是东西走向，如南京路、北京路、贵阳路、九江路……唯有东西向的广东路是例外，广东路最初的英文是“Canton Road”，后因“Canton”与“广东”音近，便译为广东路，成为异类。

“广东路”与广东移民无关，但广东移民依旧给上海带去了广东地名。

自1860年以来，大量广东籍的买办、商人踏入上海这个新兴的全国外贸中心，他们大都聚集在虹口区，尤其是四川北路南部的福德路、北部的东武昌路，广东移民在此开设商店、酒馆、茶楼，连店里的留声机放的都是《步步高》《雨打芭蕉》这样的粤音。走进这里就像到了广东，这两条路也就被称为“广东街”。1918年，附近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便直接被命名为“广东街”，解放后又更名为“新广路”。祖籍广东香山县的著名女影星阮玲玉便居于此，从小身边人说的都是粤语。阮玲玉最终卷入前夫张达民、情人唐季珊的纠葛中，绝望自杀，而张、唐二人的祖籍也是广东。因此电影《阮玲玉》中时而上海话，时而粤语，正是对当时情境的准确反映。此外，闸北区的罗浮路、粤秀路都得名于广东的罗浮山和粤秀山，也是因为附近广

“广东路”与广东移民无关

但广东移民依旧给上海带去了广东地名
广东移民在此开设商店、酒馆、茶楼
连店里的留声机放的都是《步步高》《雨打芭蕉》这样的粤音

东籍移民众多。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譬如苏北里、南通新村、无锡弄、宁波弄堂、西安坊……等等。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地名的后缀，仅仅就上文的几个例子而言，就有里、弄、坊等多种名称，那么这些名称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这就要说到移民地名的另一种常见的命名方式——以姓氏命名了。

“X家X”的地名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如河北石家庄、湖南张家界、河北张家口、江苏张家港。

追根溯源，用以命名的姓氏多为当地较有名望、人口众多的大族，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举族迁徙的移民。移民们除了以自己的姓氏作为地名的一部分，在选择后缀时，也难免受到家乡的影响，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北方人抱怨自己家乡地名土气，动不动就是张家屯李家村的，羡慕南方地名仙气飘飘宛如神仙洞府，实际上南方类似的地名并不少见，只是不常用“屯、村”而已。

据学者研究，上海地名的后缀有宅、村、巷、行、弄、厍（shè）、角、荡、湾、寺、桥、庄、圈、里、塘、园、浜、堰、泾、坞、圩、店、埭（dài）、阁、埝（niàn）、厅、渡、楼、门、头、沟、池、沙、舍、窑、庵、浪、嘴、塔、宅基、油车、坟山、池圈、树圈、祠堂等数十种不同的称谓，除了以建筑或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实体名称外，还有一些，是全国各地的移民带着自己家乡惯用的后缀跋涉至此，交织成上海地名多姿多彩的画面。

其中，“宅”在上海古代移民地名中分布最为广泛，占到了这类地名的一半以上，完全同名的地名也随处可见，打开地图软件在上海搜索“陈家宅”，会发现从最东边的浦东新区到最北边的崇明区，共有九处之多。

从目前可考来源的地名来看，“宅”主要为北方移民使用，例如汉时青浦县（今青浦区）的孔宅，是孔子的二十二世孙孔潜的居住地。闸北区的杨湖宅，是因宋时杨家将后代自河北迁居此地。普陀区的侯家宅，为南宋枢密院副使的山西河东人侯细，在随高宗南渡后因遭秦桧诬陷而隐居于此。



福建人在台湾

据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乡贯别调查》结果，台湾的375万汉人中，有311.5万人祖籍为福建，其中漳泉府籍占了300万人。因为大量的移民定居，在台湾也就出现了不少来自于漳州、泉州的地名。在台北市士林区有一山丘叫做芝山岩，它与18世纪的漳州移民有关，因其小山丘风景很像漳州芝山，故以芝山岩为名。在云林县的台西乡，有一泉州村，看名字即可知，曾有一批福建泉州人生活在此。

摄影/施铭成

歇浦

申江

虹口区的陈家宅，因为清安徽陈氏一族逃荒至此得名。

除了以姓为地名外，也有以家乡为名的，比如建国后普陀区的泰山宅，是自山东泰山附近迁居来的一批移民，在1980年后，这里有新建公房，就叫做泰山新村。

而南方移民若使用“宅”，其祖裔多半是南迁的北人，而“纯粹”的南方人，大多使用其他的特色称谓，如闸北区的严家角、浦东新区的陈家门来自浙江移民；黄浦区的吴家厅、浦东新区的黄家阁来自福建移民。此外，后缀占比的变化，也暗示着移民来源的变化，自近代以来，南方籍移民大量涌入上海，于是，宅、巷这样的北方地名渐少，而弄、厍、里这样的福建、江苏等南方地区通名渐多，一进一退间，浓缩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风云变幻。

新疆天山北麓：天涯即故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终于平定了准噶尔叛乱。战乱历时68年，三代帝王，终于收复新疆。然而战乱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北疆地区“千里空虚，渺无人烟”。于是从次年起，清政府延续了历朝对边疆地区的“移民实边”政策，在新疆开展屯田。

屯户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兵屯的绿营兵和八旗兵；二是罪犯；三是招募内地游民和佃户，主要经营民屯；四是自由垦殖，即允许商人在认垦大批土地后，招募大量雇工前往耕种。

清代在新疆的屯田规模之庞大为历代之最。但好景不长，一百年后的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再次让当地人口数量降至低谷，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再次采用“移民实边”



的政策，天山北麓地区又一次迎来了移民潮。

纪晓岚曾写有《乌鲁木齐杂诗之民俗·其六》云："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纵观北疆地名，"复制粘贴"式的命名随处可见。"兰州湾子村"（甘肃兰州）、"河州工村"（甘肃河州，今临夏）、"凉州滩"（甘肃凉州，今武威）和"西宁大庄子"（青海西宁），都清楚明白地标示了当地移民的来源。在这些地名中，"安南工"格外起眼。不要怀疑，安南的确是越南，但是越南人怎么会来到新疆呢？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18世纪前半叶，越南北部郑氏的暴政，引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某一支的领导人死后，其子率领部众共22户一百多人逃入中国云南，请求内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政府将这些人分为两部，分别安插到黑龙江和乌鲁木齐屯垦，就此安家落户。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有九百多个安南人人从云南被遣送到乌鲁木齐，后又移送伊犁。近年来，在北疆发现了"景兴通宝"，而这正是安南国使用的铜钱。

北疆地区同样有深具当地特色的后缀，由于移民多以军屯、民屯的形式存在，因此"屯""工"类地名格外多见。"数字+工"的命名方式，最初用以命名修筑城池时的工堡，后来就保留下来成为地名，然而只用数字毕竟太易重复，于是又加上方位以区别，如东五工、上三工等；小三四工，指位于三工和四工之间的地方；而二六工指的是二工和六工之间。

在笔者的家乡浙江省杭州市义蓬街道，也存在类似的命名法，由于

"申"由移民来

上海简称"申"，相传战国时黄歇被楚王封为春申君，后其封地从淮北迁至江南，包含了今天上海的西部地区。他命人开凿疏浚的大江，就命名为黄浦、黄歇浦，也被称为申浦、申江等，也就是今天的黄浦江。而上海也有了申的别称。

供图/视觉中国

上海：后缀的秘密

上海自古就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城市，自汉代起，就有北方人移民此地，地名以宅为名的多是北方人。而近代以来，南方移民渐多，地名上里、弄、角等南方特色的称谓则多了起来。右图为闸北区的罗浮路的一个弄堂口，它得名于广东的罗浮山，也因在这一带近代广东籍移民众多。右页图是位于黄浦区的龙门邨（cūn），这个“邨”对北方人来说并不熟悉。其实它与“村”同音同意，但在过去的上海人心里，邨绝对不能与村混为一谈。邨一般是知识分子或经济好的人群才能居住的小区。同治年间，丁日昌在此创办“龙门书院”，故而得名。

摄影／陶钧

责任编辑／黄鑫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围海造田，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一工段”到“二十工段”，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也许数字还会加码。虽然屯垦早已结束，但这些地名仍忠实地记录下了当初的移民是如何筚路蓝缕，开发新疆的。

还有一些特色地名，同样记录下移民的历史。譬如吉木萨尔县大有乡的“大夹滩”，乡里有个渭户沟村，主要居民为几十户陕西渭河地区移民（村名再次表明了移民的家乡），而相邻的广泉村，则以甘肃移民为主。相传在光绪年间，两村因争夺水源发生械斗，甚至闹出人命。打架的河滩就被称为“打架滩”，后人也许感觉实在不雅，便改用谐音的“大夹滩”。

除了直接复制名称，移民还以家乡方言影响了北疆地名，其中尤以陕甘方言为甚。

仅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地，就有馆馆子、街（gāi）街子、城城子、湖湖井、楼楼庄子、西坡坡、坑坑庄子、井井弯等叠字地名，这种叠音、叠字现象，在甘肃的兰州话、河州话中尤为突出，想来这些地区的人来到此处，会倍感亲切。

客从何处来

移民与地名的故事说不完，譬如中国移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广填四川”，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广地区的人民移民至四川，产生了如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中所载的景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观察如今留存的移民地名，可以复现当时移民入川时对居所的选择。整体来看，移民地名较多的地方，当时受战乱破坏较为严重。而受战乱影响小，土著遗存较多的地方，移民地名自然较少。同样破坏严重的地区中，平原、平坝（如川西平原、长江及“嘉、涪、岷、沱”四江沿岸地区）因自然条件优越，适宜耕种，成为移民迁居的首选。

不同地区的移民，也有不同的选择，例如清代陈谦《竹枝词》载，“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据研究，湖广籍移民多从事种植业，居住在沿江区县的丘陵台地，而江西籍移民以经商见长，多居于城镇。

台湾的许多地名，则直观地记录了福建移民对家乡的留恋。如台南市安平区来源于晋江县安平镇；台中县大甲镇铜安里，来源于泉州府同安县；彰化县彰化市安溪里，来源于泉州安溪，等等。

若问客从何处来？地名里面有故乡。地名跟着移民走，仿若故乡就在身边。在上海乘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会盯着地铁站名傻看，想着“徐家汇是因为徐光启的子孙定居于此而得名”，地名忽然变得饶有趣味起来。


1935
龍門邨
133弄 1-105号
尚文路

最忌讳的地名

地名有“毒”

撰文／李旭东

哪个地名让汉高祖一听到就赶紧跑路？哪个地名是隋末枭雄窦建德命中注定的“滑铁卢”？地名和命运，难道真有对应关系，需要忌讳？古人说：当然！遇到“有毒”的地名，还得小心为妙。

谐音地名：秦皇汉祖也害怕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刘邦御驾亲征讨伐韩王信的余部。天色将晚，应当安营扎寨休息了。刘邦问手下：“到了什么地方？”答曰：“柏人县。”柏人县在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西。听到回答，刘邦心里一惊：“柏人者，迫于人也。”连忙吩咐大军，不要停留，继续前进。匆忙离去的决定，令刘邦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图谋不轨的贯高早已在县内设下埋伏，准备刺王杀驾。

刘邦忌讳“柏人县”，还有一层缘故：当时人们对秦始皇去世地点的推测。近年出土的西汉初年竹简文献《赵正书》中，称“赵正”（即秦始皇）巡游天下，“至白人而病”，不久即身死。“白人”就是柏人县。汉高祖大概也怕步秦始皇的后尘吧。

相克地名：名将枭雄的雷区

公元621年，隋末河北枭雄窦建德与李世民决战，大败后逃到牛口峪（今河南荥阳市北邙乡），被唐军生擒活捉。有人认为，窦建德这一败，是命中注定。当时军中流行一首童谣：“豆入牛口，势不得久。”“豆”“窦”同音，牛口峪“克”窦建德，顺理成章。

明朝人郎瑛认为，地名与人名相克，人必遭其害。与窦建德“入牛口”相似，《三国演义》中于禁与关羽对峙，也犯了相克地名的忌讳。于禁安营扎寨的地方名为“罾（zēng，即渔网）口川”。关羽一听，笑道：“鱼入罾口，岂得走乎？”果然，关羽水淹七军，于禁也真的如鱼儿落网一般被生擒了。

生杀地名：这些字眼挺邪门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名将岑彭奉命征讨割据四川的公孙述。用兵如神的岑彭，没能躲得过“有毒”的地名——他驻扎的营地，叫做“彭亡”！“亡”字本来就不吉利，居然还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岑彭本想立刻离开，可倍道兼行两千余里的军队再也无力前进了。于是，他留在了“彭亡”。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刺客杀死了岑彭。“彭亡”真的成了岑彭的死地。

地名出现了诸如“亡”“埋”“伏”一类事关生死的凶险字眼，就是典型的“恶名”，甚至成了咒符。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地名诅咒层出不穷：闻太师“一生逢不得绝字”，被烧死在“绝”龙岭；《三国演义》里，“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说唐》中裴元庆命丧“坠”庆山；京剧里李密被乱箭射死于“断”密涧……难道都是地名惹的祸？

责任编辑／郭婷、周玥
版式设计／刘扬

最难读的地名

这些地名你读对了吗？

六合（lù）（江苏）
綦江（qí）（重庆）
漾濞（bì）（云南）
尉犁（yù）（新疆）
铅山（yán）（江西）
隰县（xí）（山西）
浒墅关（xǔ）（江苏）
涿鹿（zhuō）（河北）
析木城（sī）（辽宁）
茌平（chí）（山东）
乐亭（lào）（河北）
鄄城（juàn）（山东）
猇亭（xiāo）（湖北）
井陉（xíng）（河北）
蔚县（yù）（河北）
郴州（chēng）（湖南）
芝罘（fú）（山东）
乐清（yuè）（浙江）
繁峙（shì）（山西）
天台（tāi）（浙江）
珲春（hún）（吉林）
浚县（xùn）（河南）
邗江（hán）（江苏）
珙县（gǒng）（四川）
箪口（gàng）（湖南）
大埔（bù）（广东）
华阴（huà）（陕西）
涡阳（guō）（安徽）
藁城（gǎo）（河北）
蕲春（qí）（湖北）
沭阳（shù）（江苏）
儋州（dān）（海南）

汉江与汉城

这是韩国首尔的汉江麻浦大桥，图中可见桥上的中韩文地名标识。首尔一度名为“汉阳”，因地处汉江以北，时人遵从中国传统“山南水北为阳”的规矩，为该地命名。李氏朝鲜的开创者李成桂，在1395年改汉阳府为汉城府，于是又有了“汉城”这个名字。

供图／视觉中国

顺天 순천

江南 강남

卧龙岗 와룡강

南阳 남양

大同 대동

巫山 무산

朝鲜半岛上的“中国地名”

撰文／李好

朝鲜半岛有许多地名与中国完全相同。对那些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名意象，他们不仅信手拈来，还能在其本国内发现并构建出一套与中国相似的地名景观。这其中既有刻意的模仿，也有无意的巧合。

淮阳 회양

广州 광주

襄阳 양양

泰安 태안

奉化 봉화

咸阳 함양

那个叫“汉城”的首尔

韩国有个国立서울대（首尔大学），还有个私立한성대（汉城大学）。2005年以前，中国人还称韩国首都为“汉城”，这两所高校于是都被叫作“汉城大学”。中文译名一致，只能用“国立”或“私立”加以区分，导致校际交往时多有不便。据说中国不少高校的外事部门都出现过这样的疏漏，将本应发往国立汉城大学的函件，误寄给了私立汉城大学。

你可能有点想不通，서울和한성明明就是两个词，为什么都被译作“汉城”？后来韩国首都的中文译名怎么又从“汉城”改为“首尔”了呢？

事情的起始要追溯到大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王朝，即李氏朝鲜（又称李朝）。他以“松都地德已衰”为由，将国都由原来的松都开城，迁往位于朝鲜半岛腹心地带的汉阳。并在迁都后一年（1395年），“改汉阳府为汉城府”，这便是“汉城”一名的由来。直至1910年日本殖民者将“汉城府”改称为“京城府”，延用了五百多年的“汉城”从此在朝鲜官方文书中消失。1946年，朝鲜半岛光复后，“京城”之名又被改为朝鲜民族的“固有语”——“서울”（音Seoul），但直到2005年汉城市长李明博确定“서울”的汉译名为“首尔”之前，中国人仍然称呼韩国首都为“汉城”。

有人可能会问，怎么又突然冒出个“固有语”来？半岛光复时为何不直接把“京城”改回先前的“汉城”？其实这个固有语“서울”并不是1946年才出现的。朝鲜人长期用民族固有的朝鲜语口头交流，而书面记录则使用汉字。直到1556年朝鲜世宗刊行《训明正音》创制朝鲜文字，当地百姓才开始使用本民族文字记事，但官方仍坚持使用汉字。“서울”，就是固有朝鲜语词汇“京城”“国都”“首都”的意思。

朝鲜一度是中国的藩属国，尤其在明清时期，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以朱子儒学治国，推崇汉文化，重视汉字，反而轻视本地所谓“方言俚语”的朝鲜固有语。就连世宗创制朝鲜文字，也被臣下视作“弃苏合之香，而取蛣螂之丸”。因此，“서울”之名虽流行于民间，却始终难登朝堂。

这种对宗主国毫无保留的仰慕，伴随着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走到尽头。惨败的清政府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两年后，李朝第26代继承者李熙由“王”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仅仅过了13年，大韩帝国就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与日本，朝鲜人沦为了亡国奴。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半岛的影响力则日渐衰退，一些朝鲜人甚至会歧视当地华侨，乃至于发生了1931年万宝山暴力排华事件，近150名华侨惨遭杀害。

1946年朝鲜光复后，为清除日本殖民印记，凝聚民族精神，朝鲜固有语“서울”被确定为首都正名，不再使用具有典型汉文化意味的“汉城”二字。

又过了半个世纪，韩国官方正式将“首尔”一词作为首都서울的汉译名。当时有专家分析，它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现状，使用与서울音近的汉字来标识地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

免地名使用的混乱。譬如서울某某商会和한성某某商会，原来的汉译名都是汉城商会，极易出现混淆。但在一些嗅觉敏感的中国网友看来，韩国政府改“汉城”为“首尔”，不过是缘于“汉城”中的“汉”字太过刺眼，这完全是进一步去中国化的举动。



路牌上的中式地名
这是韩国首尔街头的一张路牌。牌子上标识的仁寺洞，是典型的汉式地名，韩文则是汉字的音译。日本殖民时期，官府取该地原“宽仁坊”和“大寺洞”中的“仁”“寺”二字，组合为“仁寺洞”。“洞”是韩国基层政区名称，类似中国的街道。早在高丽时期，“洞”字就开始作为村落基层政区名的雅称。
供图 / TPG

朝鲜的“八道江山”

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古山子：大东舆地图》，讲的是朝鲜时代的地理学家金正浩为了绘制全国地图，外出勘测十年不归家的故事。面对妻女的抱怨，金大叔只微笑着解释：“我是为了朝鲜的八道江山。”

这里的“八道江山”，指的是朝鲜半岛全境。就今天朝韩分治的状况而论，即朝鲜境内的平安道、咸镜道、黄海道和江原道北部，以及韩国统辖的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和江原道南部。

道制始于唐代，被搬到朝鲜半岛，是在高丽成宗统和十三年（995 年）。成宗此举，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解决地方豪强割据的问题。

除了“道”，朝鲜人还向中国借鉴了成套的行政区划制度，他们使用的政区通名绝大部分源于中国。譬如州制。先秦典章《尚书·禹贡》假托大禹划分九州，由此九州便成为中国的代称。而新罗的景德王则于 757 年将新罗划分为九州，在统辖区域内正式确立州制。高丽末年，“州”的滥设登峰造极，王族、后族的出生地会升等为州，国王驻跸之地会升等为州，就连某些权臣也会要求将自己的家乡升等为州。诸如此类的乱象不一而足，最终导致“州”一级政区的地位被“道”所取代。

还有郡县制。郡县是分封制度后中国出现最早的两级政区。朝鲜虽采用郡县之名，但本质却与中国有所不同——郡与县为同级政区，区别在于郡所辖疆域、人口较县为大。李朝末年，在政区制度调整的过程中，县制被废除，郡作为基层政区通名，一统朝鲜半岛。

韩国也有个卧龙岗

2012 年仲夏，笔者赴韩国丽水参观世界博览会，日程结束后，又走访了全罗南道的多个城市。一路上所过之处，大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孪生姊妹，不但名字相同，就连西南海岸的碧水青山，也令我恍惚间生发出回到中国江南的错觉。后来才知道，全罗道曾名“江南道”，风光旖旎的顺天，更是被称为“小江南”。

韩国“小江南”的出现，可谓是自然与人文双重作用下的产物。顺天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与中国江南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山明水秀的绮丽风光，的确同江南相类。而人文因素则在于，无论是地区命名还是社会环境，顺天都在刻意保持着与中国江南的相似性。比如，金陵（南京）在唐代称“昇州”，

而顺天的旧称即为昇州、昇化或昇平，这里甚至还建有姑苏台、寒山寺等一大批与中国江南重名的景点。

此外，还有卧龙岗——诸葛亮躬耕南阳时的隐居之地。朝鲜半岛也有卧龙岗，最出名的两个，分别位于朝鲜平安道永柔县和韩国京畿道南阳府。

永柔的卧龙岗得名于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8年）。当时丰臣秀吉指挥的日本侵略军势如破竹，由朝鲜南部长驱直入，朝鲜八道几近全丧，李朝宣祖匆忙北上避难，向中国求援。因其曾驻跸于永柔，便以卧龙岗名之。而京畿道的卧龙岗，来由就更简单了——既然有南阳府，何妨再来个卧龙岗？两地还分别修建武侯祠，祭祀诸葛亮。

我曾做过统计，当今朝韩两国使用的郡市级（含）以上政区地名中，有30%与中国雷同。而李朝末期所使用的政区地名中，46%与中国雷同。山川湖海、亭台楼阁等名称雷同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因此，当你在韩国发现似曾相识的地名时，一点都不必感到惊讶。你所见证的，就是中国地名文化传播至朝鲜半岛的历史。

在朝鲜体验巫山云雨

地名的作用，不单单是指示地理位置。伴随着人类不断的情感投射，它会脱离单纯的地理属性，附加上更多的文化内涵。巫山，作为地名，既指代今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的东北-西南走向的群山，也指重庆市的巫山县。中国人一提到巫山，脑中浮现的，除了云山雾绕、幽深清峻的三峡，还会想到襄王神女的传说，想到“云雨巫山枉断肠”、“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点，而是表征神仙境界、孤独沧桑、男女情爱的代名词。

作为文学意象，这个词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据史料记载，新罗国都庆州雁鸭池中，便有用石头堆成的假山，山形仿中国巫山十二峰。朝鲜文人的辞赋中，也经常会出现“巫山”。高丽时期“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就这样写道：“故国三千里，那堪游子泪沾巾。巫山十二峰，正是行人肠断处。”

朝鲜人对巫山的热爱，不只停留在口头，他们甚至在本国境内构建起一处真实的巫山，地点就位于平安道的成川。此山原名“纥骨山”，因同样由十二座山峰组成，加之山前有沸流江水，被朝鲜人认为景色绝类中国巫山，便将其改名如左。朝鲜巫山十二峰，峰名“梦仙、高唐、阳台、神女、朝云、暮云”等等，都是典型的巫山文学形象。

纥骨山对面的河岸上，修建有气势恢宏的降仙楼。降仙楼原为接待中国使臣的馆舍——东明馆的附属建筑。从方志中收录的《降仙楼图》可以看出，诸如“朝云阁、暮雨台、十二栏、玄虚阁、笙鹤轩”等巫山典型文学词汇，都成为了亭台楼阁的名称。

成川巫山的位置，恰在中国使臣前往汉城的必经之路上。曾有朝鲜官员询问该地与中国巫山有何差异，中国官员答道：“正相似也。”来自“模仿对象”的认可，更令纥骨山名扬八道，而降仙楼也被称为“第一楼台”，列入“关西八景”。

综合国力决定文化影响力，地名文化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链接

这些地名，朝鲜半岛上也有

历史上，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接受程度，大量地名与中国雷同。但因为缺乏充分的佐证材料，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都是他们模仿、抄袭或照搬中国的产物。比如朝鲜慈江道的长江郡，系合“长津”“江界”二名而来；而韩国京畿道的河南市，市名乃是“汉江之南”的意思。下表所示，仅为当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些与中国同名的行政区域，究其原因，大多已无从考证。



此中国非彼中国

中国地名的“出口”

撰文／喻翔

越南的重庆、太原，美国的北京、广州……这些源自中国的地名，如何在异国落地生根？

日本的“洛阳”

独在他乡忆旧游，非琴非瑟自风流。团团影落湖边月，天上人间一样秋。

——《洛中作》

初读这首绝句，你可能以为这是唐朝某个游子来到洛阳北漂，形单影只，感慨万千，便将思念故乡旧友之情付诸纸笔。且慢！这首诗的作者，其实是日本战国时代名将直江兼续，而且他一生从未出过国。此处的洛中并非中国洛阳，而是日本的“洛阳”——京都。

日本京都为何被称为“洛阳”？这要归功于大唐文化的强大影响力。794 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今京都），平安京仿照大唐长安城而建，虽然面积只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但布局完全采用长安的里坊制，呈棋盘状。都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从规制到名字都照搬长安。因天子坐北朝南，所以朱雀大街东侧被称为左京，西侧被称为右京。

桓武天皇有个儿子名神野，是个“中国通”，还是电影《妖猫传》中留学僧空海小哥的金主，他继位后即嵯峨（cuó é）天皇。盛唐实行两京制，除了西都长安，还有同样繁华的东都洛阳。日本国力不及大唐强盛，嵯峨天皇为了附会唐风，便把左京改叫洛阳、右京改叫长安。由于平安京的地势东高西低，低洼潮湿的“长安”逐渐荒废，只剩下“洛阳”。于是，“洛阳”就成了京都的一个雅号。

后来，日语中又衍生出了“洛中”（京都城里）、“洛外”（京都城郊）、“上洛”（去京都）等说法。其中，

链接

越南东北的太原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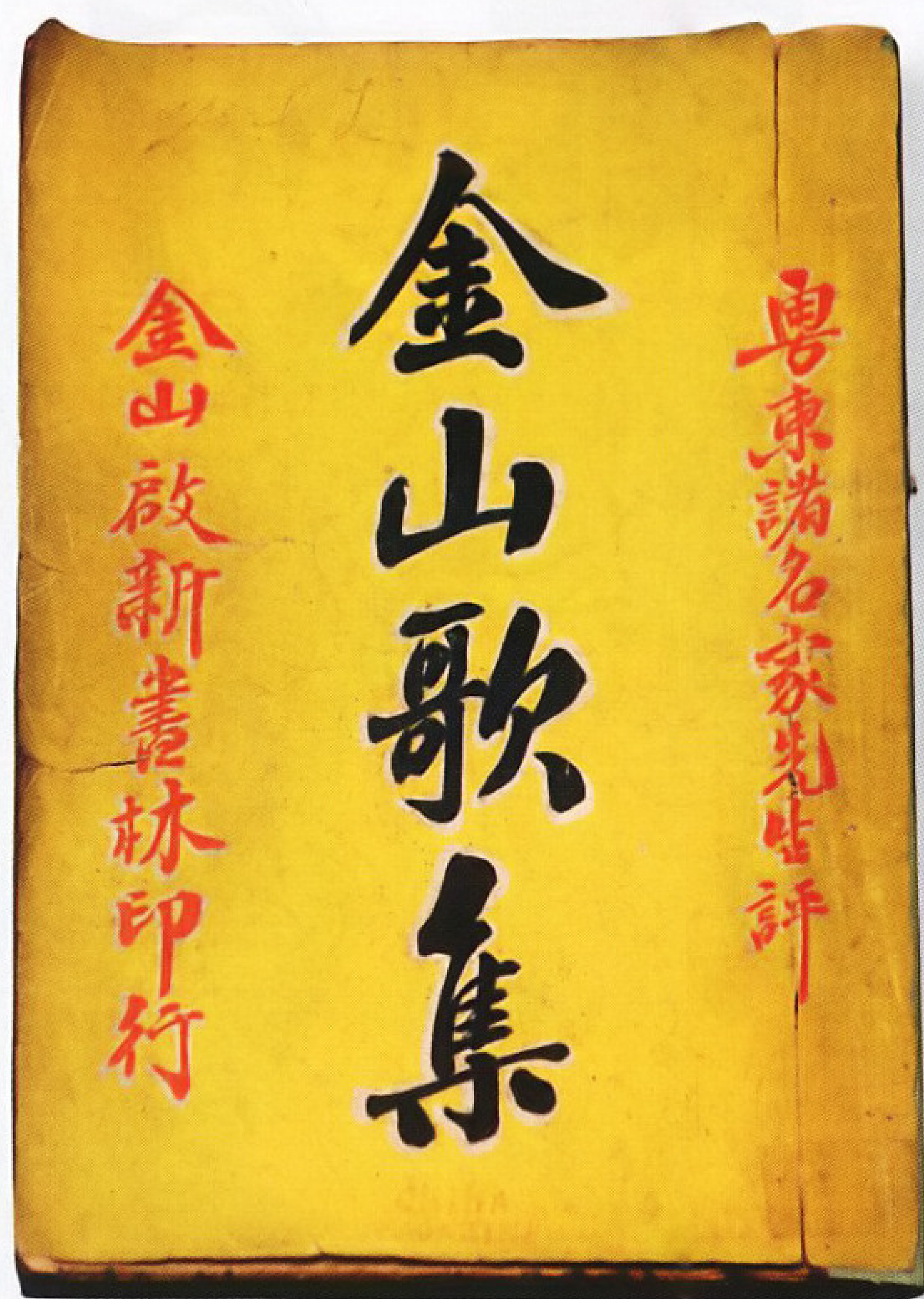
“我在重庆，我开车去太原找你？”

“好，我等你。”

看到这样一段对话，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有人正准备从重庆开车一千多公里去太原找他的朋友。但这段对话也有可能发生在越南，因为越南有重庆、太原、西宁等二十多个地名与中国重名，左图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从越南的“重庆”到“太原”，当天就能打个来回。“太原市”位于越南的东北部，是“太原省”的省会。这里有太原钢铁公司、太原师范大学、太原农林大学等，如果没有“越南”的前缀，也许会让人觉得走错片场。

在越南发现中国

越南文化深受中国影响，除了很多城市的名称与中国重名，城市建筑中也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图为岘港以南会安古城的一处华侨古宅——均胜栈，会安古城在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里有观音庙、关帝庙等中国式庙宇，还有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等，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让人产生一种穿越感。供图／视觉中国



“上洛”最为出名，而且不是一般人都能用的。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原本掌权的室町幕府一落千丈，各地大名（即诸侯）竞起。因为幕府将军和天皇都住在京都，所以“上洛”成了大名领兵进入京都宣示武力的代名词，类似于中国春秋时期的“问鼎中原”。

直到现在，京都还有不少地方在使用“洛阳”这个名字，比如洛阳工业高等学校、洛阳综合高等学校。在此友情提示高三党，这两所学校既不在河南，也不是大学，而是高中，所以去那里读书，既没有龙门石窟可看，也没有胡辣汤可喝。

越南不是南越

日本在古代并不是中国的藩属，尚且如此生硬输入中国地名，那么长期受中原王朝政治保护的朝鲜和越南就可想而知了。连朝鲜、越南的国名，都是拜中国皇帝所赐。

1804年，越南统一，恢复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国君阮福映派遣使者入北京，请求嘉庆帝册封他为南越国王。但是，嘉庆帝对“南越”二字非常谨慎，不肯轻易授之于阮。原来，越南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版图，这里的地名也被中央王朝反复涂涂改改。先是秦始皇在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秦末，南海郡尉赵佗趁乱割据一方，占领了这三郡，自称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在今越南中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合编为交州，一直到隋末。期间虽然屡有地方势力反抗中央政府统治，但越南一直内属于中国。唐代改交州为安南都护府，后又改为镇南都护府、静海都护府，或许是唐朝皇帝觉得越南人民脾气不太好，希望他们能安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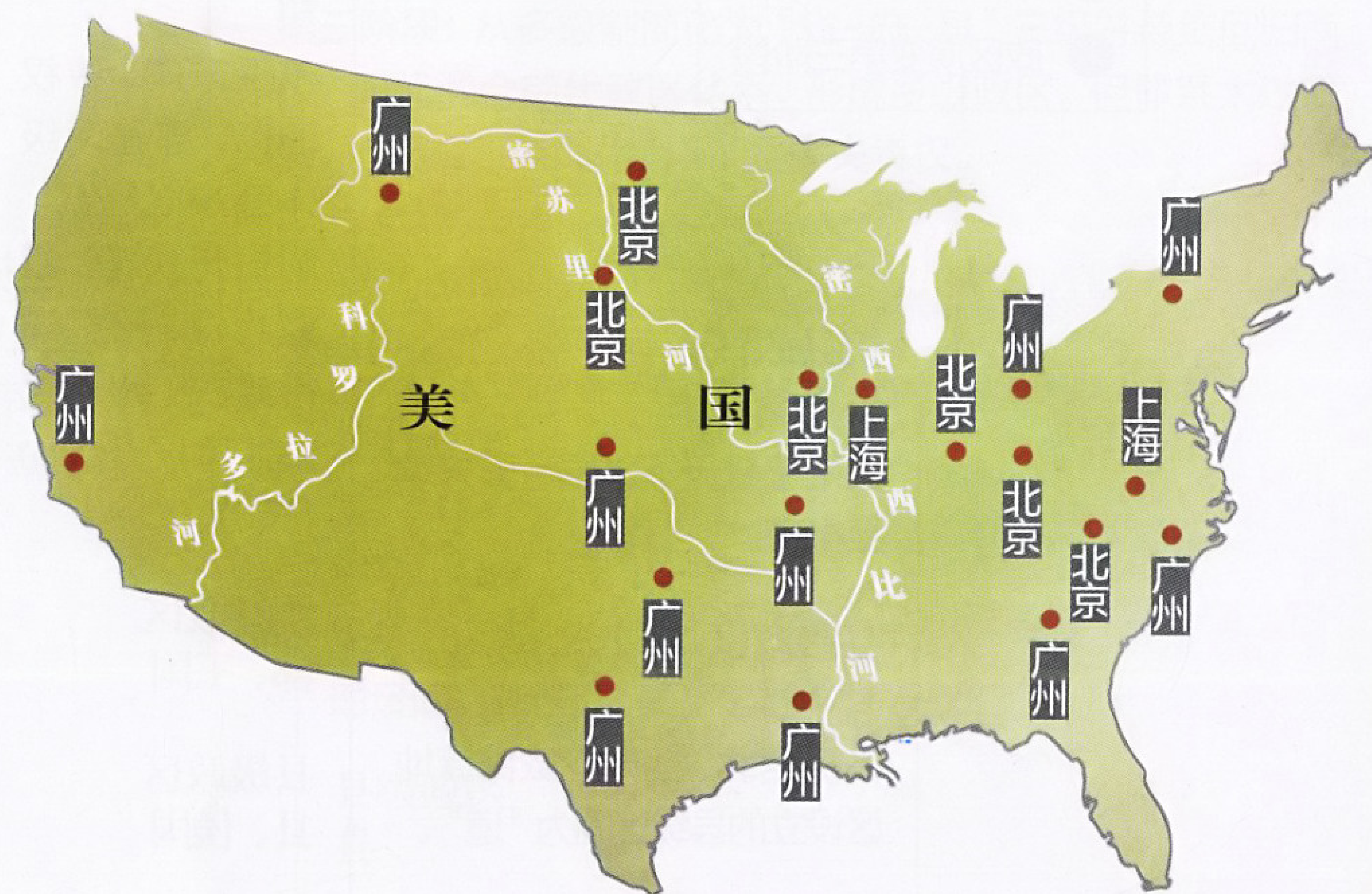
五代时期，越南开始成为独立国家，定国号为大瞿越、大越等。但仍接受中国的册封，或为交趾郡王、或为安南国王，维持宗藩关系。嘉庆帝的地理和历史都学得相当扎实，一眼看穿了阮福映想做“南越国王”背后的玄机，当即驳回使臣的请求：“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

最终，嘉庆帝机智地将“南”“越”二字前后颠倒，定为“越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南越不致混淆。于是，

责任编辑/陈伟峰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
国际知名度高
所以美国人一口气山寨了二十几个
上海开埠较晚，所以只被山寨了三处

"越南"这个国号沿用至今。由于越南栉沐汉风上千年，除了国号听命于中原王朝，地方的地名也常行拿来主义。现在的越南，还有西宁、重庆、太原、山西、襄阳、海阳、莱州、梁山等二十多处地方与中国的重名。



美国的"北上广"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开始坍塌，不过，中国的地名输出并没有停止，反而远跨重洋，强势登陆美国。

19世纪的美国正忙于西部拓荒，很多新的居民地都由移民们来命名。他们除了使用祖国的家乡名（如纽约原名新阿姆斯特丹，最早为荷兰人向印第安土著买下曼哈顿岛并定居于此）、人名（如华盛顿为纪念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将军）、地形物产（如盐湖城以临近大盐湖得名），还借用了一些国际知名的地名。比如，中国的"北京"（Pekin/Peking）、"上海"（Shanghai）和"广州"（Canton）。

美国现在有不少城镇和社区都以"北京"命名，其中最大的"北京"在伊利诺伊州塔兹韦尔县，面积约40平方公里，人口3.4万。这些"北京"大都与中国北京的纬度相当，当年的白人开拓者除了考虑到北京是神秘东方大国的首都、名气很大，还认为北京正好位于地球的另一端，即对跖（zhí）点，就像超级马里奥从东京打一条水管通道，横穿地球，从里约热内卢冒出来一样。

其实，因为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知名度比北京还大，所以美国人一口气山寨了二十几个（以前广州的英文名是Canton，音译回来叫"坎顿"）。据说早在19世纪初，有位美国商人约翰·欧唐纳通过与广州开展贸易而致富，回乡建了一座以广州为名的种植园。担任土地分区测量师的比撒列·威尔斯是他的朋友，为了纪念好友，便以广州命名了一座新城。这就是今天俄亥俄州的"坎顿"的雏形。与广州相比，上海开埠较晚，所以只被山寨了三处。

中国地名在美国
身在美国，也能游遍"北上广"，上图罗列了一些以北京（Pekin / Peking）、广州（Canton，音译为"坎顿"）、上海（Shanghai）为名的美国城镇，大多是在建城之时"山寨"中国地名的结果。旧金山（San Francisco，谐音直译为"三藩市"）也是一个颇有中国渊源的地名，19世纪这里是美国淘金热的中心，很多华人劳工移居至此，称之为"金山"。直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现了金矿，得名"新金山"，这里便被称为"旧金山"以示区别。左页图为清末民初的粤语诗歌集《金山歌集》（供图 / 视觉中国），描写了粤籍华侨在美国的生活和思乡之情。

行政区划的千年变

省、市、县、乡是今天中国的行政区划层级。而在历史上，政区层级体系时有变化或创建。政区层级的变化，体现出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新政区的出现，则是出于中央对地方进行分区监察、军事统筹或临时管理等目的的需要。

图例

- 政区演变第一阶段
- 政区演变第二阶段
- 政区演变第三阶段

春秋战国

统县政区
郡
郡在战国时出现，多因军事而设，同时具有军区和政区的双重性质，下可以辖县。

县级政区
县
春秋时，县由西周封建王畿、诸侯国、采邑中心区域以外的土地，转变为直属于国君的行政区。战国时，编户齐民，聚乡为县，成为后代国家政区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环。

秦

统县政区
郡
秦始皇分天下36郡，秦末增至49郡。

县级政区
县、道
秦汉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县级区划为“道”。

汉

监察区
州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在郡级政区上设立14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由司隶校尉部管辖，其他郡国分为13个刺史部，以“州”命名。

统县政区
郡、王国
诸侯王封地为王国，和郡同级。

县级政区
县、道、邑、侯国
女性贵族封地为邑，功臣、外戚、王子等列侯封地为侯国，与县同级。

汉末到南北朝

高级政区
州
东汉末年，政权动荡，郡县两级体系难以维系。刺史州长官，掌握兵权、财权和行政权，州从此由监察区升级为行政区。

统县政区
郡、王国

县级政区
县、侯国

隋、唐前期

监察区
道
唐太宗贞观初年，以山川形势和交通路线分全国为十道，作为监察区，由中央派出官员巡查各区。唐玄宗时改为十五道。

统县政区
府、州（郡）
唐玄宗将首都和陪都所在的州升级为“府”，以显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

县级政区
县、侯国

唐后期到五代

高级政区
道（方镇）
唐后期，道的性质逐渐转变为行政区。而方镇（藩镇）是唐玄宗时设置的军事片区。唐后期，道的长官和方镇的长官常由一人兼任。道和方镇合二为一，成为统州一级政区。

统县政区
府、州

县级政区
县

辽

高级政区
道

统县政区
府、节度州
辽代共设六个府，可下辖州，也可直接统县。长官为节度使的州，等级与府相同。
州

县级政区
县

参考资料：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

政区层级如何变

第一阶段：由“郡–县”两级转向“州–郡–县”三级。秦汉时中央集权强势，可以直接管控地方；汉末魏晋中央势力衰弱，故需设立更多层级来维系对地方的控制权。

第二阶段：由“州–县”两级到“（道）路–州–县”三级。南北朝时行政区划混乱，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两级制。但疆域扩大、人口增多导致政区数目过多，不利于管理，因而又设置监察区，并成为第三级政区。

第三阶段：从多级制简化为“省–府–县”三级并最终回归两级。元代混合前代政区体系，形成多级政区。但体系太过复杂，因而被不断简化，以加强中央集权。

宋

高级政区
路
宋太宗改十三道为十五路，宋神宗时增至二十三路。宋代的路，级别高于州，功能介于监察区和行政区之间。

统县政区
府、州、军、监
宋代帝王潜邸、政治军事地位重要的州，都可以升府，府地位高于州。此外，宋代统县政区还有军和监。在边地和军事要塞设军，为军政一体的政区。监则是在各经济产地所设政区。

县级政区
县、军、监
军、监下不辖县时与县同级。

金

高级政区
路

统县政区
府、州

县级政区
县

元

高级政区
行省
金代为了加强地方管理，中央不断派出行台尚书省到地方上处理政务。元代的行中书省成为正式政区，简称行省或省。元代行省是行政军区，下设路府州县。

统县政区
路
府
州

县级政区
县

明

高级政区
布政使司
明代对元代政区进行了调整，行省改称“布政使司”，在疆域内划分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

统县政区
府、直隶州
州

县级政区
县

清

高级政区
省

统县政区
府、直隶州、直隶厅

县级政区
县、散州、厅
清代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内地一些情况复杂的地区设厅。厅分为两类：直隶厅等同于府和直隶州，是第二级政区；散厅和散州、县同级，是第三级政区。

民初

高级政区
省

统县政区
道
民初，撤府、州，以“道”为统县政区名，20世纪20年代时废除。

县级政区
县

南京国民政府

统县政区
省、直辖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废除道，以省统县。另有首都市（即南京）、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和西京市（即西安）六市为直辖市，归行政院管理，1939年增为12直辖市，地位与省等同。

县级政区
县、省辖市、设治局
南京国民政府在通商口岸和人口稠密地区设市，大部分市归属省政府管理，为省辖市，与县同级。1931年6月颁布《设治局组织条例》，规定在无县政府的边远省份或多民族聚居区，设立“设治局”。

China即“秦”？

图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复制品。有一种观点认为，China最早的发音来源于“秦”（chin），古印度对威名远播的大秦帝国则尊称为Cina（梵语），佛教传入中国时，又由翻译佛经的僧侣音译为“支那”“至那”“震旦”等。

供图/视觉中国

中国为何叫“中国”？

撰文／毛智周

中国人最熟悉的这个词，究竟是怎么来的？



“中国”是个简称？

你司空见惯的一些说法，有可能并不确切。比如这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撰写的《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记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对“国名”问题的几番讨论。

先是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五款中的“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提出质疑：“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教育家黄炎培与法学家张志让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新中国的国号最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思，无需重复。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两字比较好。……为了要合乎国家的本质，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即是否保留政协文件中对国名“简称中华民国”的提法。为此，周恩来特意在9月26日那天中午安排了一场宴会，邀请数十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共商此事。黄炎培首先发言，说老百姓习惯了“中华民国”的叫法，一旦改了名，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何香凝也点头示意：“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成果，如果能够照旧使用，也是好的。

听闻此话，坐在一旁的美洲华侨、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脸色顿时凝重起来。“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他语气有些激动：“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对没有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我们的国号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话音未落，席间便响起一片掌声。经济学家马寅初、民盟主席张澜、商务印书馆董事陈书通、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纷纷表示赞许。民盟常委沈钧儒则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专业的解释：“政协会议文件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别国定约，都有诸多不便。”

经过讨论，政协第一次大会的文件最终删去了“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唯一正式的国号。自此之后，无论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起陆续颁布的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没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这句话，在法律意义上是不严谨的，因为给国名加上简称的做法在新中国创立之始就被否定了。但我们也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这句话在法律意义上是不严谨的

因为给国名加上简称的做法
在新中国创立之始就被否定了

知道，现在无论是内政外交，还是公事私事，人们皆以“中国”代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不是“简称”，那“中国”打从哪儿来？人们又为何如此偏爱这两个字呢？一切恐怕还要从源头讲起。

中国，在中原建都的国

“中国”绝非近世文人的发明。在迄今所见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是一篇三千多年前的铭文，它被铸造在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

何尊是西周初年由宗室贵族“何”制作的一件青铜酒器。“何”接受了周成王的训诰，聆听其回顾对文王武王丰功伟绩的歌颂，并得到赏赐。为以示纪念，他专门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并写下一段文字，铭刻在尊内底部：“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周武王灭商后，向上天祝告，并在今洛阳所在的位置选址营建新都成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自兹乂



(yì)民”一句，是说要在“中国”建都，统治民众。在商周甲骨文与金文里，“中”字像一面有飘饰的旗帜，王立“中”以聚众并发号施令，“中”由此具有了中央、中心的含义，又引申为政治与文化的核心。“国”原意为城邦，在这里引申为地域、地方。在时人看来，成周所在的中原河洛地区既位于天下之中，又是文明鼎盛之所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而只有在“中国”建都，才能顺理成章地治理天下百姓。

西周人心目中的“中国”，或许可追溯到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生活在今陕晋豫交界地带的先民们，创造了极富特色的花卉纹彩陶。这种纹饰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东越渤海，西达青海，南抵长江，北逾燕山，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它有着高度一致的兴趣及认同，并在其影响下改变、重组着自己的文化，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汉语中，“花”原本写作“华”。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苏秉琦先生认为，这种以花



最早的“中国”
这是三千年前由西周宗室贵族铸造的一件青铜酒器——何尊。尊内有铭文122字，其中“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见本页拓片），是关于“中国”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而这里的“中国”，从区域上看，指的是新都“成周”的所在地洛阳。
摄影／张志刚



1



2

“华”族的专属符号

上世纪二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人们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与河南陕县（今三门峡陕州区）的庙底沟，发现了大量带有花卉纹的彩陶。这种花卉图案可大致分为具象与抽象两种。具象花卉纹多为多瓣花的俯视图（图1），抽象花卉纹则可能包含了花、叶、鸟等元素（图2），被认为具有生殖崇拜的含义。这两种花卉纹在中原地区诞生，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它们是古“华”族人的专属。

供图 / 杨兴斌 / FOTOE

卉为主题的彩陶纹饰，极有可能是古“华”族人的专属。“华”族人的花卉图案以陶器为载体，向四方扩散，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华”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位于中央的中原地区，那里就是“中华”。

到了四千多年前，原始社会进入末期。文明在发展的道路上似乎开了倒车。不论是南方太湖之滨的良渚、江汉之间的石家河，还是北方泰山南北的龙山、黄土腹地的陶寺，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穷极奢华的文明，几乎在同一时期戛然而止，出现了断崖式的衰落。有的在退化后变得默默无闻，有的则几乎彻底消失，难觅踪迹。原始时代“满天星斗”的文明景象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却异军突起。在今天洛阳偃师的二里头，诞生了最早的中央大城。考古学界通常认为，二里头文明与文献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关系密切，二里头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或许即是夏朝的建立与扩张。那里汇聚了来自四方的文明精华，并向外输送自己的价值与审美。从各地“满天星斗”到二里头“一家独大”，从万邦林立到最早的中央王权国家，中原再一次发挥了她的核心作用。

又过了大概三百年，二里头文明被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商人部族取代。后者同样重视中原这块王国故土，在今天的偃师和郑州兴建了两座新的都城，学术界一般将此视为商朝立国的标志。经历多次迁徙，商朝的都城在王朝中后期最终落脚在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闻名于世的殷墟即其故址。

经历了夏商两朝的经营，中原已成为当时亚欧大陆东部大平原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来自西方的周族人在攻灭了商朝之后，自然也要“宅兹中国”，在中原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新都，顺理成章地“自兹乂民”，统治百姓。这也正是武王灭商后祝告上天特地要强调“宅兹中国”的原因。

周人甚至为“宅兹中国”找到了最早的理论依据。在嵩山以南的古阳城，大名鼎鼎的元代观星台不远处，矗立着不起眼的“周公测景（影）台”，纪念着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在此立木表、测日影以求“地中”的历史。何为“地中”？《周礼》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也就是说，在白昼最长的夏至这天正午，八尺木表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地中，是建立国都的最佳所在。经过测影，周公将“地中”定在了嵩岳地区，而计划营建的新都“成周”，正在嵩山以北不远的伊洛谷地。

而今，天文学家早已证实，地球上同一纬度的地区，太阳高度角相同，不管是否在夏至，正午的日影长度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以今度古，去否定三千年前先民对宇宙的早期探索。周公测日影找“地中”，并把“地中”放在中原大地的核心——嵩山，无疑为“中国”的确立增添了分量。

循着周朝与《周礼》的足迹，后世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宋等王朝也都以儒学为依据，立国于中原。秦、西汉等朝在长安建都，关中也应当算作广义上的中原。这样一来，



“中国”与“中华”逐渐由指代中原及中原的人群，演变为指代建都于中原的政权及所辖的民众，并最终成为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专称。

你是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多余，但先民的回答却未必是肯定的。即使是在共和初创的民国早期，许多百姓对“中国”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

2010年高考全国文综卷引用了一段简短的故事，原文不知出自何处，但读来颇有意味：民国三年（1914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到乡下，一位老农见他身穿洋装，便问他是哪国人。戴季陶回答：“予中华民国人也。”没想到老农“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戴季陶告诉老农他也是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连连否认：“我非革命党人，我非中华民国人。”在老农看来，“革命党”革了大清朝的命，建立了新的朝廷“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人”就都是“革命党”。想当初那么多“革命党”都掉了脑袋，倘若自己也承认是“中华民国人”，万一哪天皇上又坐回龙庭，闹不好自己小命不保。

类似的故事在更早的文献中屡见不鲜，尤以外国人所著游记为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总结道：

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的前面冠

在中土沟通天人

“中”可以理解为中心、中央，也可以理解为适中、恰当，对“中”字的解释历来不一而足。北京大学教授张辛从字源学角度分析了“中”的含义。他认为“中”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会意字，像方（圆）孔上贯穿一条竖杠。这个孔代表人与上天交流的唯一通道，通过这种适中的管道，人们得以与自然交好，获上天庇佑。图为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1266–1269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在天地之中的中原观测日月星辰，是古人亲近自然、沟通天人的一种重要方式。

供图/视觉中国

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与欧洲不同，古代的中国人更习惯称呼自己为“某朝人”而非“中国人”。王朝更迭了，称呼也会随之改变，因为世界就是天下，君主是天下之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戴季陶见到的老农会如此惧怕自己是“中华民国人”。他只知道革命政权的中华民国，而不理解主权国家的中华民国，如果说他也是“中华民国人”，等于把他从“正统”推向“反叛”。

虽然“中国人”的概念在古代并不普及，但“中国”“中华”等词语却经常使用。不过，“中国”与“中华”往往出现在与“四方”“四夷”“夷狄”“蛮夷”等相对应的语境中，与其说它们是国名或族名，不如说它们是“天下”观念之下中央王朝及其民众地缘与文化优越感的体现——文明文化先进之地。正如隋代国学博士文中子所说，中国乃“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代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高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当分裂之际，各路政权都纷纷标榜自己是“中国”、“中华”，而不去理会是不是真的处在中心地区。

自称“中国”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了海外。朝鲜、越南、日本先后自称“小中华”或“中华”自不必提，就连公元9-13世纪回纥人在中亚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其可汗也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一词的来源有多种解释，但在当时的突厥语中，“桃花石”代指位于东部的“上秦”——中原王朝。喀喇汗因通婚关系，而称中原王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血缘上的联系千丝万缕，“桃花石汗”的自称，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原的仰慕与雄心。

“支那”的污名化

异域对中国的称谓不胜枚举，“桃花石”仅是一例，此外还有Serice、Cathay、China，等等。Serice汉译作赛里斯，由古希腊人最先使用，一般认为它来源于丝绸的“丝”，体现了欧洲对丝绸的追求与向往；Cathay即建立辽代的民族“契丹”，是辽帝国在欧亚大陆曾经辉煌的遗绪。Serice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不再使用，Cathay也只流行在中西亚及东欧，China则是最为普遍且正规的“中国”之称。

有关China的本义，素来众说纷纭。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将其与秦帝国联系起来，即China的发音来源于“秦”，并首先出现在当时古印度的梵文中（Cina），之后西传到欧洲，伴随佛教的传入，再“回到”中国。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将其音译为“支那”“至那”“脂那”“震旦”等。换言之，“支那”即China，是中国人最早转译的他称。

唐朝时佛教东渡重洋，“支那”也随之来到了日本。但这时的日本人并不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是唤之为“大唐”“中华”“汉土”，以示尊重与敬仰。19世纪中后期，中国在故步自封和列强入侵中逐渐衰落，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这时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已不再是“天邦上国”，反而沦为落后、野蛮、腐败的代名词，那么之前所用的“美称”便不再适用。为表示“脱亚入欧”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的西化，日本干脆称中国为“支那”。

对于邻国的这种称呼，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感，恰恰相反，人们还将它与大量日语词汇一道引入中国，视为汉语现代化的一种时髦。上海创办了《支那小报》，孙中山作《支那现势地图》、《支那保全分割论》、《支那问题真解》，甚至连梁启超、章太炎也曾在文章中署名“支那少年”“支那章炳麟”。

然而，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日本人在提到“支那”时基本没什么好话。用郭沫若《行路难》的说法，他们无外乎鄙视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甚至“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满是睥睨与不屑。

更有甚者，当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号之后，日本人仍然拒绝“中华民国”的称呼，在各种场合继续使用“支那”。

日本对中国由蔑视到敌视，中国人对“支那”也由追捧、质疑到厌恶。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向外交部发出训令：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作“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这使得日本政府公文不得不改称“中华民国”。然而没过多久，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支那”又卷土重来，直到战败后才被彻底废除。

“支那”本无罪，唯人污之。东亚近代史的风云变幻，使“支那”由单纯的地名他称音译，一步步沦为侮辱性的蔑称，最终被历史所抛弃。一国之名，从来不仅仅只是“称呼”那么简单。

洋人口中的“中国”
清末民国国势衰微，中国的国际形象急转直下，许多称呼开始带有贬义，比如支那。图为古巴哈瓦那唐人街上的壁画，画面中的chino是西班牙语“中国”的意思，据说在当地，这个词含有“无知、愚蠢、谎言”等负面含义，故而被华人所排斥。
供图/视觉中国

“宋”国
封地的荣光

撰文／展淼

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同哨响，令权柄在草莽与权贵中接力。王朝与国家纷纷登场，这天下的主人总有故乡，那天下的名字从何处来呢？西周分封，方国林立。今天的商丘，曾是当时的宋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殷商旧民的分封地开始……





宋：战火中生与灭

图为开封清明上河园内演绎《大宋东京保卫战》的震撼场面。西水门上的官兵，正在顽强抵抗金兵的炮火。虽然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宋军曾多次取得胜利，但最终并未保卫住开封，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北宋灭亡，“宋”也快到头了。

摄影／李木

“先宋”原从末世生

周公旦可能不会想到，灭商不过数年光景，周王朝就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牧野大战后，纣王自焚于鹿台，自周人先祖迁居岐山开始，经营数十年的翦商大业终告成功，但以小邑周而灭大国商，如何安抚那些仍然有很强力量的殷商遗民？为了稳定周的统治，武王姬发进行了周初第一次大规模分封，这次分封有三种类型：

1、封先王之后。按《史记》的记载，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帝舜之后于蓟、陈等，这些封国普遍疆域不大，只是为了保证对古圣先王们祭祀不会断绝；

2、封功臣谋士，让他们为周的统治继续出力，如太公姜尚的封地齐国，一方面因劳苦功高而封地最广，一方面地处当时还没有得到完全开发的山东沿海地区，起到监视、镇压东夷各族的作用；

3、封同姓子弟，以亲缘关系，扩大周人的统治区域。比如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均封在以朝歌（今河南鹤壁市区南部淇河边）为中心的殷商故地，而当时还有相当实力的殷民遗族，也在这里继续接受纣王之子武庚的统治。

肢解殷商畿内之地，是武王殚精竭虑所思考的方法之一：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人心，另一方面，殷商故地又不是简单接受武庚独立统治的“国中之国”，它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分

宋的初次亮相

周初，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了宋国。或许因当时封地疆域都不大，国名与都城之名常常不分，因此宋国都城也称宋。宋国都城位于今天的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西南隅。从右上的图航拍图可见，商丘古城水系发达，又处旧黄泛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考古队的发掘，终于确定了城墙的位置。图为宋国故城遗址保存较好的城墙。

摄影／魏文慧

别被管叔、蔡叔、霍叔监视，这就是著名的所谓“三监”，而这个安抚与监督双管齐下的策略，却在数年后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殷商的败亡无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教训，《史记》上说周武王灭商之后辗转忧愁，夜不能寐。

他的弟弟周公旦问他：“你为什么睡不着？”

他说：“天不佑商啊！我出生前很多年，城郊怪兽成群，毒虫遍野，正是天不佑商，才有了我们今日的成功。想当初殷商初建，名臣数百，这才有了殷商数百年基业，可是我周朝国运还没有保证，我怎么睡得着？”

然而，睡不着觉的武王，很快就长眠了——周朝立国刚三年，武王病故。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旦摄



政当国。而正是这一举动，催生了一场酝酿已久的大规模动乱。

管、蔡二叔对周公十分不信任，四处传播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年幼的成王）”，又联合本就不甘于周人统治的武庚，再招诱徐、奄等东方夷族，一场联合叛乱就这样爆发了。面对内忧外患，周公毅然决定兴师东征。

杀管叔、流蔡叔、武庚北奔、平定淮夷，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东



仁义的视角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一次他途经宋国时，在树下给弟子演习礼仪。而当时宋国有个司马桓魋（tuí）想要杀孔子，就以砍树来恐吓孔子。但孔子却很自信地说："老天使我有了这样的品德，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同是宋人后代，宋襄公的仁义，却对司马桓魋并不生效。不过当转换视角，站在桓魋的立场去看，或许就是另一种说法了。如果再进一步，宋襄公的仁义，究竟是仁义还是愚蠢或是更大的野心呢？

供图/FOTOE

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史籍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使我们难以想象战争的具体景象，《诗经》中的《国风·豳风·破斧》，却记载了那些远征战士们的回忆："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斧头被砍坏了，斨（斧头的一种）也被砍得残缺了。周公率将士们东征，平息四国叛乱。战后还能生还，十分命大了！

通过这次战争，周朝不但对殷民贵族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还将许多原本并未臣服的东夷方国与部落整合进了周朝的政治版图，这时，周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分封，也奠定了周朝数百年的统治基础。

武庚败亡后，周人感到殷民的残余势力在朝歌地区盘根错节，难以撼动，于是，将一部分殷民迁徙到旧都商丘，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另一部分则迁徙到鲁国等姬姓封国之间，这样，即使殷商贵族们依然不服统治，但力量已然被分割、瓦解。

周公的事迹告一段落，但迁徙到商丘的新封国——宋国的故事，则刚刚开始。

"光荣传统"的继承

宋国的第一位国君叫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纣王荒淫残暴，微子启见劝谏无用，只好离开。武王伐纣时，他自缚归降，于是，作为最早归顺周朝的殷商贵族，又没有参与武庚叛乱的微子启平安封于商丘。微子启以宋为氏，成为了宋姓的始祖。

宋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江苏西北部和山东省西部的数百里地区，是当时中原水陆辐辏之地。封国的国号"宋"，也是他们先祖之国"商"的转音，所以，直到数百年后的春秋时代，人们还常把"宋"称作"商"。

而宋人也并非徒有"商"名，



他们大多继承了祖先们善于经商的优良传统，凭借极为便利的水路交通，宋国的商丘、陶丘、彭城等地，都成为闻名当时的水陆大都会。春秋末年被称作“商圣”的范蠡，虽是楚国人，也曾在陶丘定居，经商积资成为巨富，并自号“陶朱公”，时至今日，我们将从事贸易的人称作商人，也可见殷商人民的代表形象是多么历久不衰。

由于先秦史料的匮乏，我们对宋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多，最著名的要数春秋时代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人物——宋襄公。

宋襄公的出场就很别致。

宋襄公，名兹甫，在他的父亲宋桓公病重的时候，作为太子的兹甫就去恳求父亲，希望能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说：“我这位哥哥是长子，且仁义。”目夷知道后表示：“都能以国相让，这不就是仁吗？我比不上弟弟。”为了躲避让位，目夷干脆跑到了卫国。

宋襄公继位，也想谋求称霸事业。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齐太子逃亡宋国，宋襄公遂联合曹、卫等几个小国伐齐，并送齐太子回国即位，在战胜已趋衰落的齐国后，宋襄公难免有些自我膨胀，想与楚国结盟，确立宋国的霸主地位。目夷劝谏道：“小国争盟，祸也。”但是宋襄公是谁？根本不听那套。

楚国假意应允，却暗中布局，与郑、陈、蔡等国相约，将会盟之处设在盂地，并伏兵相待。结果只身赴会的宋襄公，直接被楚国扣留。楚国趁势伐宋，好在宋国坚决不降，楚人见国君无用，只好将他放走。

这时对襄公颇为了解的目夷说了一句话：“祸犹未也。”果不其然，好不容易脱身、臊眉搭眼回来的宋襄公，并未吸取教训。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举兵伐郑，当时的郑国受楚国的保护，这样，

富商大道

今日的生意人也被称为商人，其由来要追溯到几千年前，商族手工业发达，并擅长做生意。商朝灭亡时，殷商旧民没有立足之地，就以贩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成为职业，人们就以商人来称呼贩卖者了。图为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华商文化广场上，由19组不同朝代的货币图案组成的富商大道。摄影/魏文慧



“宋公栾”青铜戈

戈是春秋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兵器，一般为青铜铸造，配木柄。青铜戈胡部有6字错金鸟篆铭文，为“宋公栾之造戈”，图中这面铭文为“宋公栾之”。宋公栾是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景公。

供图 / FOTOE

宋国和出兵援助的楚国在泓水发生了一场遭遇战，这就是中学教科书上的著名篇目《子鱼论战》，因目夷字子鱼，当时任司马，故而被称为司马子鱼。

楚国兵强而宋国势弱，但宋襄公为了他的“霸业”还是亲自督战，形势对宋也十分有利：当宋人已经摆好阵势准备迎敌时，楚人还在渡河。

以弱胜强，当出奇兵。目夷赶忙劝谏宋襄公：“趁他们还在渡河时，打一个措手不及，我们还有胜机。”宋襄公没有同意。

等楚人已经渡河，正在整理行伍，目夷又说：“战机已经贻误，但敌方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还能立于不败。”宋襄公依旧拒绝。

等双方摆好阵势开战，大势已去的宋国只能惨败，宋襄公后来也因伤而死。战败之后，自诩信义的宋襄公还不自省，坚持自己的理论：“君子不攻击重伤之人，不抓上了年纪的人，不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可笑之余，也多少透着一丝可悲。

若论时代变迁的激烈程度，春秋并不能和战国相比。宋国的规模不过中等，如果说它在春秋时期还偶尔掀动时局，那么在接下来的世变剧繁之中，它却像是失了声般，记载既少，又无人关心，宋国最后一个国君宋王偃，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四处征伐，残暴无度，被人称作“桀宋”，不知当时喜欢把宋称作商的人们，那一刻肯定也想起了殷商的末代君主、暴戾无道的商纣吧。

宋国最终被齐、楚、魏联手消灭，而它留给后世的遗产，似乎就只剩下那些“以国为姓”的宋氏子孙了。宋国的故事也许并不值得称道，但历史发展让人饶有兴味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突然出现，再次显露它的深远遗产。

凭借“被坚执锐、摧锋陷阵”的赫赫战功
刘裕后来相继被封为“宋公”“宋王”
在登基之后

便以封爵为国号，相循称为“宋”

史上最能打的皇帝

极富传奇色彩的词人辛弃疾曾写过一阕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位被高度赞扬的刘寄奴，就是南朝宋的开国之君刘裕。

刘裕自称是刘邦的弟弟——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他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 年），自幼家贫，由继母养大。按《资治通鉴》的说法，他文化水平不高、以卖鞋为生，但却勇健有大志。这诸多特点倒和刘备相似，幸而晋末乱世，若想成就功业，武力比文学重要得多，而刘裕则是当时最能打的人物之一。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刘裕三十六岁，五斗米道的领袖之一孙恩起兵反晋。前将军刘牢之以刘裕为参府军事，十二月，兵至吴郡，此时孙恩的军队沿路驻扎，刘裕作为斥候，被派出侦察敌军动向，恰好遭遇数千敌军，退避不及之下，只好迎面反击，但众寡悬殊，短兵相接不久，刘裕率领的数十人就全数战死，他本人也坠落到河岸边。

敌军居高临下，这场战斗看似已经没有悬念，却不料刘裕持刀奋起，仰面砍杀数人，趁敌军没有继续压上的机会，重新登岸，他纵声疾呼，越战越勇，敌军虽众，却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反而且战且退，最终四散奔逃。这时，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人”。

这个故事被记录于《资治通鉴》中，以一当千绝地反杀，大概更多的是出自司马光的想象。结合更早的史料沈约《宋书》的记载，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刘裕与手下数十人意外遭遇上千人的孙恩军队，由于他勇猛御敌，杀伤甚多，坚持一段时间后，刘敬宣领兵寻找，由于生力军的加入，最终反败为胜。

无论如何，这样的战斗终归是十分勇猛的，而凭借“被坚执锐、摧锋陷阵”的赫赫战功，刘裕后来相继被封为“宋公”“宋王”。在登基之后，



宋州：富饶的重镇
唐代诗人杜甫曾经这样描述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邑中九万家，高楼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可见当时的宋州是何等繁华富庶。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唐代大运河是当时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与扬州之间的交通要道，宋州正是因这条运输航线而兴盛的都市。除了商贸，宋州位居军事要冲，更是京师的屏障，唐末的战乱中，它更是必争之地。图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河道，宋州正处于此段河道。
供图／视觉中国

便以封爵为国号，相循称为“宋”。可是照理说，倘若用先祖的国号“汉”字，岂不是显得渊源有自？这就要说说他为何被封为“宋公”了。

“宋公”的封爵源于他的祖籍：彭城郡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彭城正是古宋国的重镇，刘邦也是彭城人，汉朝国号则来源于项羽所封的“汉王”爵，刘裕弃汉称宋，一方面是他战功日盛、威望日隆，不需要用汉朝的名声来“背书”；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了以封爵、发源地为国号的一大传统。

中国古代的国号，很多都以封爵或家族起源之地为名。周人祖先古公亶父迁居的地方就叫“周原”；司马家的郡望“河内”，也在古晋国的疆域之内，所以司马懿才被封为晋王，由此传到司马炎代魏自立，也就拿“晋”作了国号。

这两种国号的命名方式，多少都有些不忘本的意味，但难免也会出现一些例外。比如十六国时代，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便是因为他自称刘邦的后裔，所以要追随汉高祖的基业；五代时期，本是沙陀族的刘知远，也因为姓刘，就顺势攀上了这门久远的亲戚。而游牧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一以寓意取名。金太祖就这么说：“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惟金一色，最为珍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金太祖所说，是辽国号来源的说法之一。国号来源于金属，希望国家也能如金属一般坚实不可毁坏。可事与愿违，比镔铁还坚而珍



的金，国祚，却反而比辽要短得多。

而与辽金几乎平行的时代里，宋又一次出现了。

最后的荣耀

公元960年，“宋”国第三次浮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封地为国号的赵宋。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赵匡胤取代后周，“因所领节

责任编辑／黄鑫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度州名，定有天下之号曰宋”，这里的“节度州”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当时的职务是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前者是中央禁军精锐力量——殿前军的最高统帅，后者是他的武官官阶，而当时的归德军的最高行政长官驻地就在宋州。

宋州相当于宋朝的龙兴之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不久又建应天府为南京，作为宋朝陪都。百年后，金人将大批赵宋宗室俘虏北上，北宋灭亡，唯一未被俘获的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这就是后来的宋高宗。宋地不在，但宋字依旧绵延，直至南宋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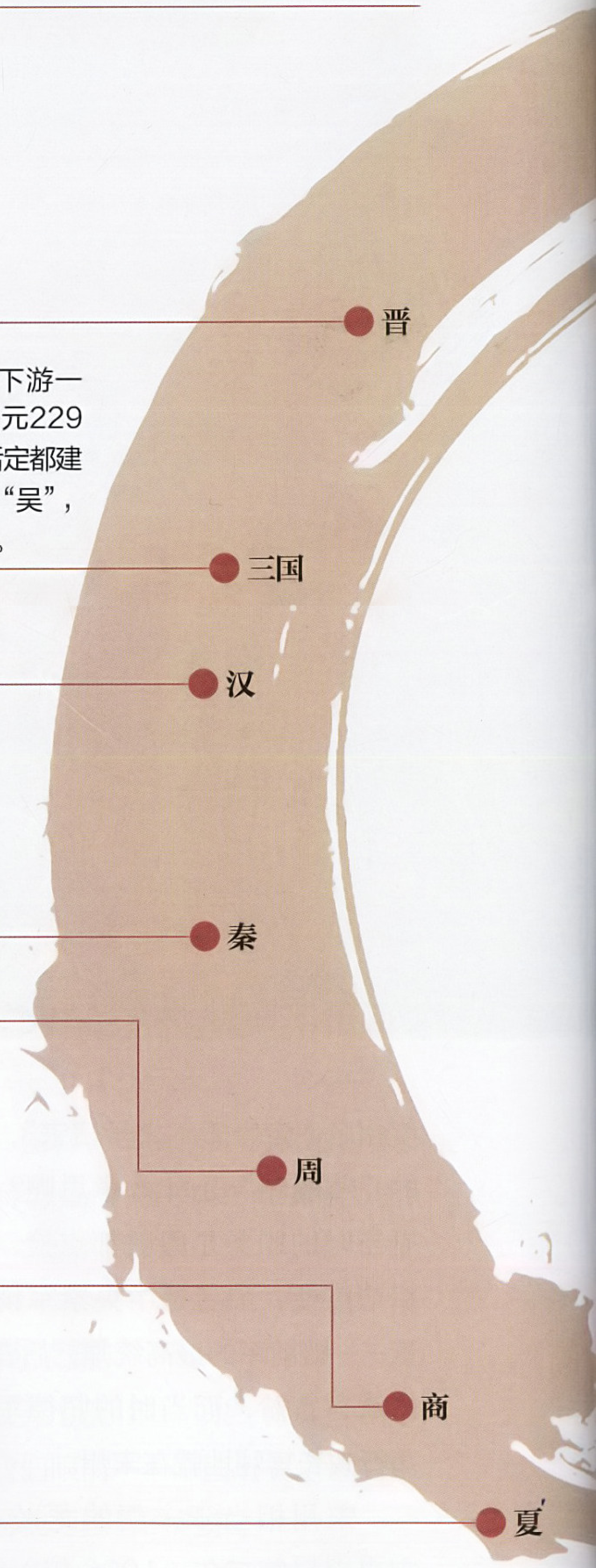
如果从先世殷商算起，到最后一个遵循国号命名传统的赵宋为止，七笔写成的宋字，竟是中国历史上绵延最长久的国号，没有之一。

最后的告别
在河南省巩义市的北宋皇陵里，埋葬着七位皇帝。从宋国，到宋朝，前后跨越了两千年。无论期间曾享有过何等荣光，宋的辉煌都随着王朝的覆灭，一并随风而散了。
摄影／逆光

国号如何确定？

铭记“龙兴之地”

每一王朝的开国皇帝，都以确立国号（朝代名称）为第一要务，那么国号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最为简便的就是，自己的发迹地或统治区域。所以，历史上以地名作国号的情况最为常见。



晋

魏元帝封司马昭为晋公，因其封地是春秋时期的晋国故地。泰始元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时，便以“晋”为国号。

三国

魏：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以邺城（今河北临漳）及周边地区为封地，东汉时邺城是魏郡的郡治。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以“魏”为国号。

蜀： 古时四川称蜀，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政权，史称“蜀”或“蜀汉”，这是因为刘备自诩为汉政权的延续。

吴： 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此地古属吴国。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后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史称“孙吴”或“东吴”。

汉

刘邦的封地在汉中，称汉王，所以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

秦

据《史记》记载，秦人的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被封于秦地。东周初，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获封诸侯，秦始建国，以“秦”为国号。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

周

周人的祖先起初在渭水流域一带活动，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迁居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商后，就以“周”为国名。

商

商人始祖契曾帮助禹治理水患，因功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所以他的后代汤，灭夏后便以“商”为国号。商代中期，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因此又称“殷”或“殷商”。

夏

据传舜封大禹于夏（今河南告成镇），之后禹之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称其政权为“夏”，这是第一次以地名为朝代。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宋：宋武帝刘裕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是春秋时期的宋国故地，因此建国后取“宋”为国号。

梁：南朝梁的建立者梁武帝萧衍封地在古梁郡，故定国号为“梁”。

南北朝

隋朝国号源自随州，因隋文帝忌讳“随”字有“走”字旁，故改为“隋”。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攻克随州后被封随国公，杨忠死后，杨坚承袭爵位，建立政权，以“隋”为国号。

隋

唐朝国号的确立源自建国者李渊的爵位唐国公，这个爵位又承袭于他的祖父李虎。李虎为北周开国元勋，其封地陇西郡是传说中尧唐的封国所在地，所以死后加封唐国公。

唐

五代十国

梁：朱温曾任宣武军节度使，据汴州(今河南开封)，后受封梁王。朱温篡位后便以“梁”为国号。

晋：石敬瑭曾任河东节度使，割据地恰好是晋地，建立政权称“晋”，史称“后晋”。

辽原称“契丹”，改“辽”是因为契丹族发源于辽河上游。

辽

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于宋州（今河南商丘）。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便用其发迹地“宋”作为国号。

宋

元代开始，帝王发祥地不再作为确立国号的依据，寄托着某种美好愿望的“美名”，成为确立国号的新原则。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国号取文义，自此始。”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就国号一事曾发布《建国号诏》予以说明。国号“大元”出自儒教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意欲彰显帝国疆域广大。

元

元、明国号均出于《易经》，且上下文相连。《易经》有“大明”之文：“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可见朱元璋取国号“大明”，暗示了元、明之间朝代的正统嬗替。

明

明代国姓“朱”色赤，为火，“清”为水，五行相克有“水克火”之说，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另外，“清”可表示清平，即太平盛世。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都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清



玉象

图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象。殷墟出土了众多象骨和象牙制品。西周以前，河南盛产象，文献中也有商人有驯养大象的记载。故河南简称“豫”。

供图 / 左冬辰 / FOTOE



冀州 扬州 兖州 雍州 梁州 荆州 徐州 豫州 青州



水中之“州”

黄河蜿蜒盘曲于峡谷之中，将土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州”，本意是被水围绕着的陆地，恰如此图所展现的情景。

供图／视觉中国

“九州”去哪儿了

撰文／南朝游侠

古人笃信一个传说，大禹将天下一分为九，划为“九州”。先秦经典《禹贡》则记录了这九州的地名。直到今天，这些地名大多仍在使用。只是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它们依旧是它们吗？

战国时代的国家梦

这是参考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上的《禹贡九州图》而绘。九州范围，不仅囊括了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甚至连今日的西北边疆地区也包括进来了，由此可见战国人宏大的天下视野和统一梦想。到了今天，九州地名大部分依然在使用，而如“豫州”的“豫”、“冀州”的“冀”，则成为今日河南、河北的简称。

追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有时会从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开始。于是九州就成了“天下”的代名词。而九州中的各州，冀州、青州、徐州、扬州……也长期被认为是始自三代之前的一组地名。这组古老的地名，直到今天还有大半存在，而以“州”命名的城市也比比皆是。不过此州非彼州。

大禹“九州”真的存在吗？

古人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故事。

大禹治平洪水之后，将天下划为九州，他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依据高山大河奠定界域。他还根据各州土地的情况，制定了贡税的等级。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中。而先秦史书《左传》引《虞人之箴》的话中，也有“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之说。

关于“州”这个地名的最初内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到：“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也就是说，被水围绕着的陆地就是“州”。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大禹治平洪水之后，曾经被淹没的陆地，一块一块显露出来，然而依旧被水分隔开，人类就居住在洪荒过后的这些“州”之上，繁衍生息。

根据《禹贡》，九州的地名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其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涉及到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



无论是九州的地名、范围还是其背后相关的国家
都与春秋战国时代相关
而九州分立的格局
也与战国诸强林立的局面有相通之处

江流域等广大地区。

不过也正是这广袤的疆域范围，令后世学者困惑。尤其是现代学术界兴起疑古思潮后，学者顾颉刚、郭沫若等纷纷指出，夏朝疆域狭小，不可能有《禹贡》“九州”的范围那么大。而根据今日的考古成果来看，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域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即使文献记载的夏都，也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这一切都与禹贡所记载的九州范围严重不符。

那么“九州”究竟出现于何时？其实地名本身，已透露出它的身世秘密。顾颉刚等学者认为，从九州地名等透露的种种信息来看，不少涉及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

冀是春秋时的国名，后被晋所灭，冀州即得名于古冀国。

兖州属于卫国范围，得名于沇（yǎn）水，沇水是战国时期的“四渎”之一——济水的别称，曾流经山东、河南境内，如今早已湮没。

青州在齐国境内，是九州中最东方的州，按照战国流行的五行说，青是东方之色，故名青州。

徐州得名于徐国，春秋时徐国被吴国所灭。

扬州源于春秋战国时的东南强国越国，“扬”“越”两字可以通用，所以“扬州”就是“越州”。

荆州得名于荆山，楚国早期曾在荆山一带立国，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国。

豫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周天子的地方，东汉刘熙《释名》道:“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也就是居中的天子希望安闲舒适的意思。

梁州则是战国时代秦国新开拓的巴蜀等疆土。战国时期，秦伐蜀，开巴郡、蜀郡，设立了许多栈道，“梁”即桥梁的意思。

雍州则得名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县），春秋战国时秦国曾以此为都近300年，是持续时间最久的秦都。

可以说，无论是九州的地名、范围，还是其背后相关的国家，都与春秋战国时代相关。而九州分立的格局，也与战国诸强林立的局面有相通之处。所以说《禹贡》上所记载的“九州”，应是春秋战国时逐渐形成的地名。

战国人的“九州梦”

原本，“九州”只是一个统称而已。春秋时期，各州的地名与疆界都尚未确定，“九”其实是个虚数。顾颉刚说，“他们只要说地方区域之多，却不知道应当说要有多少个区域才对，所以就用虚数‘九’来作代表。”

为什么偏偏是“九”呢？除了顾颉刚所说的虚指外，可能还藏着先人







“最高级”的九州地名
图中的荆州、徐州和扬州，不仅是《禹贡》九州中保留下来的地名，而且均属于地级市，是今日九州地名中级别最高的三个，但依然与过去差距巨大。比如荆州，今日是湖北的一个市，而在过去，仅其主体部分，就囊括了今湖北湖南二省的全境。供图/视觉中国

的一个数字密码。在中国文化中，“九”是一个异常尊贵和吉祥的数字。在《易经》中，“九”是太阳之数，以“九”代表乾坤万物;《黄帝内经》则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所以古人很喜欢用“九”，传说天有九重，皇帝是“九五之尊”，重阳节是九月九号……古人用“九州”命名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想必也带有一种吉祥和祝福的意味在里面吧。

到了战国时期，虚指的“九州”，逐渐变为实实在在的九个“州”，而且有了名字和方位，并被记录在《禹贡》等经典之中。天下被“九州”有序分割，又统一于一体。所以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九州”是战国人对统一的向往，是先贤们为未来统一国家设计的行政区划蓝图，只不过寄托在传说中的英雄大禹名下，是一场“托古改制”。

除了《禹贡》之外，战国的《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职方》，战国到西汉初年成书的《尔雅·释地》等典籍中也有关于“九州”的记载，只是地名与《禹贡》略有不同:《有始览》无青州，有幽州,《职方》无徐、梁，有幽、并;《释地》无青、徐、梁，有幽、并、营。

当然，无论是哪个版本的“九州”，在战国时期都没有实践过。

“九州”是战国人的一个梦。而这些梦想中的地名，要到何时才能成真呢?

汉武帝引经据典取“州”名

第一个把“九州”付诸实践的，是汉武帝。只不过他最终划分出的不是九州，而是十三州。

东汉十三州在哪里？



由监察区到行政区的“州”

东汉的十三州与西汉相比，略有调整，朔方被并入并州，降司隶校尉部（京师附近七郡设置的部名）为十三部之一，所以总数十三仍不变，史称“东汉十三州”。到了东汉晚期，十三州由监察区演化成行政区，一州长官为刺史或州牧，“州”成为中国最高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地名。

汉朝建立之初，继承秦制，地方行政区划主要实行郡县制，但同时也实行封国制，即郡国并行制。不过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迎来了开疆拓土的黄金年代，再加上郡国的调整，到了元封年间，全国共有90多个郡，十八九个王国，合计约110个郡国。

地方行政区如丛林密布，给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除近畿七郡以外的一百余郡国，分为十三州，每州置一刺史，刺察一州的郡国长吏和强宗豪右。

关于西汉十三州的地名，《禹贡》作出了最大贡献。其中七州就来自《禹贡》九州的地名，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荆州、扬州，另外把《禹贡》的雍州改名凉州，梁州改名益州，再加上幽州、并州与交阯、朔方。

不过西汉时期的“州”，并非行政区的地名，而是监察区的名字。州刺史每年八月巡行自己管辖的州，岁终再到京师向丞相奏事，由丞相处置。也就是说，刺史只有监察地方的职责，没有管理地方的权力，在地方上也没有固定的驻地。到了西汉后期，刺史的权力不断变大，有了固定驻地，逐渐由京官转变为地方官员，并把“刺史”更名为“州牧”，但此后多有反复。

“冀州牧”曹操的野心

历史上唯一一个要以《禹贡》九州划分天下的人，不是泥古不化的王莽，而是打破成规的乱世枭雄曹操。

《后汉书·献帝帝纪》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

这一年，是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名义上看起来，这是汉献帝所下的命令。但实际上此时朝廷的政

权，掌握在丞相曹操手中。在此前一年，汉献帝特许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如汉丞相萧何故事，曹操的权位正逐渐攀上巅峰。在此关键时刻，曹操为何突然搞起九州复古这样看似书呆子气的事，还得从“州”的华丽变身说起。

东汉灵帝末年，黄巾军起义爆发，很快席卷了中国的北方地区，汉室统治岌岌可危。这时候，宗室刘焉向汉灵帝建议，可派出中央的高级官员——九卿出任部分州的州牧，授予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于是刘焉以太常出任益州牧、黄琬以太仆出任豫州牧、刘虞以宗正出任幽州牧。扬州等州依旧保持刺史职务，但职权基本与州牧相同。自此，州牧（刺史）彻底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而“州”也由监察区变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类似于今天的“省”，郡县二级制，正式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在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就有不少是以某个州的“州牧”身份横行于世的，并围绕着一些重要的“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有名的当属荆州。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三股势力瓜分荆州，并在后世演义出“刘备借荆州，一借不回头”“关羽大意失荆州”等著名典故。而曹操在建安十八年春复《禹贡》九州的行为，则是这位“奸雄”所下的一盘棋。

曹操把“十三州”变为“九州”的方案是：把幽州、并州合并到冀州中；把司隶校尉及凉州并到雍州中，把交州并到荆州、益州中，这样一来，正合九州之数，唯一不同的，是禹贡中的“梁州”称“益州”。

这样的改变似乎并无不妥。但若关注到曹操当时的身份，便能明白其中关键。除了是汉室的丞相外，曹操此时还兼任着冀州牧。而在九州复古行动中，冀州兼并了幽州、并州，下辖32郡，成为一个“超级大州”。所以通过这次行动，冀州牧曹操便能名正言顺地拓展自己的势力。“复九州”，发生在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之前，正是曹操为建立魏国所做的准备。

不过在当时群雄割据、争夺天下的局势下，曹操按照《禹贡》九州重划全国政区的行动并未真正如愿，此后，也再没有人作过类似尝试。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州”，却没有真正实现过“九州”。

“州”的狂跌之路

尽管“九州”蓝图没有完全实现，但在东汉末年以后，历经三国、两晋、

九州清晏，江山永固
这是唐岱、沈源合画《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九州清晏，由乾隆题诗。九州清晏是圆明园最早的建筑群之一，寓意九州河清海晏，天下永固。在这里，九州并非是具体的九个州，而是“天下”的代称。
供图/唐岱、沈源/FOTOE



南北朝直至隋代，“州”一直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地名。由它引领的州——郡——县三级政区体制，在政治管理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又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作“州制时代”。

不过就在“州”辉煌引领“郡”“县”的时代，问题却逐渐显现了。

西晋末年，天下再度大乱。紧接而来的东晋十六国时期，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各割据政权纷纷在辖境内设立许多“州”，于是“州”疯狂繁殖，辖境却急剧缩小。到了南北朝末期，州已达300多个，郡600多个，平均每州只有二郡，完全失去了当初地广位重的特点，而且给行政管理造成极大不便。

如果把“州”比做一只疯狂上涨的股票，在失控之后的命运，当然就是——一路狂跌。

唐宋时期，先后出现了新的一级行政区:“道”、“路”，“州”则沦为了二级行政区。这还不算惨，到了元代，开启了“省”制时代，并延续至今，“路”被降为二级行政区，而“州”则与“府”一起沦为三级行政区，只是在这时候，其下面还有“县”在垫底。到了明清时期，“州”又跌至与“县”同级的最低一级行政区。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民国元年，撤府，州、厅改县，“州”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通名，在跌到谷底之后，终于结束了使命。反倒是一直位于底端的“县”顽强存在，直到今天。

当然，若说“州”这个地名就此消失不见，也不全对。它依然随处可见。比如大名鼎鼎的苏州、广州，甚至是九州里的“原版”地名，也大多存在，如扬州、荆州、徐州、青州……只是这里的“州”，不再代表着行政区划的通用名，而是一个地方的专用名。而这些地方，可能大到一个地级市，比如扬州、荆州，也可能小到一个市辖区，比如衡水市的冀州区，可谓沧海桑田。

另有一些新兴的“州”，比如玉树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等，则透着浓郁的民族风情。这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与地级市平级，介于省与县之间。尽管内涵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却是“州”这个地名作为行政区划通名的一种遗韵。



日本也有个“九州”
在受到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东亚文化圈，有许多从中国“进口”的地名。比如日本的九州岛，因封建时代全境分9个国而得名。但用传统中国鼎鼎大名的“九州”为名，而非“九国”等其他名称，不能说“全属巧合”。
摄影/宋超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经典“江南”

上海枫泾古镇，河网密布，十步一桥。小桥、流水、人家相得益彰，正是今人对“江南”的典型认识。

供图/视觉中国

何处是江南

撰文／晶心

你所熟悉的“江南”，不一定是古人心中的“江南”。秦汉之际，“江南”在洞庭湖南北；大唐帝国时，“江南道”囊括了大半个中国；今天，“江南”则青睐太湖流域。是什么样的“手”，在决定“江南”的命运？

把我发配到江南去吧

在中国，或许没有哪个地名，能如“江南”这般惹人遐想。江南是和煦的十里春风，是荡漾的轻舟画舫，是动人的丝竹管弦，是赏心悦目的才子佳人，是说不尽的繁华与温柔。

然而江南还有另外一幅面孔，比如春秋时期郑襄公口中的“江南”。

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楚庄王率军攻陷郑国国都，郑襄公肉袒牵羊迎接。为表诚意，他主动表示要接受惩罚，比如把他俘虏到江南以充实海滨；比如削减郑国以赏赐诸侯；如果楚国能够顾念以前的情谊，不灭绝郑国的社稷，那么他将重新忠诚地侍奉楚国。

郑襄公的第一条建议，今天看来简直是欺君的笑话了。

但是，此说并非笑话，因为楚庄王在灭亡江汉流域的那些姬姓小国后，就常把他们迁往江南一带，以示惩罚。

这时的“江南”，与今天的江南完全不同，倒是与影视剧里清朝皇帝喜欢说的“流放宁古塔”的“宁古塔”之流，颇有几分相似。

今日之江南，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为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可谓是人间天堂的代言词。而那个被选作发配之地的江南，又在哪里呢？

谁是资格最老的“江南”

“江南”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行政区地名中，是拜篡汉的新朝皇帝王莽所赐。王莽是个孜孜不倦的改名爱好者。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统计，当时全国有县1581个，被更名的高达726个。其中之一，就是改夷道县为江南县。

这个以“江南”为名的县，在今天的湖北宜都市陆城县。也就是说，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而闻名的火辣湖北，属于秦汉的江南地区。据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考证，秦汉时期的江南，主要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这又是从春秋战国一脉相承下来的。比如上文所说的郑襄公自请发配的“江南”，就大致指的是湖北的江南之地和湖南一带。



不过早期的“江南”，仅是一个大概的范围，许多不确定的情况存在其中。首先，“江”不止是一条江。学者石泉曾考证，至少在唐代以前，“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比如淮河、汉水都曾叫过江，江南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

即使是长江以南的“江南”，也不专指长江中游以南。比如秦朝宰相



李斯曾在其名作《谏逐客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金锡历来被视为东南吴越的方贡土物。可见在秦汉人的心目中，江南也可指向长江下游。

在先秦、秦汉人心中，江南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学者李伯重对此分析道："在较早的古代文献中，'江南'一词，如同'中原''塞北''岭南''西域'等地理名词一样，仅用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并非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区划。"

那时候，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华夏的政治中心和文明中心。"江南"，是颇具优越感的北方人对于南方的一个泛称。而在当时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南方地区中，长江中游的楚国，却曾一度十分辉煌，在中原地区知名度甚高，因此就不难理解《史记》中的"江南"，为何多指今日的湖南、湖北了。

这个时期，能够加入"江南"队列，并不是什么值得荣耀的事儿。江南地势低洼，暑热潮湿，再加上当时水利尚不发达，当地生产方式颇为原始落后，生活水准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曾对这样的"江南"作出精辟点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于是"下江南"被许多北方人视为畏途。春秋时的郑襄公曾避免了"下江南"一劫，西汉的贾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贾谊少年得志，21岁即被汉文帝征召。在为天子出谋划策的过程中，他曾就礼仪、农业生产甚至诸侯国等重大问题，提出过精辟见解，让汉文帝十分喜爱，甚至想提拔他担任公卿

"火辣"的江南

左页图是正在参加吃辣椒比赛的湖南人，上图是正在举办麻辣小龙虾狂欢宴的一家湖北商场的后厨。两湖之人擅长吃辣，湖北人更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江湖名声。然而，如此火辣刚强的地方，却是秦汉时期"江南"的主要部分。

供图/视觉中国

你说的是哪个时代的“江南”？

“江南”这个地名所指，经历了从西到东、由大到小的变化。它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后来却逐渐具有了经济发达、文化优越的意义在里面。这种变化，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迁南移息息相关。此六图，根据学者周振鹤的文章《释江南》所绘，为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之一。



秦

秦人的“江南”，多数时候指长江以南，但楚国知名度高，所以史籍中多指长江中游以南地区。



汉

汉人的“江南”还包括今江西、安徽南部等。广义的江南甚至有江淮以南、江汉以南的含义。



唐初期

唐初的“江南道”，位于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滨，十分广袤。

之职。不过这火箭般的升迁速度，却惹来不少元老重臣的嫉妒。他们纷纷向天子进谗，说贾谊年纪轻轻，却过于擅权，造成朝廷政局不稳。久而久之，汉文帝就疏远了贾谊，甚至把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属于当时的“江南”中心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或许是出于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恐惧，贾谊自以为命不长久，自怜自伤，只好作赋排遣。好在后来汉文帝又念起贾谊的好，改任他为“梁怀王太傅”，才调到了离朝廷更近的地方。

秦汉时期，像贾谊这样把“下江南”视为末路的人不在少数。在他之前，野心勃勃的项羽因为怨恨楚怀王熊心，佯尊其为“义帝”，把他迁于江南地区的长沙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东汉开国功臣马援的儿子马防，因事被徙封丹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之后，认为“江南下湿”，上书恳求天子让他回到家乡。……

从先秦到秦汉，“江南”就这样与污名共存，被北方人胆战心惊地想象着，千方百计地逃避着。

将军您就不怀念江南吗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派临川王萧宏率军讨伐北魏，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来临。这时北魏的将领，是梁朝的叛将陈伯之。为此，萧宏突然动起了劝降的念头，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记室丘迟。大才子丘迟挥笔写了封信，命人寄给陈伯之。没过多久，陈伯之竟乖乖地带着八千军队投降了南朝，重回故国怀抱。

这封收到奇效的劝降书，循循善诱，真挚感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这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已到了暮春三月，正是江南最美的时节。回忆起昔日在故国



唐中期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



宋

宋朝，镇江以东的今苏南、浙江地区，被划为两浙路，是近世"江南"的雏形。



明

明代以来，太湖流域经济十分发达，被周振鹤认为是最狭义的江南。

的生活，将军您就不怀念吗？

寥寥几句，撩拨了陈伯之的思乡之心，或许，这正是他重返故国的动力之一吧！

令陈大将军想念不已的"江南"，指的是他的故国——南朝梁，统治重心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一词在指称长江中游以南两湖地区的同时，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地指向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这与当时的天下局势息息相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中，孙权割据东南建立吴国。西晋末年，中原丧乱，北方士族纷纷渡江逃难，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衣冠南渡"。随后，东晋王朝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也以建康为都，偏安于南方。

六朝更迭，均以长江下游南方地区为统治重心，于是这片区域的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江南"一词指称这片地区的时候也越来越多。有时候，北方人干脆直接用江南来指代南方诸朝廷。比如《三国志》裴松之注载广陵太守陈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这里的江南指的是孙吴。北魏改革家孝文帝称赞南朝人物时也说："江南多好臣。"

随着"江南"重心东移而来的，还有形象的转变。南朝文学家谢朓在《入朝曲》中赞美这片土地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逐渐摆脱了"丈夫早夭"的阴影，开始与经济、文化的发达联系起来。从此"佳丽地"一词，也成为古人赞美江南时的高频词之一。

不过，此时的"江南"，范围仍然模糊，它依旧可以指长江中部以南、下游以南，甚至江汉以南、江淮以南。直到唐初，地跨长江南北的荆州、位于长江北岸的江陵，依旧被看



作江南。这个指代随意而模糊的“江南”，要借助大唐天子的手笔，才能真正形成清晰的轮廓。

唐代有个大“江南”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这位英明睿智的新君王，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记不住多如牛毛的各州长官名字。唐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州有300多个，数量巨大。为了记住各州长官的名字，唐太宗只好将他们写在屏风上，日日对着看。于是在即位之初，他便下令将天下分为十个监理区划，称为“道”，由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以便于中央政府管理。江南道就是其中一道。

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是有史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但包含范围却比今日的江南广袤得多——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四川、贵州，东至海滨。好个大“江南”。

这是国家“认证”了的“江南”。与重心逐渐东移的六朝“江南”相比，大唐帝国的“江南”相当广阔，这或许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大唐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南方失去了它的政治、文化优势，重新沦为边缘地带。于是北方人眼中的江南，也再度变得广阔而边缘。

不过这样的江南道实在是太过广袤，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它被一分为三，从西到东依次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包含了今苏南、上海、

链接

曾经几多“江”？

古有项羽垓下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今有爆款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男主角梅长苏号称“江左梅郎”。在“江南”范围尚在伸缩变化、模糊不定时，“江氏家族”的“江左”“江东”“江外”“江表”等，早已被用来指代苏南等地区，也就是说，与近代狭义“江南”的范围更加接近。

江东

长江下游芜湖至南京一段，为西南——东北走向，长江两岸即为东西两岸，故以芜湖南京一线以东为“江东”。今苏南、皖南一带，在秦汉时期以“江东”著称。因孙权曾割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此江东又常用来指吴国。

江左

坐北面南，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所以“江东”又称“江左”，这个称呼盛行于魏晋以后。故以南北朝为参照背景的电视剧《琅琊榜》里，梅长苏号“江左梅郎”。

江外

早期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优越的北方人将长江以南地区视为“外”，故称“江外”

江表

北人以长江以南为“外”，而“外”即“表”，故又有“江表”之称，三国时期的“江表”，一般指孙吴政权。

浙江、福建以及安徽南部部分地区。江南西道则包括今江西、湖南大部及湖北、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后来，江南东道又进一步被析分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分时合）、宣歙、福建四道，其中浙西统辖今苏南、浙北、上海等地，正是后世“江南”的前身。

江南西道也被一分为二，西部分出了湖南道，东部依然保留为江南西道，这便是湖南、江西两省省名的起源。于是在江南道的不断析分中，原江南道的西部地区，陆续失去了“江南”之名，“江南”的行政区划概念整体上向东部偏移。

值得指出的是，唐初所设的“道”，原本是监理区划，然而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摇身一变，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无论是江南西道还是江南东道，均属于“江南”范畴。不过在江南内部，差别已逐渐显现。开元盛世的名相张九龄，曾有“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的诗句。也就是说，今天的皖南地区相对于东部的浙东、浙西地区，已处于江南边缘。而据学者张伟然研究，中唐以后，“江南”一词更多地用来指“江南东道”，而“江南

“江南道”的旧成员

左页图是江西婺源县篁岭的天街宴，村民们把各家宴席连在一起，以庆祝年节、增进感情（摄影/陆建华）。下图是福建龙岩市祭祀关公的“闹春田”民俗（供图/视觉中国）。无论是多山的江西婺源，还是传统民俗宗教氛围浓郁的福建，今天看来都与江南差异颇大。但在唐代，它们均属于“江南道”的范围。



西道”则逐渐被简称为“江西”。

唐朝有名的“江南控”白居易，令他魂牵梦萦、反复吟咏的江南，就多集中在东部的苏州、杭州，比如世人最熟悉的《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在用蔚蓝的江水和如火的江花勾勒出江南的总体风貌后，白居易依次用杭州、苏州来代表最美的江南。

“江南”一名所指的内涵，不仅在行政区划上逐渐往东缩进，在世人心目中，也越来越倾向于东部。这个中唐后日益明显的现象，与六朝“江南”概念的东移类似。它与安史之乱（755-763年）的爆发息息相关。

与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一样，安史之乱，带来北方的又一波移民狂潮。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于此时基本确立，尤其是长江的下游地区，成为南方经济最发达之地。于是在唐人的诗词之中，“江南”一词不仅越来越多地指向这一区


南京



域，而且褒义色彩也与日俱增，以至于留下了“江南好”“忆江南”“望江南”“梦江南”等流传后世的曲牌名。而北方一些富饶美丽的地方，也被比喻作“江南”，比如古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在南北朝后期就有“塞北江南”的美誉，后来随着唐朝江南的蒸蒸日上，灵州的名头也愈发响亮。晚唐诗人韦蟾在送别尚书卢潘去灵州出任朔方节度使时，便深情赞美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就是今日宁夏“塞上江南”的渊源了。

江南是个财赋重地

从唐代起，“江南”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的一个名字。而作为行政区划，它的边界由国家意志所决定，一直清晰明白。到了宋代，朝廷仿唐代的“道”而设制“路”，“路”逐渐取代“道”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赫然在列。

江南东路大致包括今天的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约相当于今江西全省。无论是东路还是西路，均与后世的“江南”交集甚少。反倒是以“两浙路”为名的地区，包括今镇江以东的苏南、上海、浙江地区，颇与近代“江南”的范围吻合。宋室南渡以后，两浙路进一步分为两浙东西两路，两浙西路包括环太湖的今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与近代江南的狭义范围十分接近。

宋代以后，元朝的行省制度横空出世，从此“省”成为中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一直延续至今。不过以“江南”为名的“省”，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清初。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将明朝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江南”

领跑全国的江南

左页图是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供图／视觉中国），它与江南贡院、学宫一起组成了明清时期南京的文教中心，是输送南方人才的渊薮。上图是《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局部（摄影／张志刚）。苏州屋宇连绵，市井繁华，是明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明清时期，“江南”一词意味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南京、苏州均是其中重要成员。

重新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的名称。然而这仅仅是回光返照而已。仅仅一百年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南省最终被分为江苏、安徽二省。从此，“江南”再也未成为中国行政区的名称。只是由于惯性影响，直到晚清，人们仍常常会以“江南省”来代称“江苏省”而已。

元明清的大部分时间，“江南”被从行政区划上“除名”，然而这个地名却没有消失，在时人心中的分量反而越来越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江南”一词，频频与国家的“财赋重地”、经济命脉等概念等同起来。比如明代经济学家丘濬就指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清嘉靖年间的郑晓也感叹江南的财赋道：“又有江南常、苏、松、嘉、湖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石……”

在谈到江南财赋等问题时，经济发达的两浙地区常常被重点提及，而贡献巨额税粮的太湖流域苏松常嘉湖（今苏州市、上海市、常州市、嘉兴市、湖州市）五府又常被视作两浙中的翘楚。周振鹤据此认为，太湖流域的这五府，就是最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不过在不同的人看来，关于什么是江南的核心，也是有伸缩余地的。比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就道：“识者谓江南……然其腹心，则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五府之外，加上了镇江府和杭州府。

当“江南”与“财赋重地”划上等号，“江南”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或行政区的名称，而更多地成为一个经济区的名称，具有了经济发达的内涵意义。在这样的界定倾向之下，近代江南的雏形也呼之欲出，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江浙地区，更具体地说，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而最狭义的江南，则仅指太湖流域一带。



“江南资格”的丧失

右图是大运河畔的扬州城。右页图是镇江的西津古渡，西晋末年衣冠南渡时，北方流民一半以上从这里登陆。扬州城本位于长江北岸，但因为运河经济发达，一直被视作江南的代表。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地位的一落千丈而失去“江南资格”。因与扬州相邻，又同操江淮官话，长江南岸的镇江，被一同视作“江北”。供图 / 视觉中国

镇江

作为一个"文化心理"概念
"江南"这个地名拥有了极强的伸缩性和包容性
可以跨过长江的鸿沟

将江北的扬州当作"江南"

"江北"为何成"江南"？

明清时期，近代"江南"的含义逐渐定型。无论边界如何伸缩，这时候的江南基本都位于长江以南了。不过一个例外却保留下来，就是江北的扬州，直到清代，依旧被视为江南城市。清代早逝的才子纳兰容若，在《梦江南》中便有"江南好，佳丽数维扬"之句。在江南灿若繁星的城市明珠中，他偏偏青睐江北的扬州，与江南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一起，组成"江南好"的代表。

其实关于江北的扬州到底属不属于江南，不仅是一个令古往今来之人纠结的问题，也关乎"江南"这个地名更深刻的内涵和秘密。

唐太和七年（833年），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邀，到扬州做文官长书记。这时的扬州商贾云集，青楼林立，让风流才子杜牧喜爱不已，从此自发成为扬州的"吹鼓手"，写下许多关于它的名篇佳作。

在杜牧笔下，扬州被当作"江南"的代表来反复歌咏。比如《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即使到了深秋时节，江南的扬州仍是青山绿水，草木未凋，二十四桥的乐声想必依旧婉转动听，这一切，多么令诗人怀念啊。

有唐一代，像杜牧这样把江北扬州当作江南代表的人是大多数，连外国友人也"不幸"被带跑。咸通九年（868年）入唐的新罗人崔致远，写了一首著名的《江南女》，写的就是扬州地区之事。"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所学非雅音，多被春风牵。"扬州城歌欢舞醉、纸醉金迷的面貌，被从"江南女"的角度巧妙勾勒出来。

大诗人们纷纷把江北的扬州当作江南，当然不是误读这么简单。

首先，扬州的确曾经在江南。汉代，扬州作为监察区和行政区的名称，主要指长江下游及淮水中游以南地区。而从东晋南朝以后，扬州范围逐渐缩小，最终仅包括长江以南的今苏南、浙西之地。而从三国吴以来，扬州的治所一直位于今南京，直到隋开皇六年（586年），才迁往江北，以江都（今扬州）为治所。

由于扬州的主体长期以来位于长江以南，其治所又是江南的大都市，所以即使后来迁往江北，仍被当作江南看待，可谓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扬州之所以是"江南"，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在起作用。因为江南不仅仅



是一个行政区地名，也是一个文化心理区地名。正如学者周振鹤所指出，文化心理上的江南，既“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又“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范围”。这一概念始于六朝时南方的开发，巩固于中唐以后南方的昌盛，尤其是太湖流域的经济繁荣。

位于长江与大运河交汇路口的扬州，在唐代曾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美誉。这里不仅经济高度发达，而且文化气质与江南一脉相承，因此不仅被当作江南看待，甚至可以说是唐代的“江南之魂”。唐人赞美江南的许多诗歌，其实都是在描写扬州的。

可以说，作为一个“文化心理”概念，“江南”这个地名拥有了极强的伸缩性和包容性，可以跨过长江的鸿沟，将江北的扬州当作“江南”。不过到了近代，由于运河航运的衰落，扬州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原本凭借经济、文化实力跻身“江南”的城市，也不再被当作“江南”看待，而回归名副其实的“江北”。

不过即使在今日，问起扬州是不是江南，相信不同的人依旧会有不同的答案。数千年来，“江南”从一个模糊的地理区域概念，到一度确凿可寻的行政区地名，再变为微妙的文化心理概念，它身上承载的，先是北人对于南方模糊的认识，再是中国人对于人间天堂的向往和寄托。然而究竟哪里是天堂？实在难回答。于是看似简单的“江南”，就成为了最令中国人向往、也最让人捉摸不定的一个地名。

定格的“江南印象”
柔和婉转的水磨腔，飘逸缠绵的水袖，再配上美丽的园林，这样精致的优雅与似水的柔情，正是今人的江南印象。
供图／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一头广东，一头广西

广东广西，合称“两广”。作为分界的这个“广”，曾经是个县名，与山川河湖无涉。但粤桂两省交界一带，的确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云开大山，跨越广东的郁南、罗定、信宜和广西的梧州、岑溪、北流等县市。两广之变，非源于此山，却又与山脱不开关系。供图/视觉中国

“两广”之变

撰文／刘琼

广东和广西，以何为界划分东西？这个“广”字却从何来，又是何意？

你写错了一个“广”字？

中国有“两广两湖两河山”：山东山西以太行山划东西，湖南湖北以洞庭湖分南北；河南河北的情况稍复杂一些，古时分界为黄河，现在是漳河。但两广就比较特殊了，分界的“广”可与山川河湖没多大干系。

两广，是中国广东、广西两省地名的合称，以前写作“两廣”。这个“广”，在古代其实是两个字——“广”与“廣”。新中国推行简化字时，字形复杂的“廣”字被归并为“广”，于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廣”就成了“广”的繁体字。而事实上，这两个字原本读音不同，字义也不同。

广，古音同“俨”，字形从“宀”(mián)而来。“宀”的甲骨文写作 ，是其本义“房屋”的象形字，两面立墙 ，搭上斜坡顶 ，就成了最简单的房屋侧视图。现在小朋友们画房子也常常是这样画的吧？将屋子或拆掉一面墙 ，或拆去一半 、把屋顶砌平一些 ，就成了“广”字，本义即“开放局部、空间开阔的房屋”。

不过，什么样的房子会只搭建一半墙体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这样解释：“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半墙半顶的“广”，乃是依傍山崖交叉搭建的高屋。因此，“广”字又衍生出“偏僻乡野、简陋棚屋”的意思。如唐代韩愈的“剖竹走泉源，开廊架崖广”，元代袁桷（jué）的“土屋危可缘，草广突如峙”，这两句诗里的“崖广”“草广”，指的都是简陋草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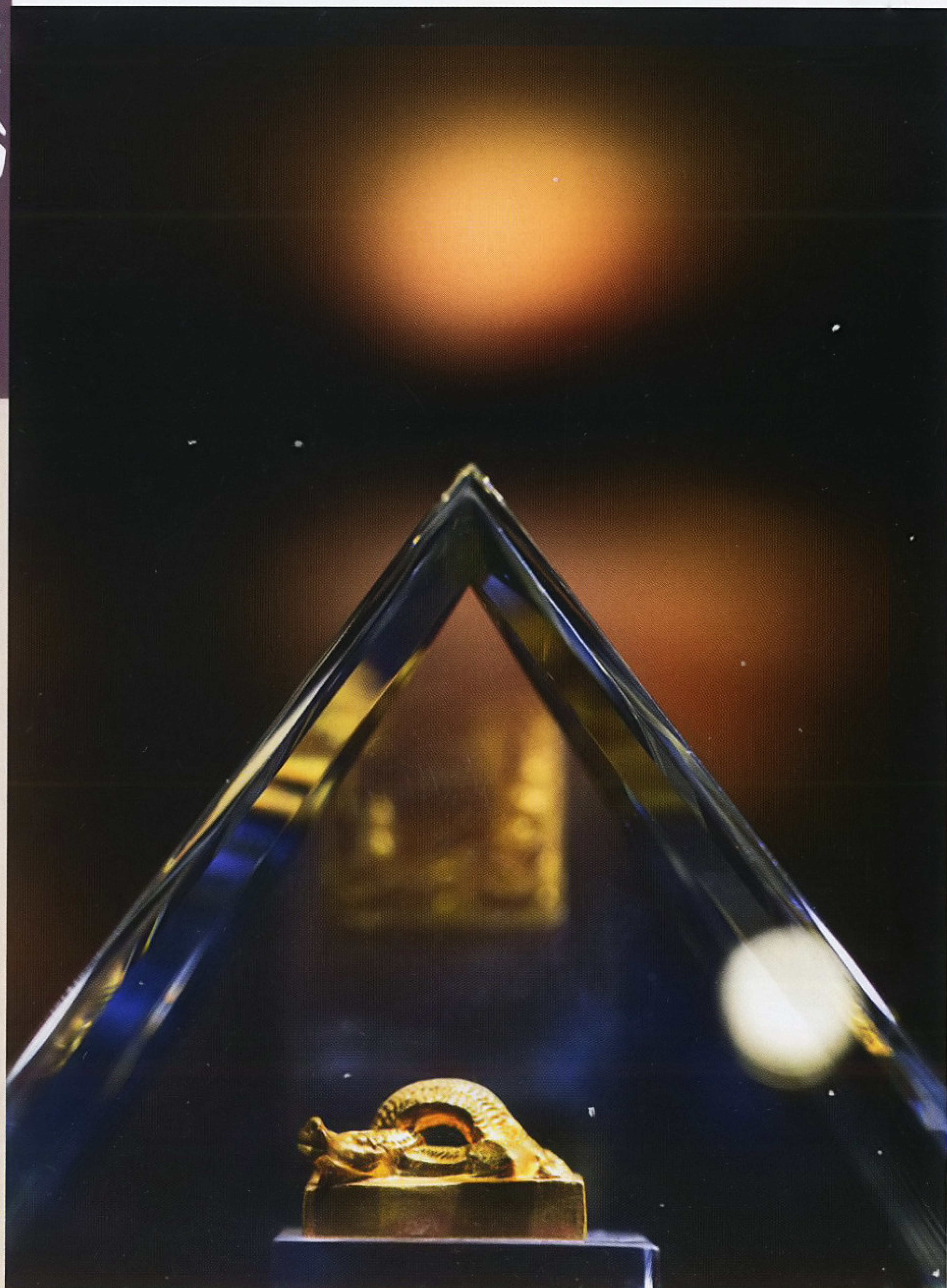
再说“廣”字。廣的甲骨文写作 ，由 （“宀”）围住 组成。被释读为“黄”或“寅”，二字同源，字义是在箭杆 中间加一圈指示符号 ，表示箭支穿透箭靶，中间再添一横，强调正中靶心。因此， 字的本义是指“军中习射的大厅”。也许是为了书写简便，也许是因为传统习射场地被扩建或改造，金文造字将 改成了 （“广”），最终形成后来的“廣”字，并增加了广大、广阔等引申义。

是偶然还是必然？“廣”之一字落名岭南前后，及“两廣”千百年来的几次重大变迁，竟然都像这字形一样，挟裹着一股兵戈之气。

两广曾经的霸主

图为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象岗山腹心深处，墓主赵眜（mò）是南越国第二代王（约前137年-前122年在位），自称“文帝”。此印出土于赵眜身穿的丝缕玉衣的上胸部位置，应是他发布命令的官印。赵眜死后十余年，南越国便被汉武帝所灭。

摄影 / 柳叶氘



南疆既定，廣信初开

上溯两千五百年，两廣所在的岭南，还是瘴烟遍地，鸿蒙未开。岭南因位于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之南而得名，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其西倚云贵，从北至东横亘蜿蜒的五岭、武夷山脉，又连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其与中原分隔开来。先秦时期，中原以外的南方民族统称“蛮”。往下细分，长江以北的称“夷”，长江以南的叫“越”。因越族支系众多，至迟在战国就有了“百越”的称呼。今两广所在处分布着西瓯、南越等大系，越人断发文身，民风彪悍，从西周开始就与中原有所往来。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志在一统天下的嬴政，发兵五十万南下平越。大军分五路：一、二路经漓江、贺江攻入今广西；三、四路借连江、北江直插今广东。岭南地势复杂，秦军苦战不下，又兼粮食乏绝，主将屠睢在一次夜战中身陨西江畔，第一次平南失败。四年后，沟通湘、漓两江的灵渠竣工，后勤供应就此通畅。翌年，百越皆平，嬴政设南海、桂林、象三郡，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两广之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平南大军的第二任主将叫任嚣，战后被任命为南海郡尉，也是岭南三郡的实际掌舵者。军中副将是个二十多岁的河北人，叫赵佗，出任南海郡下龙川县的龙川令，至今龙川还有个镇子叫佗城镇。赵佗此人颇有远见，他在战后立即请旨求遣送三万妇女南下，帮助南征士兵就地成家，相当于为朝廷提出了大规模移民实边五年计划，因此颇得任嚣看重。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时，任嚣病危，召赵佗面授机宜，令其代理南海郡尉。任嚣去世后，赵佗迅速封锁了中原通五岭的道路，聚兵自守。公元前204年，他又向西攻并桂林、象郡，建立起地域广阔的南越国。

此时的北方，轰轰烈烈的反秦斗争，也以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十八王而结束。待汉王刘邦陆续收拾完诸王，打赢楚汉战争，大汉外有匈奴，内有叛乱，刘邦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舒舒服服地当政近七十年，把后代的福也顺便享了。等到他孙子继位时，遥远的北方帝座上，汉武帝抬头瞟了一眼匈奴，又垂首遥望了一下南越——赵家人的窝该挪挪了。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相吕嘉叛乱，杀南越王与汉使节。把匈奴打回漠北老家的汉武帝腾出手来，遣十万大军南下平越。次年，统治岭南九十三载的南越王国灭亡。

为尽快消除南越国的残余势力，汉武帝将南越故地分而治之，划分为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等七个郡。次年，从合浦渡海，攻下产珠大户海南，增设儋耳、珠崖二郡，形成“岭南九郡”，计61县。岭南的郡县制度，立于秦皇，但直到汉武时期才真正确定。

九郡中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富庶的是苍梧郡。择郡治时，官员们一转一看：今广西梧州至广东封开一带很是



海外来珠

西汉武帝时，合浦郡下辖5县，治所位于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东北处。“合浦”意喻“江河汇集于海之地”，这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曾经出土过大量的琉璃玛瑙等舶来品。上图为考古人员在合浦县发现的绿松石水晶串饰和肉红石髓动物串坠，可能来自南亚地区（摄影/柳叶氘）。下图为合浦县文昌塔70号墓出土的西汉玻璃杯（摄影/动脉影）。



不错嘛，三江交汇，交通便捷，就这儿吧！于是此地诞生了一个新县，名曰“廣信”。南疆既定，“廣信”初开，从此，“廣”字就在岭南扎下了根。

“廣信”这个地名，透着股中原的醇厚与文气，跟当时岭南的其他地名譬如阿林、博罗、番禺相比，显得非常“不岭南”，但一直也没有被旁人刻意讨论过。直至民国蒙起鹏在《广西通志稿·地理编》中引用了清代经学家江藩的论述：“县名廣信者，谓初开粤地宜廣布恩信也。”此番考证一出，大家都很服气——若当年真有人向汉武帝提议，从“初开粤地宜廣布恩信”取字“廣信”，作为郡治名，必定能博取武帝的欢心。因为单从字义来看，“信”字除却恩信怀远的寓意，也是地方对中央表征臣服忠信的用字；而“廣”字在起源上就带着金戈铁马的影子，有几分昭示大汉烈烈军威广达岭南的意思。廣、信二字恩威并施、反馈明确，可谓恰如其分。这马屁实在是拍得一唱三叹，很有深度。



“广”的源头

这是广东封开县2006年在江口镇犀牛山上建成的一座仿古塔，名为广信塔，以纪念在岭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广信县。广信县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今广西梧州至广东封开一带建立的新县，起初只是苍梧郡的郡治，后来发展为一级行政区的治所。两广的“广”字，便是从广信来的。

供图／视觉中国

廣信开始只是苍梧郡的郡治，后来汉武帝为加强地方控制，在郡之上增设了一层监察机关，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负责监察岭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也设在了廣信。随着刺史部职能的逐渐转化，廣信成为实际上的一级行政区的治所。因此，这时期的岭南又被称作“交廣”。

孙权“创造”了廣州

因偏安南疆，交廣一带避开了北方的动荡。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东汉中期，在全国各郡的人口呈负增长或低增长的情况下，交廣的人口数却翻了一番甚至两番。又兼水路畅通，坐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港，故而在东汉末年，交趾刺史部变成了交州，正式升级成地方一级行政区划。

就像我们知道的，南蛮之地民风彪悍。东汉末年派驻交趾的官员，如朱符、张津，相继在任上暴亡。流水的刺史，铁打的领主，大权在握的其实是本地的士氏家族。

士氏的家主为出生于廣信的士燮。《三国志》记载，士家出门皆“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妥妥的土皇帝。而此时的孙权，手中仅握扬州及一小部分荆州，北有曹魏——兵强马壮，啃不下；西有刘备——刚结亲家，不好意思打；而往南，交州这块土地则大有可为：既能提供数量庞大的少数民族兵源，“增健兵之锐”，又可借港口及海上丝路发展商贸和造船，万一遇到最坏的情况，还能以之为退路，“乞寄命交州”，再青山拾柴徐徐图之。

但是，瞄准岭南这块肉的还有其他群雄，最急切的当属交州的邻居——

荆州牧刘表。208年前后，交州刺史张津一死，刘表即遣麾下赖恭、吴巨分别为交州刺史、苍梧太守，意图占据交州。可惜这二位队友拖后腿——吴巨不服赖恭，发兵把后者驱逐了。这事一闹上朝廷，群臣大哗：你一个荆州牧，怎么敢越过朝廷委派一州刺史！但缺人又乏力的朝廷，最后不过是给交趾太守士燮挂了个虚职，下玺书委托其领交州。养精蓄锐的孙权，终于在210年派出了他的交州刺史——自己的另一个亲家，步骘。

这时的交州，成为刘表、孙权与朝廷的三方博弈之地，谁能吃下交州，就同时拥有了地盘和威望。步骘刚一到任，就斩杀了吴巨。"地头蛇"士燮也看清局势，自己打不过，小朝廷管不了，地方豪强才是老大，于是果断率全族投诚。岭南始归孙吴。

孙权礼遇士燮，士家男丁全都封了官。但当226年士燮去世，孙权慰问完士家，回头就拟定了一份收复交州的四步走计划：

第一步，将交州一分为二，交趾以南仍为交州，合浦以北的大片区域，新设一州以掌之。因州治从廣信迁来，故新州保留"廣"字，命名为"廣州"。

我们熟悉的"广州"，在史册上首度现身了。相对于现在的广州来说，那时的"廣州"可谓体量庞大，范围涵盖除北海、钦州、玉林、湛江（即环北部湾区）以外的两廣大部分地域。最重要的是，交州经济核心、也是士族的老家苍梧郡被划归廣州，廣州的州治又从苍梧廣信迁往吴将新筑的城池番禺，大大削弱了交州统领士家的势力。

如果说这一步还能咬牙忍下，孙权的第二步就令士家伤筋动骨了。他将士燮之子士徽打发去遥远的九真郡，重新委派心腹出任廣州、交州刺史和交趾太守，打破了由士家人出任交趾太守的潜规则。分他的家，撤他的权，流他的人，逼得士家不得不抗命。士徽一个脑热，抢先跑到交趾郡，就任了太守。

于是，孙权顺理成章地走出第三步——发兵，征讨士徽。三千名武装到牙齿的精兵轰隆隆开拔南下，士燮的儿子们慌了，光着膀子请罪，"肉袒奉迎"大军入城。士徽被斩杀，他的兄弟们被迫观看行刑。偌大的岭南，终于被孙权实打实地攥在了手心。

事到如今，"廣州"的使命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最后的一步，孙权为安抚余下的士家族人，集中精力对抗北方曹魏，又取消了交廣分治，废廣州而复交州如故，以安定南方——当然，几年后，士燮的儿子们还是一个个地被找借口清算干净。

这第一次短暂的"交廣分治"，孙权可谓给全天下的地方豪强上了一堂课，现身说法"什么是政治家"。同时，他也在这片土地上首次植入了"廣州"这个概念。等到永安六年（263年），吴国第三位皇帝、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在位，交州反叛，孙休为切断造反三郡与海东诸郡的联系，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于次年"复分交州置廣州"，廣州，获得了第二次新生，州治番禺。至此，"交廣分治"最终完成，两廣之地作为一块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岭南分离，踏入下一个历史纪元。



盖在总督府上的教堂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初驻肇庆，乾隆十一年（1746年）移至广州。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将两广总督府夷为平地，罗马教廷传教士明稽章威逼两广总督劳崇光，要求将总督府所在地划给他建教堂。经咸丰皇帝批准，1863年，圣心大教堂在原两广总督部堂基址上正式开建，历时25年终成。右为圣心大教堂的空中俯视图。
摄影/陈冲

杨廣：只有我才可以叫“廣”

六朝时期，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地方建制“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统治者又对岭南实施羁縻政策，将土著民族聚居区从原州、郡里分离，划出新的左州、左郡、左县，并原地封土官，导致州郡数量猛增。加之自永嘉之乱后，廣州陆续接纳了大量中原汉人，两廣之地被一步步割裂，到陈时已分属19州66郡近300县，是当地郡县设置最多的一个时期。

此时，郡的划分反映出两廣依托水路交通沿江发展的特点。如新增郡县多沿江分布，《宋书》描述两廣州郡的地理位置，也常用距离京都/州治水路多少里来表示。其中，廣州“去京都/州水”的表述在全国所有州中是最多的，达24条。

郡县的冗余导致治地的分割碎裂，隋朝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旨“罢天下诸郡”，将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到公元600年时，廣州家中坐，麻烦天上来——大隋改立太子了，新上任的太子就叫杨廣！这可犯了名讳。于是，朝廷大笔一挥，“廣州”改名叫

"番州"。

这位跟廣州颇有缘分的太子一登位，即"改州为郡"，恢复秦时郡、县两级制，并对郡县数目进行了大幅度缩减。缩减完毕后，两廣之地只余13郡108县。这13个郡，每一郡都至少有一条大河贯通，形成以流域为主的行政区域，例如，同属北江流域的所有州、郡合并为南海郡。部分同一流域地域，如遇山峦阻隔，则依山形再行划分，如依据云雾山脉划开永熙郡和高凉郡。显然，隋炀帝在岭南的建制划分并非简单的精简合并，而是一次根据"山川形便"所实施的较科学的地域重新规划。

唐宋：岭西崛起，道分东西

从六朝到隋朝，今广西在岭南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并不显要。《隋书·地理志》称："南海（今广州）、交趾（今越南河内），各一都会也……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可见，两廣地区的经济、政治依旧以廣州为中心。但隋文帝注意到了湘桂走廊的军事战略意义，在始安（今桂林）设置桂州总管府，掌17州军事。此后，岭西地区加快了崛起的步伐。

隋末大起义中，岭南崛起很多实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如占据桂州的始安郡丞李袭志、高凉本土酋领冯盎等，部下撺掇他们仿赵佗割据一方，均被严词拒绝。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派大将李靖率军平南，李靖一路招抚，李袭志率先归附。唐军进驻桂州，李靖在漓江畔修筑子城，今桂林榕湖边还可见古南门城楼遗迹。翌年，冯盎接檄，奉地降唐，岭南实现和平统一。

李唐平南与西汉平南，都是在短



汉武帝划岭南为九郡



公元263年广州交州分离



宋太宗将广南路拆分为东西两路

暂的大一统又社会分崩之后的南进，也都面对同样骁勇顽强的地方割据势力，但结果却完全不同。除却其他客观因素外，一个重要的主观变化就是：自西晋以后，历经四百多年的经济发展、汉越交融，岭南的民族成分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中华民族归属感持续增强。只要中央王朝强大，边疆民族齐心，任何割据地方的企图必将落空。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充分借鉴了隋炀帝时期的山川形便原则，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两廣属岭南道。朝廷又在边疆要冲之地设总管府（后改都督府）。当时岭南有五个都督府：廣州、桂州、容州（今北流）、邕州（今南宁）、安南。五个都督府后来演变成“岭南五管”，五管之中一个在廣州，一个在越南，剩下三个都在岭西，桂州、邕州的军政地位持续上升。

唐懿宗时代，因邕管的土著居民连番叛乱，岭西边疆也频繁遭受南诏国的侵扰。于是咸通三年（862年），为加强中央对岭西地区的控制，懿宗将岭南道划分东、西二道，东道治廣州，西道为平乱，治所定为邕州。岭南西道的设置，标志今广西政区雏形的诞生，岭南东、西分治的趋势也明朗起来。

宋代建立之初，宋太祖为革除唐末地方节度使截留本地赋税的积弊，在各道设转运使，运送地方赋税。因转运或辖陆路、或辖水路，于是开始用“路”来称呼原本的“道”，并在后来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名。开宝四年（971年）平南后，岭南成为廣南路，“南”取国之南疆之意。雍熙三年（986年），继位的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平辽北征全盘失败，将精力从“武功克受”转向“文德致治”。他孜孜不倦地听断政事，经常到正午还顾不上用膳。为了更有效率地打理内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拆分廣南路为东西两路。

廣南西路的析出，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推动。

岭西经唐宋两代经营，已是商旅云集、货物丰盛、崇墉复宇。桂州百姓广种木棉和苎麻，户户纺织，有些织户甚至将纺轴系于腰间，边走边织。桂布因织前要先用稻穰芯烧灰煮麻丝、再涂以滑石粉，故而雪白绵密、纹理紧致、厚重结实。白居易还专门写诗《新制布裘》，夸赞桂布“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至南宋绍兴年间，岭西每年仅按规定上贡朝廷的桂布就多达17748匹，还有大量柳布、象布、古县布通过宋廷设在岭西的三个博易场（邕州的横山、永平及钦州博易场）外销出口。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铜、锡、铅粉产地。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给出了一组统计数字：绍兴末年，全国年产锡量为20548.6斤，岭西贺州就占了12600多斤，相当于总产量的62.5%；仅贩售黑铅粉一项，经略司每年即可获利钱两万缗。

成因之二，是宋王廷管控岭西边疆的需求。北宋政治家曾巩曾在《廣西转运使制》中写道：“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为西部，非独镇抚吾民，亦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山河有别

两广都有山，但地质地貌却有不同。广西以桂林阳朔的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地表崎岖，地形复杂，不利灌溉（图2，供图/视觉中国）；而广东的山间盆地与沿河平原，却适宜农业耕作，特别是河网密布的珠三角地区（图1，摄影/卢冠东），既利于农桑，又毗邻港澳，从而孕育出发达的商品经济。本是一体的广东广西，最终变成两广。

以绥驭山居谷聚并海之蛮夷。”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说，廣西但凡有战事争端，不用向转运司或提点刑狱司汇报，直接由“省军区”经略司负责。其边疆地位被提升到与陕西等同的地步，足可见宋王朝对岭西地区的重视。

于是，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以古廣信所在的梧州、封开一带为界，划开东、西，再大致沿山脉走线——廣信以南，沿云开大山—云雾山脉一线；廣信以北，沿大桂山谷道至起微山脉——将廣南路分廣南东、廣南西二路，治所分别为廣州、桂州。这就是今广东、广西得名的由来。此后，它们分别成为一个固定的、独立的行政区划，直到元末明初各自独立为省，至今未变。

两广之地地域相连，文化同源，族属相通，生活相依。因军事征服而合，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奔向各自的前程。但纵有一条蜿蜒省界相隔，源头处那块叫“廣信”的方寸之地，仍一头连着广东，一头连着广西。

“山东”变身记

撰文／小溪

在今天，“山东”是中国东部一个面积不算大的省；在古代中国，“山东”曾是崤山以东、太行山以东，范围十分广袤。这历史的“大瘦身”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一个山东人穿越回先秦，听人谈起“山东人”时，千万不要乱认老乡。那时候的“山东”，和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战国时代，一个“山东”，占据了神州一半以上的土地；而如今的“山东”，仅是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一个。如此巨大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

崤山以东的“山东豪俊”

在春秋战国乱世，“山东”常被权谋家们挂在嘴边。有一次，齐桓公向管子说道：“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

长江流域的楚国，以江汉平原为发家之地。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和“山东”是八竿子打不到的关系，何以能称“山东之强国”？

因为，先秦人所说的“山东”，是一座山的东边。这座山，是秦国的战略重地——崤山。崤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西部洛宁县西北，西安、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常与附近的函谷关并称“崤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所以这时候的“山东”，是一个地理区域地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人们常把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称作“关东”，所以“关东”与“山东”乃近义词。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就位于崤山以东地区，故可称“山东之强国”。

其实何止是楚国，崤山以东的诸侯国，都是“山东”之国。也就是说，在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其他六国都在“山东”，史称“山东六国”。这种标准定义下的“山东”，完全就是秦人的视角。虎狼之国大秦，野心勃勃地盯着“崤函”以东的土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山东”，吞并六国，一扫六合。

当然，“山东六国”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联合起来西向抗秦，史称“合纵”。即使被秦所灭，也能在秦末起义中卷土重来。汉初政治家贾谊回顾秦末起义，曾说：“（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陈涉起义伐秦，山东豪俊并起，这里的山东，就是与曾经的秦国相对的六国故土。

“山东”一词，道尽了东西两大军事集团以崤山为界的对垒历史。到了西汉时期，国家定都长安，长安以东的崤山、函谷关依旧重要，故“山东”仍是指崤山以东。

太行山的"上位之路"

《魏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北魏第二任皇帝拓跋嗣统治期间，首都平城遭受灾荒，拓跋嗣打算迁都邺，被博士崔浩劝止。替代方案是，分一部分特别贫困的人"就食山东"。

邺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在太行山的东边。所以这里的"山东"，指的就是太行山以东。

其实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口中的"山东""山西"，就逐渐变为以太行山为坐标了。比如《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称赞大将邓禹，"斩将破军，平定山西"，此"山"指的就是太行山。

太行山凭何取代了崤山？这与长安、洛阳两都的命运息息相关。

东汉开国，旧都长安被暂时"抛弃"，关中地位下降，新王朝以洛阳为都。比起崤山，洛阳北面的太行山脉此时变得更为重要。尽管后来隋唐又以长安为都，但关中早已不是秦汉时富饶的"八百里秦川"，于是皇帝常常携家带口，就食于东都洛阳。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山东"之"山"的转变，是中国政治中心东迁所决定的。再加上太行山本身高大巍峨，山脉连绵不绝，北部是防御塞外的军事重镇，东麓是肥沃平坦的河北平原，南部又紧挨着黄河渡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之作为东、西界标，也就顺理成章了。

山东省的"诞生"

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随后，这个少数民族王朝对宋朝的故土重新命名建置区划。比如将原宋朝的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改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东路以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为治所，西路以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县）为治所。

路，是金朝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也就是说，从金朝起，"山东"第一次成为行政区地名，而且属于最高一级行政区。

与作为地理区域的"山东"相比，作为行政区的"山东"，不仅有了明确的边界，范围也缩小了很多。不过它除了拥有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外，还包括今河南省的濮阳及江苏省北部的徐州等地区，可谓是一个"大山东"。

其实这样的"山东"，早已有了原型。早在西汉时期，"山东"除了指崤山以东外，有时还会专指齐鲁地区，比如《汉书》记载，西汉的梁孝王，曾"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不过当时专指齐鲁的"山东"，远不如崤山以东的"山东"知名度高。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式设立山东行省，八年之后，改为山东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山东行省，治所在济南府，辖境与今天的山东省大体接近。清承明制，设山东省，无论是治所还是辖境，都与明代相近。现代山东省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辨。而"山东"这个地名，也终于完成了由崤山以东，到太行山以东，再到今天山东丘陵地带的历史性"变身"。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链接

看地名 识省会

省会选址，通常占据了一个省份最精华的地理位置，例如，依山凭河，有险可守，或者交通便捷，可行水运。因而多数省会城市因山川得名。还有一些省会名称，源于统治者的征服，希望新获疆土安定昌盛。因此，看地名，便可识省会。（注：以下内容涵盖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

西北

乌鲁木齐
优美的牧场

维吾尔语地名。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汗国的末期，筑垒屯兵，确定此名。

银川
闪着银光的平原

明末清初一些官吏、文人常用“银川”形容宁夏平原上沟渠交织的秀美景色，再加上银川地区盐碱地众多，土壤泛白，因此取名银川。银川市正式设立于1947年。

西宁
西陲安宁

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

兰州
城南有皋兰山

隋开皇元年（581年）始名。

西安
西部安宁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奉元路为西安府。

西南

成都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成都来历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记载，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也有说法认为，“成”有军事征服之意，成都是秦灭蜀后新设之县，意为平定的城市。战国时期，秦国置蜀郡，设成都县为郡治。

拉萨
从山羊地到圣地

拉萨是藏语“Lhasa”的对音，为“圣地”“佛地”意。拉萨古名“惹萨”（Rasa），是“山羊地”的意思，据说源于建大昭寺时白山羊负土填湖的故事。大昭寺建成后，朝拜者络绎不绝，逐渐成为有名的佛教圣地，“Lhasa”也逐渐代替了“Rasa”。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将都城迁至今拉萨地区。

贵阳
贵山之南

明隆庆三年（1569年）改程番府置贵阳府。

昆明
昆明族

古代云南民族的族称。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昆明县。

直辖市

北京
北方的京城

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

天津
天子经过的渡口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河南下争夺皇位。朱棣即位后，改地名为天津。

上海
地居海之上洋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始设县。

重庆
喜而重庆之

一说典出《诗经·鲁颂·閟宫》郑玄笺，庆祝鲁僖公继承祖业，勇于用兵，中兴鲁国。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改恭州为重庆府，表明自己要学鲁僖公，继承孝宗未竟事业，光复河山的意愿。

东北

哈尔滨
晒网场

满语地名，含义说法纷纭，有“晒网场”说、“声望”说，也有说法认为是“扁”的意思。元时已有“哈儿宾”。

长春
祭天祈福语

满语地名。有说源自长春花花名。清嘉庆五年（1800年）设长春厅。

沈阳
沈水（今浑河）之北

中国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名始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

华北

呼和浩特
青色之城

蒙古语地名。1954年归绥改称呼和浩特，此前为绥远省省会。

太原
广阔平原

战国秦庄襄王四年（前246年）置郡。

石家庄
石姓聚集地

因石家庄村得名，最早见于明代。

华中

郑州
春秋时期郑国属地

隋开皇三年（583年）改荥州为郑州。

武汉
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统称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逐渐形成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1949年置武汉市。

长沙
长沙星之分野

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之地以应长沙星，故长沙又称“星城”。长沙之名始于周初，《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上各方国献的方物中就有“长沙鳖”。

华东

济南
济水之南

名始于汉初。

合肥
施水合于肥水

施水（南肥河）合于肥水（东肥河）处。秦始置合肥县。

南京
南方的京城

明初定都于应天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改称南京。

南昌
南方昌盛

名始于秦，即《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的“南昌亭”。

杭州
大禹在此弃船登陆

杭州之名来自其辖区余杭，《太平寰宇记》记载，为纪念大禹在此地弃船登陆，取名“禹航”。也有说法为古越语，“余”是发语词，无实义，“杭”则是舟、渡之意。隋开皇九年（589年）始置杭州。

福州
西北有福山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改闽州为福州。

台北
台湾之北

清光绪元年（1875年）设台北府。

华南

南宁
南疆安宁

元泰定元年（1324年），为庆祝反元势力归顺，南疆绥服，改邕州为南宁。

广州
治于广信

汉代交州刺史部治所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广东封开一带），谓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东部，始设广州。

海口
南渡江入海之地


宋开宝五年(972年)设海口浦。

责任编辑/张舒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帝都天子城

在古代中国，天子居住于皇宫内，而皇宫所在地就是首都，即“京”。从金代开始，北京地区连续成为元、明、清三代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图为象征了帝王政治和京城地位的建筑——故宫，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金碧辉煌，气派非常。

供图/视觉中国



京 天子的选择

撰文／瑜韵

在中国，现代城市以“京”为名的，只有北京和南京。而历史上，从唯一的首都京城到两京制，再到多京制，“京”称得上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何为“京”？又为何一个朝代会拥有不同数目的“京”？其中藏着的，是帝王的旧事，行政的秘密。

周
宗周镐京

秦
咸阳

西汉
长安

东汉
西京长安

隋
雍州

唐 玄宗时期
西京京兆府

唐 肃宗时期
中京京兆府

西安

汉唐第一京

西安地区位于关中平原，地势险要，土地丰饶，人口众多，因而经常被选作中央王朝的都城。从周代开始，秦汉到隋唐，多个朝代在此设首都或陪都。上图为西安现存的城墙，是历史最悠久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供图/视觉中国

“京”是什么？翻开《康熙字典》，扑面而来是引经据典的种种解释：

《扬子·方言》：凡人之大谓之京。

《尔雅·释丘》：丘绝高曰京。

《广雅》：四起曰京。

《蔡邕·独断》：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众也。

“京”要大，人要多，要有制高点，更重要的是要住着国家的主人——天子。

京城就是国都，是王朝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天子常居，首要之都。哪里是京城，哪里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方。当一地一城成为一“京”，地位就陡然显赫起来。

周公营建第二京

公元713年的十二月初一，彻底清除了太平公主势力、终于可以坐稳皇位的唐玄宗，宣布改元“开元”，大赦天下。也在这一天，有两个地方迎来了它们的新名字：“以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

曹魏时期，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被划归雍州；洛州呢，是北魏时在洛阳地区设置的。唐玄宗为何要给这两地改名呢？因为它们是李唐王朝的两大中心点：西京和东京。“府”，本是政府官员办事机构的称谓。唐玄宗拿来做政区名，暗示两京既是政区，更是中央直属的机构。这样，二京和其他州有了区别，京城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国家的京城可以不止一个？当然。从李渊建国开始到唐玄宗为二京改名，李唐王朝一直都实行二京制：首都是西京雍州长安——京兆府；陪都是东京洛州洛阳——河南府。

不过，二京制始于西周。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这是《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的诗句，写的是周文王攻克崇国，营建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西岸）的功绩。

周文王去世后，儿子武王即以丰邑为根据地，伐纣灭商。诗中又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战争结束后，武王经过占卜，定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东岸），即为“镐京”。考古研究发现，丰邑和镐京只隔着一条沣河，这算“迁都”吗？

东汉《释名》有云：“国城曰都，言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国都即国君居住地，是人口聚会、气象繁盛的大城。周武王“宅是镐京”，说明他营建了镐京之后，就从沣河西岸搬到了东岸居住。沣河东岸比西岸的地势更开阔，新建的镐京城池和宫殿也更气派，符合此时周武王征服天下的天子身份，称得上“人所都会也”。但丰邑也并没有废弃，它和镐京有舟桥相连，《尚书》中说：周天子从镐到丰，可以步行前往。所以，研究者认为：丰、镐是西周国都的两个分区，即“周都双城”。

周武王去世，成王在镐京即位。而危机，也降临到这位年幼的周天子身上。没有被彻底征服的商人，一直在中原地区积蓄着力量，伺机而动，恢复殷商王朝。王位更替，正是商人反扑的好时机。怎么办？成王的两个叔叔——周公和召公站了出来。

周公和召公先是坐镇镐京，辅政成王，令商人有所忌惮。随后，周公又劝说成王，在殷商遗民势力范围的腹心地带营建新城：“营建洛邑是武王的遗愿，请您派我与召公完成。”经过占卜，沿洛水北岸的涧水以东、瀍（chán）水两岸这片土地建城最吉。于是，在周公和召公的指挥下，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一座“方千七百二十丈”的新城就已初见规模。

据《逸周书》记载，最终落成的洛邑王城，有周王室的宫殿、宗庙、官署，也是“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之地。只是西周时，周天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镐京，偶尔巡视居住的洛邑则是陪都。这也是后世陪都的常态：建有宫殿、皇陵和宗庙，设置与首都级别相同的官司机构，以备天子驾临。

殷商遗民被安置在了洛邑周边，受到成周八师武装的控制。至此，周天子原本的后顾之忧——商人势力，因为陪都的建成而化解于无形。

唐代政治家陆贽曾这样比喻京城和国土之间的关系：“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周王朝的国土，正是以镐京和洛邑为核心，一西一东，向外辐射的。

周天子也因为这两京，坐稳了天下共主。

西京东京，齐头并进

周天子营建陪都是按需而为之，那直接掌握辽阔疆域的统一王朝统治者们又是在何时开始热衷于东西两京的呢？答案是王莽的新朝。王莽篡汉称帝后的第四年（12年），至明堂下书："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长）安为新室西都。"王莽一向奉行托古改制，自比周朝，这东西二都也是比照镐京和洛邑确定的。

新朝的寿命很短，但二京制却得到延续。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以洛阳做首都，号"东京"，长安退居二线做陪都，号"西京"。早在二百多年前，刘秀的先祖、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差一点就选择了洛阳当首都。

秦末乱世，中原腹地的洛阳仍旧繁华，吕不韦营建的南宫更是风景宜人。当结束了漫长的楚汉之争后，刘邦入住洛阳南宫，准备建都。这天，南宫外，一位名叫娄敬的戍卒正等待着刘邦的接见。刘邦本来只想敷衍几句，打发走这个狂徒，却没想到娄敬献上的，竟是迁都建议："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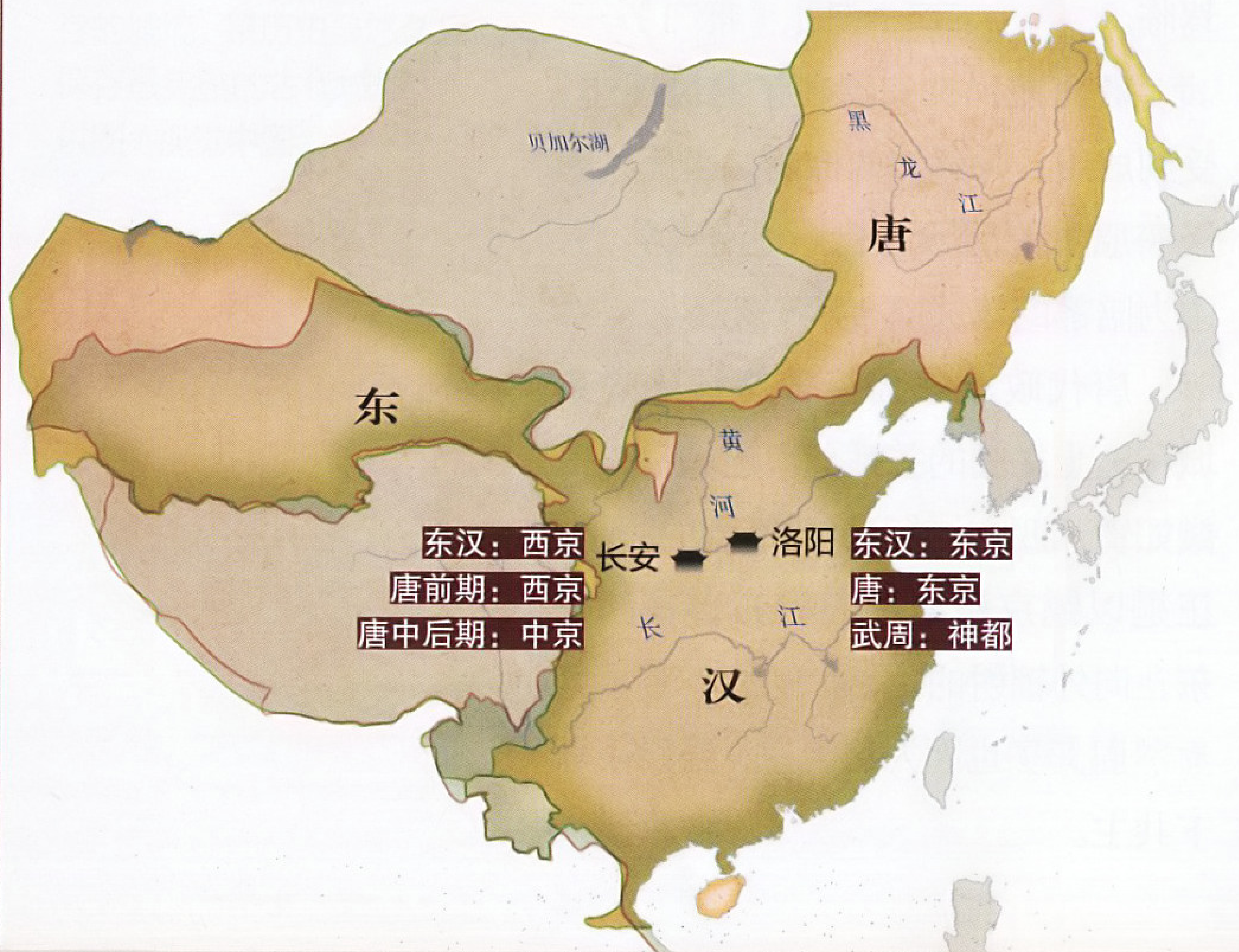
为何呢？娄敬细数定都关中的好处："山川地势易守难攻，户口众多便于征兵，土地富饶人称天府。最重要的是，如果山东地区发生叛乱，身居关中便可以远离战事，掌握全局。扼天下之喉，拊天下之背。"

地形、人口、经济、军事，这四点的确是选择京城必须考虑的要素。刘邦有些心动，于是向留侯张良征求意见。张良也支持娄敬："洛阳占地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比不上关中金城千里。"刘邦被说服，离开洛阳，西都长安，正式开启了西汉王朝。

时光荏苒，当刘秀称帝时，国家形势又有了新变化。随着20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比起关中平原，已经不落下风了。刘秀起兵征服天下，依靠的就是中原势力。何况王莽时期的乱局令长安饱受其害，一时之间很难重现繁荣。有鉴于此，刘秀将洛阳定为首都，同时也没有放弃长安的优势，将之定为陪都。东西两京分别设立在当时版图上中原和西北这两大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国家也因此得以平衡发展。

隋、唐完成统一后，延续了二京体系，定西京为首都，东京为陪都。不过，此时西京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靠近国土中心；而关中平原的粮食生产力，也渐渐落后于中原；何况洛阳还可以通过大运河，连

东汉、唐两京地图





接日益发展蓬勃的江南地区。虽然是陪都，但洛阳在唐代的意义，大有赶超长安的势头。唐玄宗同时改变雍州和洛州的称谓，正是两京地位同等的证明。

陪都，是神话？是尴尬？

公元723年，唐玄宗将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地区）建为北都，更名太原府，后改为北京，原因是“兴王始封之地，鸿图创业之初”。并州太原府是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地，象征着帝国基业的根本。新建的“北京”是一种特别的陪都——龙兴之地。其后，北宋的南京应天府，是宋太祖赵匡胤起家的大本营——宋州（今河南商丘）；明王朝的“中都”，是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清王朝的“盛京”，则是努尔哈赤建都的沈阳。

这类陪都有什么用呢？东西二京占据地利，制衡天下，作用在实的方面；龙兴之地则是祖宗基业，天命的象征，作用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北宋的应天府就是典型的例子。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携带着“天书”南巡亳州，拜谒老子太清宫。据说，当载有“天书”的车辆经过应天府时，出现了一场奇观：五彩祥云在空中变幻，如繁花绽放，草木丛生；黄色烟云掩映下，似乎又可以看到仙人们手牵着手，站在车辂之上。宋真宗命人占卜吉凶，卜者道：“春云如花木者，木旺与德相

神都在洛阳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曾多次成为首都或陪都。隋唐时代洛阳都城的遗址，位于今洛阳市近郊。左上图为定鼎门遗址广场上演的3D灯光秀，投影出洛阳在武则天时期的称谓：“神都”（供图／东方IC）。上图为应天门遗址出土的唐哀帝继位玉册，体现了洛阳作为都城的政治功能（供图／聂鸣／FOTOE）。左页为汉唐两代两京地图，长安和洛阳一西一东串联起疆域上两大核心区域。

生；如人连袂色黄者，子孙分土延祚之兆也。”——天上奇观说明您治国有方，德被苍生，今后王朝定可以代代相传，永延帝祚。

祥云瑞彩无疑又为“天书”神话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应天”这个府名更是相得益彰。宋真宗一高兴，第二天便宣布：应天府为南京；太祖幕府的旧僚子孙，全部加官进爵；当地居民的食盐税钱，一律减免。应天府这一龙兴宝地，就这样以陪都的身份，与宋真宗炮制的神授“天书”事件一起，完成了神话赵宋王朝的使命。

但陪都的设置，并不总是伴随着王朝的兴盛与稳固。有时候，为京城做加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载（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在范阳（今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一带）起兵，史称“安史之乱”。叛军攻破潼关，兵临西京，长安城岌岌可危，唐玄宗父子不得不仓皇出逃。玄宗逃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避祸，而太子李亨则在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宣布即位，起兵平叛，尊玄宗为太上皇。一时之间，李唐王朝在益州和岐州同时出现了两个临时都城：益州有避难的玄宗和群臣，仍是王朝的政治核心；岐州是肃宗李亨的驻跸之所，是收复两京的军事大本营。

蔡邕曰：“天子所居曰京师。”但如果两州分别住着两位天子，两个朝廷都有政令施行，而真正的首都和陪



东京梦华

安史之乱以后，关中地区因为战乱而经济衰落、民生凋敝，处于运河漕运中心的河南开封，却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控制全国南北交通的动脉，成为了五代和北宋的都城首选。图为位于今开封市老城西北的清明上河园，根据《清明上河图》复原了北宋东京开封城人烟熙攘、舟桥相连的繁华景象。

供图/视觉中国





北宋·辽 多京体系地图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京城体系增为五京，环卫首都长安。北宋继承了多京体系，以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为陪都，分担一部分都城职责，并对首都东京开封府形成防御屏障。北方的辽国政权也采用了多京体系，用五京将国土划分为五道，分区管理。



南宋·金 多京体系地图

南宋以临安府为都城，称为“行在”，名义上仍以北宋四京为京城。而实际占领了北方的金国，则延续辽国的多京体系，设六京，以燕京大兴府为首都。金国的六京也是路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起到分区统治国土的作用。

都，却被反叛者盘踞。如此尴尬的局面，该如何面对呢？

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肃宗发话了：“升岐州为凤翔府，做西京，原西京京兆府改为中京。升益州为成都府，做南京。”两个临时都城都升了府，成了陪都，既明确了肃宗的君主地位，也保存了玄宗的颜面。

成都这个陪都，实在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之设。叛乱平息，两京收复。挂着“南京”名号的成都府，和重回长安城的太上皇，成了肃宗皇帝心底的刺。他先是把父亲软禁在了甘露殿，又在上元元年（760年），撤掉了成都府“南京”的称号，“复为蜀郡”。成都这个接待了出逃皇帝的“南京”，被永远地封存在岁月长河里。

加一个京城，加一道防线

唐肃宗减去了成都，却又加上了一个新“南京”：改荆州为南都江陵府。新“南京（都）”江陵府位于长江中游，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江陵府和中京京兆府、东京河南府、西京凤翔府、北京太原府一起，形成了唐王朝中后期的多京体系。

这么多“京”有必要吗？

如果说，两京体系是在首都外增加一个点，连出一条线，那么五京则把京城体系，从线扩张到了面。无论东汉还是唐初，中原王朝的首要边防压力都是西北民族，领土扩张的方向也偏向西部地区。二京所在的东西线正好和边防线垂直，足以完成对领土的有效控制。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边防压力骤增，北方尤其是东北，变得危机四伏。东西二京与边防线成

了平行关系，对领土的控制力就变弱了。而五京体系中，南、北、西京都位于军事重镇，拥有地理优势，可以成为保护长安、洛阳二京的屏障。由此看来，五京比二京更切合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

五京不是唐肃宗的首创。战国时，齐国就有“五都”的说法，是一种类似郡县的领土划分方式。而曹魏也有“五都”，除了洛阳和长安以外，安置东汉皇室的许昌，具有龙兴意义的谯和邺也都号称国都。但唐肃宗的五京，则是少见的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多京体系，尤其是南京江陵府，既不曾住过皇帝也不曾出过皇帝，成为陪都，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

北宋王朝受疆土所限，唐代的首都择开封府作为首都。但开封交通四周缺乏屏障，防御能力相当弱。如何巩固首都的地位和安全性？北宋君臣选择向唐肃宗取经，给京城做加法。

庆历二年（1042年），宰相吕夷简和邠州观察使范仲淹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事情的起因是一条刚刚传到开封的边境军情密报：辽兴宗年轻气盛，听说北宋和西夏开战后，意欲趁机举兵南下，一统中原。

范仲淹当过开封知府，很了解首都的城防。他向仁宗建议：“应当城洛阳，以备急难。一旦边境线上有变，就转移到山川形势更适合防御的西京洛阳。”而吕夷简则有不同意见：“当年澶渊之盟之所以能够签订，靠得是真宗皇帝御驾亲征，震慑了契丹。如今不如兴建北京，做出亲征的姿态，一来示威，二来也可以在河北地区增加一道防线。”吕夷简希望兴建的北京，是距离宋辽边境线不远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

看宋仁宗，已经被吕夷简说动了，范仲淹只好让步：“建北京只是为了虚张声势，不足为恃。如果来不及城洛阳，那就请速修京城，防患于未然。”吕夷简马上反驳：“如果契丹大军杀过河北，只怕天下都守不住了，固守京师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应当在河北设防，用北京守汴京。”

最终吕夷简占了上风。宋仁宗建大名府为北京，把守首都北方大门，和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一起，构成了北宋守望相互的四京体系。

设五京，分五道

辽国也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然而，大辽皇帝延续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分四时捺钵——按四季迁徙营地、巡游打猎，基本不居住在京城里。五个京城做什么用？

答曰：分区域管理。以五京为五个中心点，大辽皇帝在领土上划分出了“五京道”，五京就是五道的治所：上京道临潢府是契丹民族的核心腹地；南京道管理石敬瑭割让的十六州东部地区；西京道管理十六州西部地区；东京道管理原渤海国地区；中京

南京帝王城

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倚长江，交通便捷，更被认为是“王气”之城，因而多次成为京城。图为民国时期的南京鸟瞰地图，1927－1949年期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一改其他都城的方正结构，完全依山川形势而建，是利用地理资源规划都城的典范。在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建都时的城墙、宫殿和国民政府的办公机构。

道则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新设的，是原奚人活动的区域。以五京划分出的五大片区，既有地理分隔，也注意到了民族习惯的差异。以此管理国家，事半功倍。

五个京里，哪个是首都哪个是陪都？大辽皇帝可不在乎这个，谁让他们的“天子所居”是捺钵的帐篷而不是京城的宫殿呢。五京中，上京和中京分别是辽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经济中心，不跟随捺钵队伍出行的中央官员，会留在京内办公。在这个意义上说，上京和中京是辽朝先后的首都，也可以成立。

同样出身北方游牧民族的金国在灭辽之后，继承了辽国以京城为治所，分区域管理的理念，也设五京，首都定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但海陵王完颜亮弑君篡位后，一心要找一个新京城。他心目中首都的最佳选址，是辽国的南京——析津府。

析津府就是被后晋石敬瑭拱手送给辽国的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幽州升为南京幽都府，辽圣宗时，又改名析津府。析津府更接近一统北方后金王朝的统治区中心，因而受到完颜亮的青睐。天德三年（1151年），定为燕京的析津府在完颜亮的关注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建设。

负责营建燕京的官员，向完颜亮献上宫室图，上面的区域都是经过阴阳占卜划分出来的。完颜亮不以为然：“国家的吉凶，在德不在地。夏桀、商纣这些暴君，定都何处都会亡国；如果是尧舜，住哪儿都是圣君。你们占卜来占卜去有什么用！”

正式迁都后，完颜亮在贞元元年（1153年）把析津府改成“永安府”，第二年又换成了“大兴府”。可惜他的统治并没有如首都的名字一样，长治久安，兴隆昌盛。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死在了南征路上，皇帝

的称号也被新登基的金世宗废掉。而他所营建的燕京则保留了下来，称“中京”，以金王朝首都的地位，和其他几个京一起，成为王朝管理领土的重要据点。

南京北京，减出新气象

长安-洛阳这条二京平衡线，在唐亡以后，早已无法维系；多京体系虽然既可防护首都也可分区治国，但京城数目太多，又不利于权力的集中。对元、明、清这些幅员广阔的大一统王朝来说，首都和陪都的数目，逐渐开始做减法。

忽必烈以自己即帝位的开平府为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建立元王朝后，又定金中京为首都，即元大都，上都改为陪都。大德十一年（1370年），建中都，位于今河北张北。元王朝的大本营是北方草原，所有京城都定在北方，和其统治的“重北轻南”倾向，相得益彰。但倾覆了元王朝的力量，也恰恰从远离京城的南方爆发出来。

1356年，朱元璋率领濠州红巾军占据了集庆路的路治（今江苏南京）做根据地，将之改名“应天府”。当时的朱元璋，是归属于韩林儿龙凤政权的一路起义军。龙凤政权国号“大宋”，打出了反元复宋的旗帜。朱元璋也是在此名义下，将元朝的路治改为宋代府名的。

有研究者表示，《明实录》中关于应天府改名的记载系年，很有可能是明朝建国后，为了抹杀当年龙凤政权痕迹而造的假。真正改名“应天”二字的时间，应当推迟到韩林儿死后。无论真相如何，“应天府”这个名字，和它所代表的皇权天命，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统一天下野心的表态。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当年八月，颁布诏书，“以应天为南京”。但他其实并不想一直留在南京。刚一收复河南，他就北上汴梁视察。然而当年困扰过北宋君臣的问题仍旧存在：汴梁交通便利，山川地形却不足以自恃。新王朝定都，稳定最重要。朱元璋犹豫之后，还是留在了南京应天府。他恢复汴梁为开封府，作为平定西北地区的根据地，“以开封为北京”。

第二年，山西、陕西也相继平定，朱元璋的备选首都范围，变大了。是占据关中险固定都长安？还是以天下中心洛阳为都城？或者继续营建开封？又或者节省民力，沿用元大都？建议纷至沓来。可朱元璋却突然对南京有了信心：“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足以建国。”

朱元璋放弃移都，主要还是因为天下初定，需要休养生息。南京城经过一段时间的营建，已经可以担负起首都的功能了。其他几个选项，则需要另起炉灶，劳民伤财，不利于稳定民心。而且南京距离朱元璋发迹的安徽凤阳比较近。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以凤阳为“中都”，除了发挥凤阳的象征意义外，未尝没有为自己保留退路的目的。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朱元璋罢北京开封府，改南京为京

京 京 京 京 京

燕 先秦时期
燕都蓟

秦 前222年
广阳郡

魏 三国时期
燕郡

隋 583年
幽州

辽 1012年
南京析津府

北宋 1122年
燕山府

金 1154年
中都大兴府

元 1271年
元大都

明 1368年
北平府

明 1441年
京师顺天府



师，明初的定都问题宣告解决。

朱元璋的信心，并没有延长南京作为首都的命运。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来坐镇北平府（即元大都，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南下“清君侧”。这场靖难之役既是叔侄之争，也是南北之争。一直扎根于北方的朱棣赢得了胜利，登基为明成祖。

对朱棣来说，南京应天府和他没有任何感情，甚至在不断提醒他，他的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刚一改元，朱棣就宣布改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并精心营建北京城。

北京城营建的十余年间，朱棣身虽在南京，心却一直在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名义北上，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住进了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北京皇城，再也没有回过南京。

做过辽、金、元三代都城，又经过朱棣的经营后，北京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发达的交通网给了帝王坐镇北京、掌控全国的可能。加之这里本身就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适合成为首都。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改称北京为“京师”，应天府与顺天府合称两京。

从汉唐的东西二京到明的南北两京，帝国的中心线在数百年间翻转了90度。这是全国经济重心不断东移南下的结果。和中晚唐、北宋一样，北京作为明王朝的首都，要面临北方蒙古的压力，山川形势有所不足。但

责任编辑／周玥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北京的军事地位，依靠修筑长城、加强武备等方式即可弥补。多京的“面”减回到二京的“线”。

后来，清王朝定北京为首都，废除南京，改为江宁府，只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盛京沈阳做陪都。但由于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作保障，首都北京对全国的控制力有增无减。京城体系继续做减法，从“线”回归到最基本的“点”。

如今的北京城中，明清的皇宫——故宫，仍旧矗立着。如同“京”字最古老的写法，修建起城墙宫殿，一派高耸壮丽。这座用“京”字命名、做了九百多年首都的城，仍将履行着命中注定的使命，继续守护着过去与未来。

北京印象
京，是天子所居之地。皇城、宫殿、宗庙等一系列皇家建筑都是古代都城的特征。上图为北京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太庙建筑雕梁画栋，金龙彩画只有皇家才能使用（供图／叁木映画）。左页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是“京”字的变形（供图／视觉中国）。



县

最稳定的基层

撰文/陶襄

一场“天下第一县”的争论，许多延续两千多年的地名，穿越时光隧道，将古县风貌带到了现代人面前。从封建时代的领土，到帝国直辖的最基层政区，“县”一路走来，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往事都还在

县是历史最悠久、使用时间最长的行政区划。图为山西怀仁，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设县，距今已有将近千年。县南亲和乡晏头堡曾是明代的军事堡垒，如今只剩断壁残垣，诉说着古县的往事。

摄影 / 王牧

河南息县是淮河上游的一个小县，不算知名。不过，在驱车前往息县的道路上，却可以看到一面醒目的路牌:“天下第一县”。这个称谓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若在搜索引擎中检索“第一县”的词条，自称“天下第一县”“中华第一县”的地方远不止一个，湖北权县、山西绛县、甘肃甘谷等地都曾参与过“第一县”的角逐。究竟谁是第一县呢?

谁是天下第一县?

鲁庄公十八年（前676年），南方的楚国正值楚文王在位。这一年冬天，活跃于西南地区的巴人，因为和楚国联军讨伐申国时发生矛盾，倒戈相向，决定伐楚。巴人攻取的第一站，是楚国的门户——“那处”。被楚文王派去那处做地方官“尹”的阎敖，见巴人来势汹汹，竟然弃城游水逃跑了。巴人就这样占领了那处，直逼郢都。

《左传》记载了巴人伐楚的前因后果，也提到了“那处”一地的由来。早年间，楚文王的父亲武王攻灭权国，“使斗缗尹之”。权国是商王武丁后裔在汉水西岸建立的一个子姓方国，因权水（今竹陂河）得名。斗姓是楚国公族的一支，斗缗应当是公室贵族。做了权的地方官，斗缗并不满足。不知是否受到权国遗民的煽动，没过多久，他就起兵作乱。武王派大军镇压了叛军，并把权地的居民迁徙到了那处，阎敖也是此时当上那处尹的。

《左传》中，并没有明确表示武王将权和那处设为县。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县》一文中指出，楚王灭权之后设“尹”一职，和此后楚的“县尹”等同，因此是当时已建立权县的证明。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也认同这一看法。那

息县新春秋

息县是河南省信阳市的辖县，位于淮河上游，在楚文王执政时设立，县名历经两千多年未改，被称为“天下第一县”。下图为位于息县城南的濮公山，曾有苏轼等名人在山中游历并撰写题记，是息县名山。现已建成一座供当地人民休闲娱乐的矿山生态公园。

供图/视觉中国



古息寻踪

息县的设置，是春秋时楚国兼并周边小诸侯国——息国，“灭国为县”的结果。下图为河南博物院藏息鼎，腹内铸有“息”字的铭文，是息国早期文物（供图／微图）。郢爰为楚国国都郢发行的黄金铸币（摄影／动脉影），息县出土了“郢爰”印模，说明当地被楚国兼并设县后，使用楚国货币。





处同样有“尹”，于是权县和那处，都应当是楚武王设的县。湖北权县争做“天下第一县”，正是以《左传》的记载为主要依据的。

“县”在我国已存在超过两千年之久，是现存最为古老的地方行政层级。但县到底是在何时何地出现的，分歧不断。早在西周时期的史料中，就已经有“县”字了。但当时的县与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同。东汉的《说文》解释曰：“天子畿内，县也。”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之地”以内、国都以外的区域，就是县。那么对于诸侯、大夫来说，他们的封地以内、中心以外的区域，同样是县。而我们所熟悉的“县”这一级行政区划，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出现，是新时代赋予“县”的新内涵。

新时代的特征，是周王朝分封制和礼义秩序的崩坏。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常常侵凌甚至吞灭弱小诸侯，将其国土变为自己的附属。如何管理新领土呢？再行分封显然达不到扩张统治范围的目的，县的异化则解决了这个难题。“灭国为县”，把新领土冠以“县”，就从名义上使之成为了国君直接统治的封地。“尹”只是县的管理者，而非拥有者，县

链接

藏在成语里的县名

邯郸学步

邯郸县（今河北邯郸市）。春秋时晋国置县，战国时成为赵国都城。

勿忘在莒

莒县（今山东莒县）。成语中“莒”指古莒国，战国时齐国在古莒国地设县，延续至今。

暗渡陈仓

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秦代设县，西汉时属右扶风。

山阴道上

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地区）。秦代设县。

持节云中

云中县（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战国时赵国设云中县，属云中郡，秦汉延续。

平原督邮

平原县（今山东德州平原县）。秦设平原县，西汉置平原郡，郡治平原县。

蓝田生玉

蓝田县（今陕西西安蓝田县）。战国时秦国设县。

陕西蓝田县 供图/视觉中国

域内的人口、赋税、司法治安，皆由国家直接控制。所以，那处的尹阎敖弃县逃跑后，楚王毫不留情地将他处死，以儆效尤。

尽管被诸多历史地理学家视为最早的县，权县在争夺“天下第一县”这一称号时，还是面临着两大不利条件：第一，它在今天的行政版图上已不复存在，只能根据史料、遗迹判定，古权县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沙洋县；第二，作为依据的《左传》中，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置县一说，权县的存在由始至终只是学者的推论。实地和文献都缺少一点说服力，湖北权县在“天下第一县”的竞争中未能胜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权县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哪个？河南息县。

息夫人“造就”了息县

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灭国设县”，县名多为被灭亡的诸侯国名。息县也不例外。《左传》记载，楚太师子谷追溯楚国历史时提到：“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申国和息国被楚国所灭，楚文王将两地改建为县，并任用了申国俘虏彭仲爽担任县尹。

申国是周宣王分封的姜姓诸侯国，大概位于今河南南阳市。和权县一样，现今版图上，申县已不复存在。息县则不同。这个西周时的姬姓诸侯国，从楚文王置县至今，将近2700年时间，其地其名都还保存着，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息县县名可以长久流传，大概要

“息”是西周时的姬姓诸侯国
从楚文王置县，历经将近2700年时间
其地其名至今仍在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归功于息夫人传说的脍炙人口。“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这是诗人王维笔下的末代息侯夫人息妫（guī），史称息夫人，也称文夫人或桃花夫人。

息夫人生于陈国，是陈庄公之女，在鲁庄公十年（前684年）时，嫁到了息国。她的丈夫息侯有勇无谋，迎娶息夫人之前，就曾不自量力，强行进攻强大的郑国，惨败而归。当息侯娶了拥有绝世美貌的妻子后，灭国之灾也就悄然降临了。

事情的起因是息夫人回陈国省亲，途中经过蔡国，不想意外遭到蔡国国君调戏。愤怒的息夫人向夫君告状，息侯为了给妻子出气，不惜引狼入室，传信楚文王：“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息侯的如意算盘是，楚国假伐息国、真攻蔡国，蔡国兵败，自己就可以借机报仇雪恨了。他却没考虑过楚文王的野心，岂止是一个蔡国就能够满足的！

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四年之后，又在蔡国国君的煽动下，举兵灭了息国。息夫人也被楚文王纳入后宫。入楚后的息夫人总是闷闷不乐，楚文王问她原委，息夫人答道：“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文王于是兴兵灭蔡国，为息国复仇。

息夫人的故事，在《史记》《吕氏春秋》乃至近年出土文献《清华简》中都有提及，西汉经学家刘向在《列女传》中，更为息夫人改写了结局。息夫人入楚后为楚文王生了三个孩子，但在刘向笔下，息夫人满足了世人对贞烈爱情的想象，为息侯殉情而死。从此，息夫人以烈女的形象，长流世人心中。息县的建立是因为息国的覆灭，而息国之灭与息夫人密切相关。如今，息夫人成了息县的标志。息县还建起了息夫人纪念馆，向当地百姓讲述古县当年的故事。

据学者考证，楚国灭息设县，不晚于楚文王十一年（前680年）。虽然比楚武王灭权国要晚，但比另一个“天下第一县”竞争对手山西绛县（前541年由晋平公设置）要早不少时间。更重要的是，息县作为县治，有地可循；“息”字作为地名，于史可证。这是其他古县所不及的。

县有多大？

号称“天下第一县”的息县，在西北地区还有一个名号相近的小伙伴：“华夏第一县”——甘肃甘谷县。甘谷在春秋时属于秦国，《史记》有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其中冀戎的地盘就是甘谷县。秦武公十年是公元前688年，比息县设县的时间要稍早，似乎更符合“天下第一”。但史地学家童书业先

中国最大的县

20.23万平方公里

若羌县

长岛县

56平方公里

中国最小的县



最大与最小

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规定县的基本面积是百里。但由于地理环境和人口密度等原因，县的面积大小不可能严格保持一致。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一县的范围可能大大超过“百里”。如今，国内最大的县是新疆的若羌县，约为江浙沪面积之和；最小的县则是山东长岛县。

供图/视觉中国

生、周振鹤先生等人都认为，秦武公“初县之”并非设郡县一级的县，而是将邽、冀戎的地盘，纳为封地中心以外的区域，即所谓“县鄙”。从这个角度来看，甘谷这个“第一县”就不够名副其实了。

秦国在春秋时的县虽然不够正宗，但战国时郡县之县的真正形成规模，秦国功不可没。秦献公在位时，“令民为什伍”。即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组成基层居民组织。此时，西周封建的国野制度已经崩溃。秦孝公商鞅变法时期，更是“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将基层的乡里聚落集合成为县，每县设有一个县令，整个秦国境内设41个县。与此同时，其他各国的县制也在蓬勃发展当中，县已经逐步褪去了贵族私邑色彩，成为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基层政权。

既然县是由“小乡”聚成的，那一个县应当有多大？战国时各国国土面积不均，县数不明，而且还时常有领土的兼并，县的大小很难统一。但当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后，县的大小就有了规定：全国设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县的基本面积是百里，而随着人口的稠



密度有所调整，人口越多，面积越小。至此，百里之县，基本定型。

百里之县只是约数，地广人稀如今天的内蒙古、新疆、青海一带，一个县的面积甚至比内地一个省还要大。那“百里”这个划分标准从何而来呢？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做了如下推断：

“假定县城位于方百里的某县的几何中心，那么到四边的距离都是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17.5公里。这样的距离，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这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农民进城交纳租赋都是比较合宜的。当然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因为一个县的地域，不会是四方的，县城也不一定恰好位于几何中心。但是这样的推测大约并不离谱，因为一切基本原则都是按标准情况制定的。秦汉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已经形成关中与山东（崤山以东）两个经济重心。在地理景观方面，黄河中下游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在其上划出方百里作为县的幅员标准也是合乎情理的。”

“百里”的大小和国家指派官员对县加以管理的制度相得益彰，因而一直被沿用。如果经济发达、人口增加，就按照人口稠密原则对旧县进行拆分；如果战乱频发，人口凋敝，也可能会将数县合并，便于管理。但无论怎么调整，县的大小和人口数的比例，都会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这也是县这级行政区能在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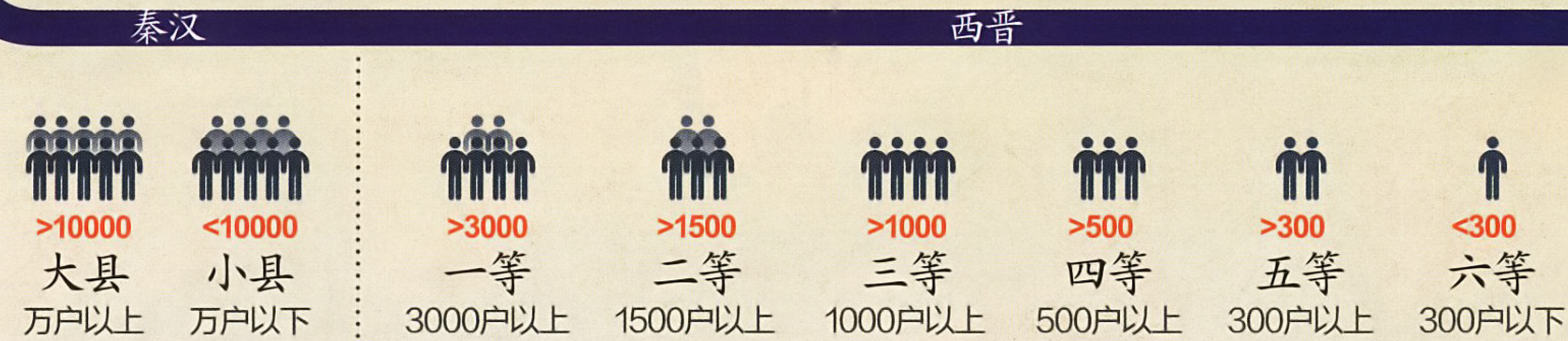
古县有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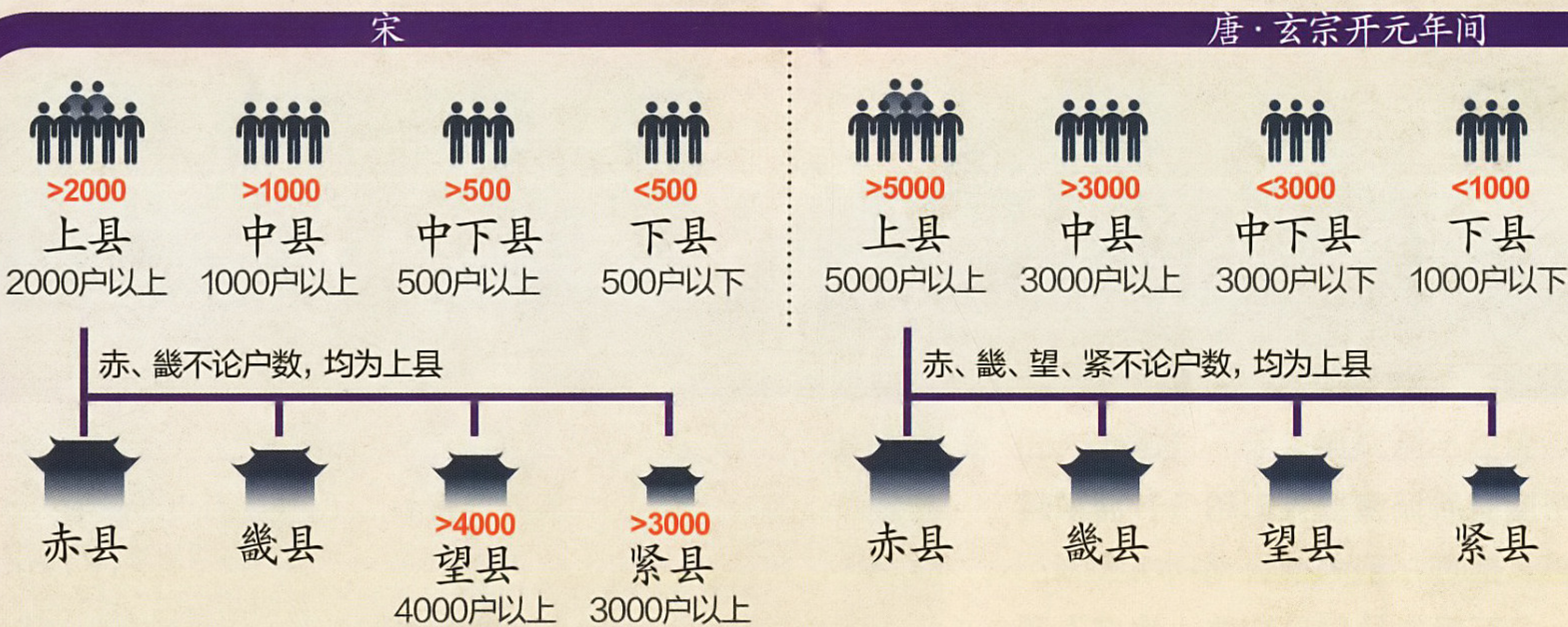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位于晋西北边陲，县北有古关“杀虎口”，是北方要塞。秦时已置县，县名善无，属雁门郡。明初设卫，称右玉林卫，雍正年间升为右玉县，延续至今。上图为右玉县的右卫城，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古堡城墙仍保留了当年的面貌，讲述着边陲古县曾经的战争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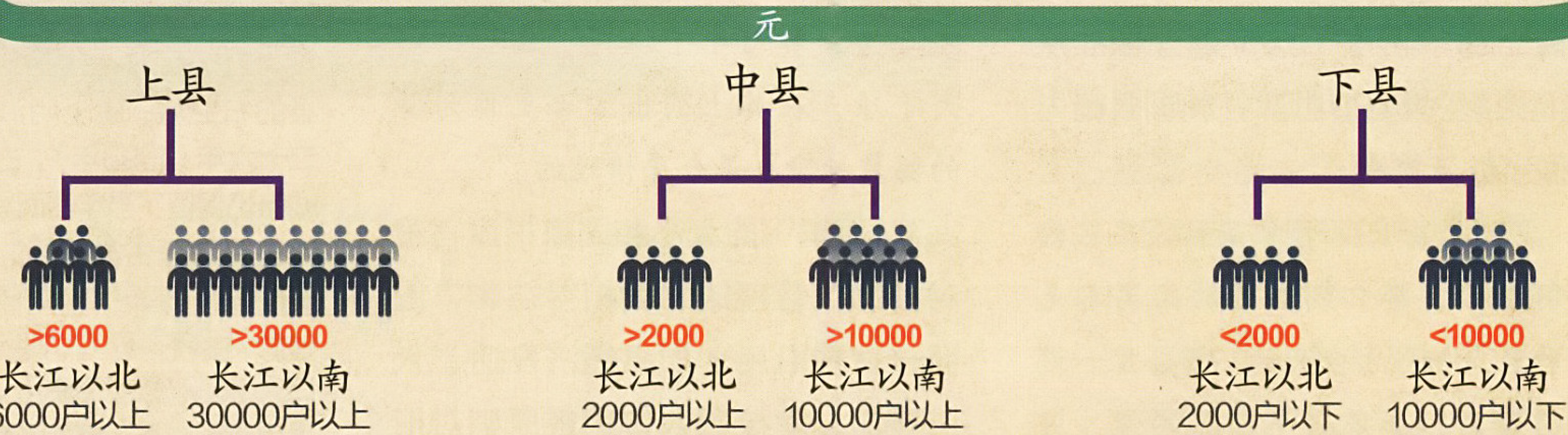
摄影/王牧

县分多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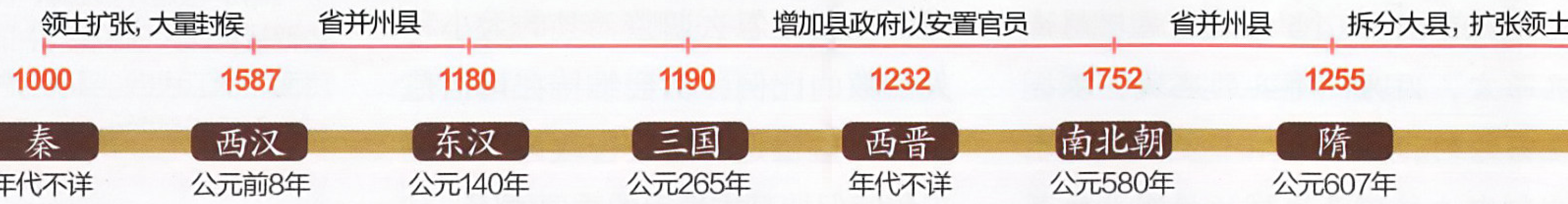
中国幅员辽阔，县与县之间，存在着面积大小、人口多寡、赋税数量、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每个朝代通过不同的标准，将县划分出不同级别，根据级别来选派官员、区分管理。下图即为各个朝代县的分等标准和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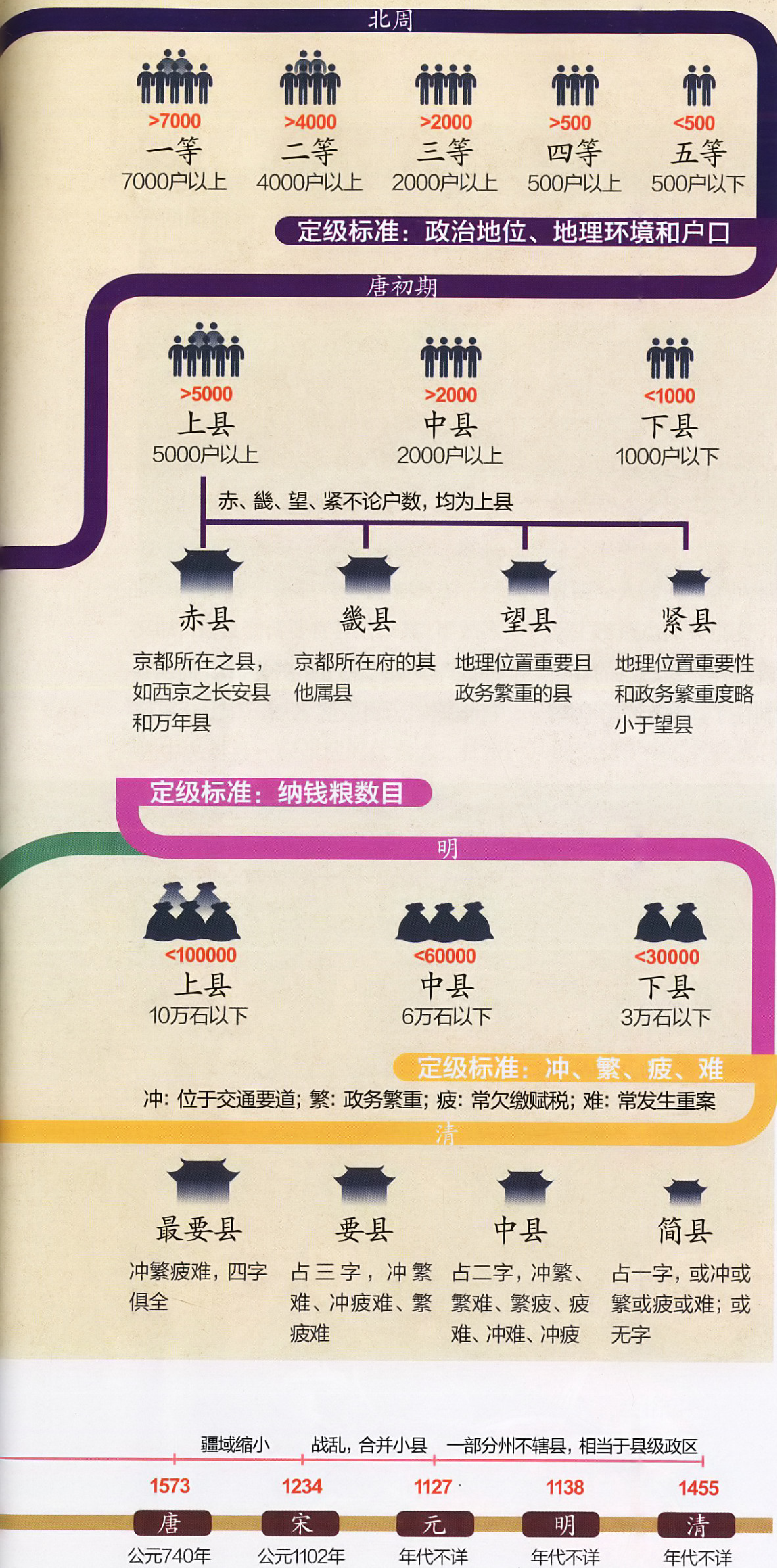






中国历朝有多少个县





参考资料：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

县治，天下无不治

依息县县志记载：息县在秦代属颍川郡；汉朝因县城的位置有移动，置新息县，属汝南郡；东汉为新息侯国；魏晋南北朝仍为息县，属汝南郡；隋唐之际一度升为息州，后复为息县，一直持续至今。

息县的归属背后，是历朝历代行政区划的变革之路。

汉朝，郡国并行，县是郡国下的行政单位。此后，不论是东汉的州、郡、县三级制，还是唐的道、州、县三级制，到元代行省下的路、府、州、县，一直到清代的省、府、县三级，县的上级行政单位名称与执掌在不断变化，唯有县一级在行政设计中的地位岿然不动。

古人云“天下之治始乎县”。县能够持续两千年，是因为其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功能不可替代。

正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县是沟通国家行政系统与地方乡里组织的纽带。县以上，是正统的官僚机构，有严格的典章制度与君臣伦理；县以下，是血缘宗族和一个个百姓，有约定俗成的家法乡规。

划分出了县，还要靠人去管理。一任任县官，如同国家行政机器上的螺丝钉，维系着每一个局部细节的稳定运行。好的县官被称为父母官，而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会成为当地人的共同记忆，融入地方历史的同时，也将一县之名传播到更广阔的空间、时间当中。

东汉名士、后来死于党锢之祸的太学生领袖贾彪，早年就曾经担任新息令一职。他在任之初，新息百姓因为家里贫困，常常遗弃甚至杀死新生儿。贾彪决心要制止这种风气，于是规定生子不养与杀人同罪。一次，城中忽然同时发生了两起案件，一起是盗劫害人，一起是妇人杀子。属吏们都认为盗劫案件更为恶劣，应该率先处理。贾彪却说："盗贼害人，常常发生。母子相残，违背天性人伦。"他选择首先缉拿查问杀子的妇人。新息百姓受到感染，连犯案的盗贼都主动来投案自首。就这样，新息县的弃子之风被有效遏制住了。数年间，因贾彪的政令而获救的孩子有千数之多。

贾彪以过人的见识匡正了一县风俗，成为息县百姓世代敬仰的先贤。新息这个县名，也因为贾彪的名气而为更多人所知悉。类似这样因曾经有过著名的县官而深入人心的县名还有很多，比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今江西九江彭泽县），包拯初出茅庐的定远县（今安徽滁州定远县），郑板桥写下"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潍县（今山东潍坊）等等。

在很多县里，都流传着相似的地名故事：某一任县官要新修县衙，却又遇到许多阻碍，只能求神问卜。而当县官根据启示更改县名后，马上一帆风

消失的秭归城

湖北宜昌的秭归县，汉代即设县，因屈原而得名。右页图为秭归古城，在20世纪末因修筑三峡大坝而淹没于水下。新县城位于大坝南岸，是三峡库区首县。虽然县址迁移，但秭归县名因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而被继续沿用。下图是迁县之前，人们在古县城种子公司前买卖交易的生活场景。

摄影 / 郑云峰





顺，不但县衙修成，自己也升官发财。这样的县名由来，并不可信。县官作为中央对县一级政区的代言人，并没有随意更改县名的权力。县名的更改调整，大都是自上而下的政令，或因增撤、或因避讳。如果县官想要主动更改县名，必须层层上报，由中央政府决定改名与否。至于为何会有那么多县官改县名的故事，大概与县官“基层政令执行者”的地位有关吧，毕竟最终更改的县名，还得县官来公布。

县名久流传

前296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免职，放逐出郢都。他的姐姐听说此事，从夫家赶回，为他送行。姐弟惜别，离情依依。这一别，整整十六年。屈原顺江而下，望龙门，离汉口，最后来到陵阳，成就了不朽诗篇。而这一别，也诞生了一个千古流传的县名：秭归。

汉时，以今湖北荆州为中心设南郡，下辖秭归县，取“姊归”之意。这个县名寄托了屈原姐弟的深情，更享受到了屈原故里的无限荣光。至今，湖北宜昌还有秭归这个县，屈原的诗篇，也在代代流传。

县名是一个县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有时，它如“秭归”一般，书写着一个县对历史的记忆。有时，它也会承载起人们对故土的无限依恋。

东晋南朝时在行政区划版图里便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侨置郡县。这一时期，北方战乱频繁，政府为了安置因战乱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流民，便在南方“移植”了许多原北方的州郡县地名。郡县地名，竟然能起到帮助国家聚拢人心的作用，可见它们早已超越了行政区划的价值，成为了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符号。

也正因为有着许多千年古县名的存在，当我们翻开今天的行政区划图时，会格外深刻地感到自己与千年前的古人血脉相连。流转的岁月湮灭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却又慷慨地留下一些踪迹，比如那些县名，任由后人去探求与追思。

责任编辑／周玥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西藏之宗

“县衙”高高在上

撰文／多杰

西藏的“县”曾被称为“宗”，这个奇特的名字，来自俯瞰一方的城堡。百姓仰视它，民众归属于它，高原近千年的统治历史，也藏在这小小的地名背后。

两座“布达拉”

走进拉萨，看见红山，就看见山巅上的布达拉宫，城中没有哪座建筑能高过它。它还是一座双色建筑，中央的红宫红得浓烈，两翼的白宫白得圣洁。它的名气太大，知道西藏的人，没有不知道布达拉宫的。

西藏还有另一座古城日喀则，城中同样有座拔地而起的小山，还有座酷似布达拉宫的建筑，雄踞山巅，俯瞰着古城里的芸芸众生，这就是桑珠孜宗堡。到过日喀则的人，都对它啧啧赞叹，认为它对布达拉宫的模仿惟妙惟肖。

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日喀则桑珠孜宗堡的建造年代竟要早得多，它于1363年落成，而布达拉宫1645年才重建成今天的样子。早上三百多年，山寨之说当然子虚乌有。

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起新的甘丹颇章政权，在藏地这场改换政权的风云中，阿旺·洛桑嘉措攻陷了日喀则旧政府，走进桑珠孜宗堡，并在中央红堡内坐床问政近三个月。很可能就是在那时，他被这座壮丽的城堡打动了，回到拉萨后，参考桑珠孜宗堡布局，将改建的布达拉宫设计为“中间红宫、两边白宫”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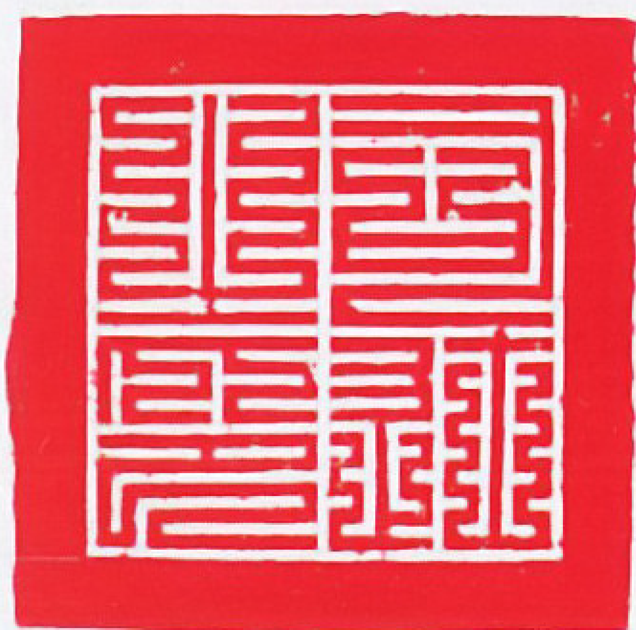
用红宫、白宫予以区分，这不仅是美观的需要。布达拉宫的白宫是办理政务和生活起居之地，是过去全藏政治活动的最高统治中心。而中央红宫则安放着前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并用于供奉佛像经书和处理宗教事务。如果说白宫的核心是“政”，红宫的核心就是“教”，双色联体，体现政教合一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同样出自桑珠孜宗堡的历史渊源，并且与它名字中那个奇特的“宗”字有关。

桑珠孜宗堡，“桑珠”意为如意，“孜”意为巅峰，“宗”即旧日西藏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宗堡”则指旧宗政府的堡垒建筑，也就是雪域高原上的“县衙门”。

桑珠孜宗堡的建造者叫绛曲坚赞，他曾被元顺帝和明朝皇帝册封为管理西藏政权事务的“大司徒”。当城堡落成时，绛曲坚赞满意地感叹：“完成了理想中的一切夙愿。”这当然不仅指建筑而言，他的大业与努力也随着这座山巅宗堡而完满。



大明皇帝封赐“西藏大司徒之印。”供图／FOTOE



司徒之印（汉文）



一宗一堡一王朝

绛曲坚赞的故事要追溯到南宋末年。那时，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土崩瓦解，高原上并没有统一的政权。一位噶举派（藏传佛教派别之一）弟子帕木竹巴·多吉杰波学法有成后，回到家乡桑日县修建了一座小寺，即是后来著名的丹萨替寺。此后“帕竹”一度成为该地的地名、教派支系名、地方政权名，乃至王朝的名字。

在帕木竹巴去世后半个多世纪，藏传佛教的另一派别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被委任为元朝国师。他取得忽必烈的支持后，在西藏封受各地僧俗首领，将乌思藏（元代西藏地区的称谓）编制为十三“万户”，任命万户长进行管理，萨迦政权时期就此开始。

“户”其实是蒙元政权的一种管理制度，一个“蒙古小户”就是一家人，一个“蒙古大户”由25个蒙古小户组成，也包括住房、牲畜、耕地这些财产。而元朝时期使用于西藏地区的“万户”也是同理。每个万户区域，设万户府和若干千户所来管理。

丹萨替寺所在的地域属帕竹万户。萨迦时代的“万户长”与各地区的宗教领袖既有合作又相互制约。而帕竹万户有所不同，丹萨替寺的座主一职，由当地最大的地方势力——朗氏家族兄弟叔侄相承袭，而万户长的职位往往由座主推荐，甚至就是这些座主的随侍。到了第八任万户长扎巴仁钦，他甚至兼任了丹萨替寺的座主，一身两任，政绩十分出色，开了萨迦政权地方管理“政教合一”的先河。更为杰出的是第十一任万户长绛曲坚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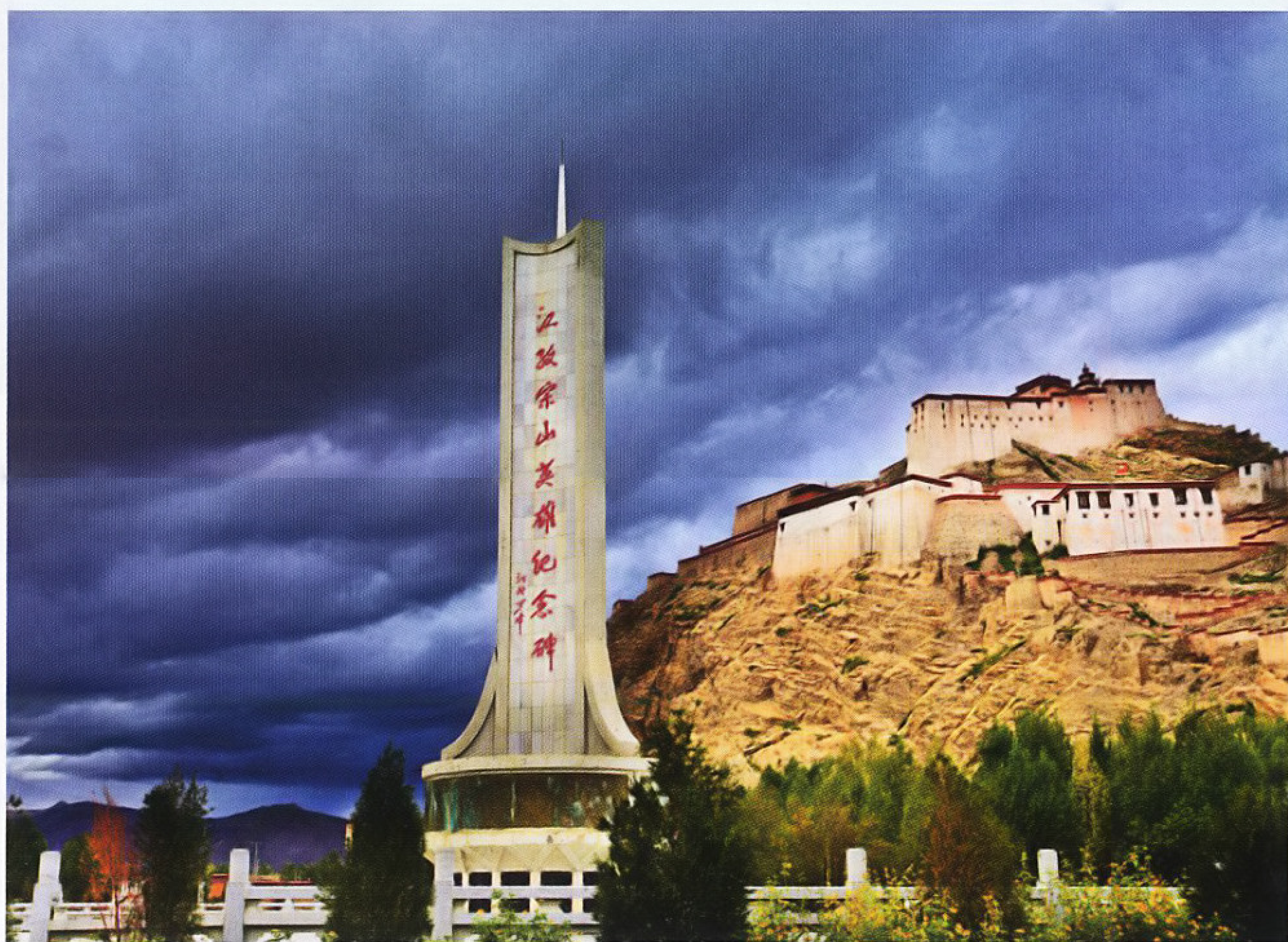
绛曲坚赞也出身于神圣的朗氏家族，曾入当时藏区的“最高学府”萨迦

为“宗”而生
在西藏日喀则市的老城中，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山巅城堡——桑珠孜宗堡，它仿佛一位威严的长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它始建于1360年，西藏的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后，设立“宗”这一政教合一的行政单位，宗堡就是当时的“县长”宗本的办公处所，桑珠孜宗堡是这些宗堡中建筑等级最高的一座。图中的宗堡于2004年重建，堡墙等外观为原址原貌恢复而成。
供图/QUANJING

西藏著名古宗堡位置示意图

西藏历史的古宗堡曾有100多座，如今只有江孜宗堡和桑珠孜宗堡硕果仅存。地图上还列出了其他几座历史上最著名的宗堡，它们曾经据守的地方大多也是藏区的战略要地，如今仍存有遗址。





宗山下的丰碑
藏区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宗堡，它们不但是管辖属民的衙门，还被建造成一座座具有军事防御能力的堡垒。图中远处陡峭的山峦上即是著名的江孜宗堡，上世纪初，江孜军民以宗堡为阵地，与英国侵略者展开惨烈的战斗。如今“江孜宗山抗英纪念碑”矗立在宗山脚下，铭记江孜宗的英勇历史。
供图 / QUANJING

寺学习，深受寺主的赏识，学经之余，还攻读了管理行政乃至军事的知识。1322年，他被元帝委任为帕木竹巴万户长后，兴利除弊，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修桥垦荒，推广谿卡（庄园）制，帕竹迅速崛起。

而此时的萨迦王朝却千疮百孔，十三万户各自为政，纷争不已。绛曲坚赞兼并了数个万户之后，起兵反抗萨迦王朝的统治，夺取了全部的萨迦土地、寺院和属民。此后，他派人向元顺帝请封，当时的元朝政府也已风雨飘摇，但元顺帝还是于1358年封其为“大司徒”，掌管卫藏。

大司徒绛曲坚赞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睿智的改革者。帕竹政权新立，他便迅速将原本十分松散、各自为政的十三万户进行整改，设立“宗”的行政单位，各宗的“宗本（相当于县长）”均由绛曲坚赞直接任命，每三年更换一次。为了改变萨迦时期法令无常的情况，他根据吐蕃王朝赞普时代的规定，重新制定税法及相关法律，史称“十五律”。一个以“宗”为骨架的新王朝诞生了。

1360年，绛曲坚赞面对西藏各“宗”的版图，开始描绘建造宗堡的蓝图，事实上，藏语中“宗”本就是城堡、堡垒之意。一座座雄踞在“宗山”上的堡垒，里面设有佛堂、经楼，也有宗政府办事机构、卫队和司法机关、牢狱、仓库等等。宗堡不仅要供宗本们管理政务和起居，还是令百姓仰视的神灵居所，以及对抗战乱的据点和烽火台。

在十三宗的宗堡如火如荼开始建设时，绛曲坚赞特别关注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堡。他甚至直接过问这座宗堡的尺度规模和形制等级。桑珠孜宗堡是十三宗堡中最后落成的，它的精美程度大大高于同期建造的宗堡。紧紧围绕着桑珠孜宗堡长大的日喀则，也一度被作为西藏的“首府”而存在。

是热土，也是乐土

坐落在日光山上的桑珠孜宗堡，山脚下的年楚河冲积平原尽收眼底，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浸透着浓烈的军事防御风格。西藏历史上前前后后建成过上百座的宗堡，大多显示出设计者的如此匠心。或许在绛曲坚赞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心目中，西藏始终是一片战乱频仍的“热土”。

就在距离日喀则不远的江孜县，还有一座宗山和宗堡，因为它们，江孜被称为“英雄城”。

西藏的“宗”本就诞生于烽烟之中，各宗的设立，与其在高原上的重要位置有关。江孜宗，历来被看作是通往拉萨的大门。江孜的宗山城堡仿佛一面旗帜一样，只要它屹立着，从日喀则通往拉萨的咽喉就被紧紧地扼守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军将殖民的战火从南方的锡金燃向西藏，他们虎视眈眈的目标是拉萨，而耿耿于怀的正是江孜宗。

以大刀对枪炮，无疑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抗争。但正如一个英军医生所说的，“西藏人的英勇举世无双”。藏军与英军在江孜宗发生了一场场血战，与此同时，英军几乎洗劫了江孜所有的寺院，英军大肆抢劫的财富“用400头骡子才能运走”，愤怒的西藏人民奋力反击。英国援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占领了宗山周围的据点，江孜宗山坚固的防御工事，成为藏军最后一道防线。英军动用了大量的穿甲炮弹，并封锁了给城堡供给的通道，最后用重型火炮，将宗山东面的一道山墙炸开，一名藏兵又不慎引燃了弹药库，宗堡才不幸沦陷。



“长在水中”的宗堡
在众多的西藏宗堡中，定结宗堡是最为古老的十三宗堡之一，而且也是这些宗堡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定结”意为“长在水中”，定结宗的宗域内曾是一片水泽，后来水面干涸，中间高地露出一块巨石，定结宗堡这才得以落成。如今在它的周围，仍旧呈现出一派如梦如幻的田园景象。
摄影 / 王彤

虽然高原战士和江孜宗的人民的抗争失利了，但这场血战也赢得了全世界正义的声音，无论如何，英军最终从西藏撤军了。

“宗”就是安全的堡垒，“宗”也是赖以生存的家园。

帕竹政权缔造了“宗谿制度”，它是西藏地方政治结构上的一项创新。西藏不仅有巍峨的宗堡建筑，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谿卡（庄园）”建筑。谿和卡是宗以下的级别，大约相当于乡镇和村。当年雄才大略的绛曲坚赞为实现各宗的繁荣，打破了曾经的土地制度，将田地分给农奴使用，因此出现了许多繁荣的谿卡庄园。

直到建国初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一直沿用这一行政体制。直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共有147个宗和相当于宗的大谿卡（庄园）存在。虽然此后这个行政称谓被“县”所代替，但不少藏民在生活中仍会使用定结宗、江孜宗、曲松宗之类的名字。“宗”这个称谓在藏民的心里无比亲切和温暖。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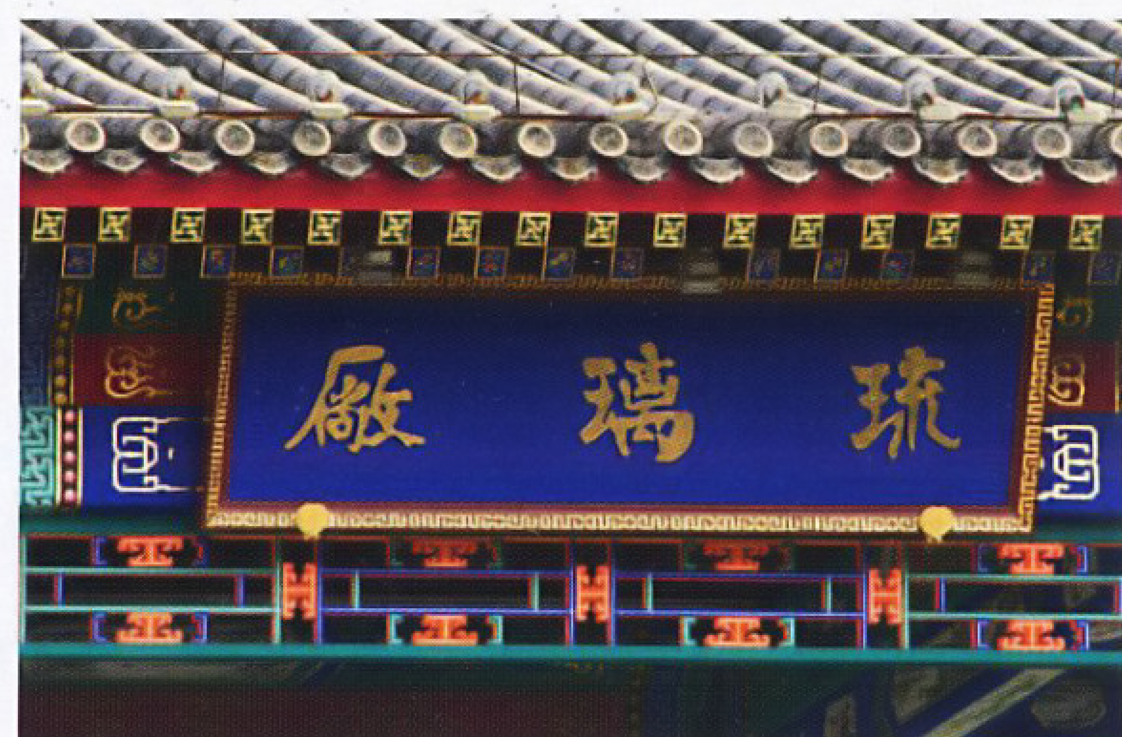
新与旧的交错

日暮下的鼓楼披上了一袭明亮光华，远处繁华的经济地带高楼林立，新与旧呈现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交错之貌。而地名就是一条从新兴通向古老的通道——纵是时过境迁，人物俱非，但地名往往依旧在。

供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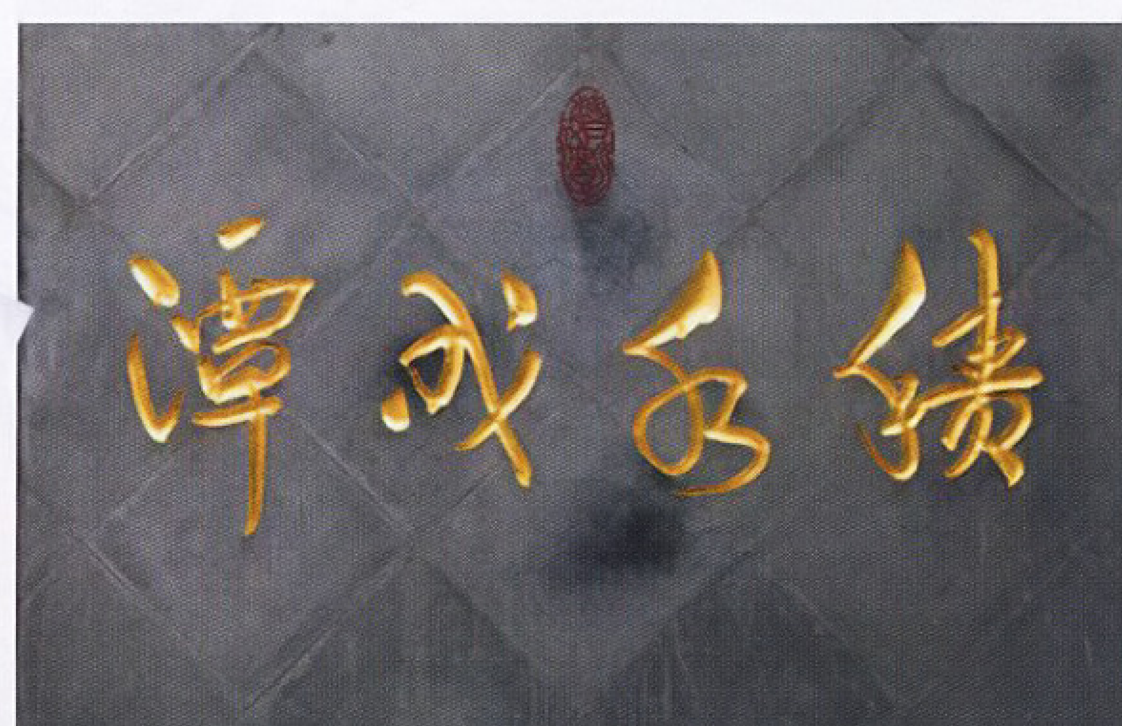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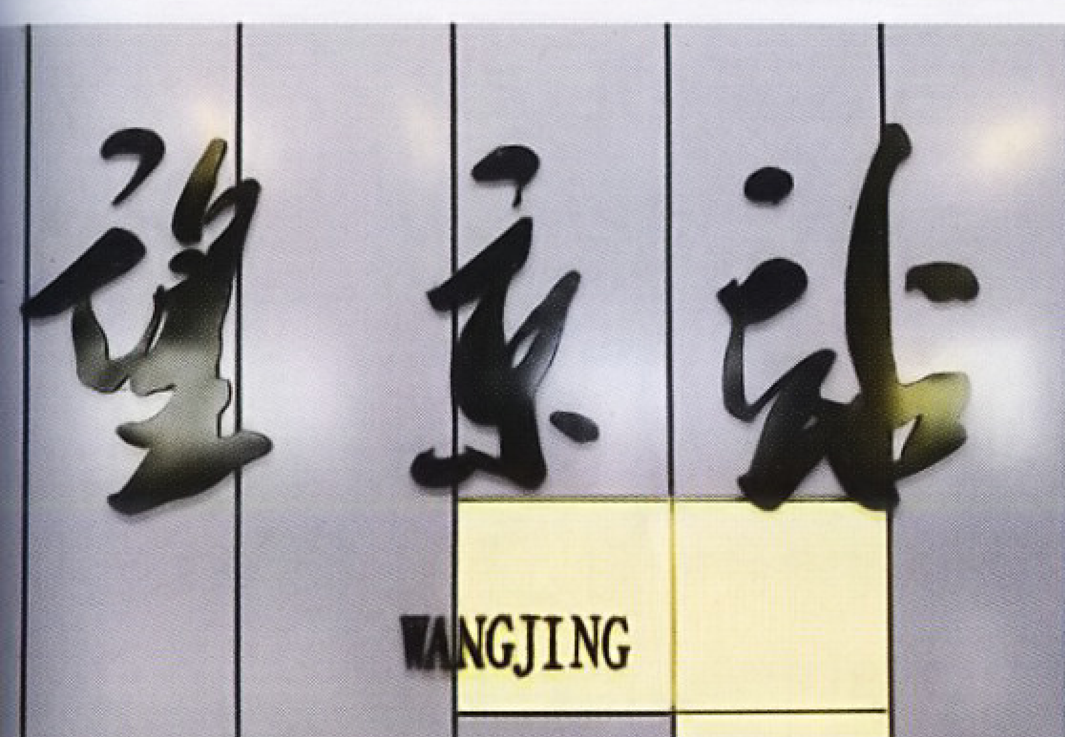
















北京城的“金木水火土”

撰文／杨睿　摄影／释静恩 等

屯、营、庄……当你重新审视这些通用地名时，不难发现，北京这座繁华兴盛的大都市，依旧未脱去历史给予的朴素底色。它们是怎么来的?







西沙屯 水屯 屯 永丰屯 三里屯 大屯

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很多“沾亲带故”的名字，诸如营啊，窑啊，庄啊。当你仔细梳理他们的家谱时，不难发现，那名字竟都有些五行的影子。或许它们命名之初未必是从五行考虑，但不妨碍让我们即刻出发，神游北京城，回到五行中。

营内金：战争后遗症

一提到“营”，耳边可能就会响起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试想无数营地蛰伏着蠢蠢欲动的杀意，待一声连营号角，顷刻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而在北京今天还在使用的地名中，就有很多词尾缀以“营”字，它们像一把把被时光钝化的青铜剑，用“营”字的寒光，讲述着寂灭的征伐的梦。

这老“营”家第一代移民应属高丽营。相传在唐高宗年间，唐朝军队在打败高句丽后，迁移其部分高丽族人到今天的北京市顺义区，建立了高丽营。和高丽小伙伴同为难兄难弟的，还有古越南人。在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在征讨安南（古越南）时，不忘给自己的紫禁城搜罗一支装修队。据传说，共带回安南工匠七千余人，于是便把国际劳工宿舍命名为安南营。安南营就是今天大栅栏地区的“大安澜营胡同”。而从这安南营中走出一个杰出的建筑师——阮安，参与了明正德年间北京城九门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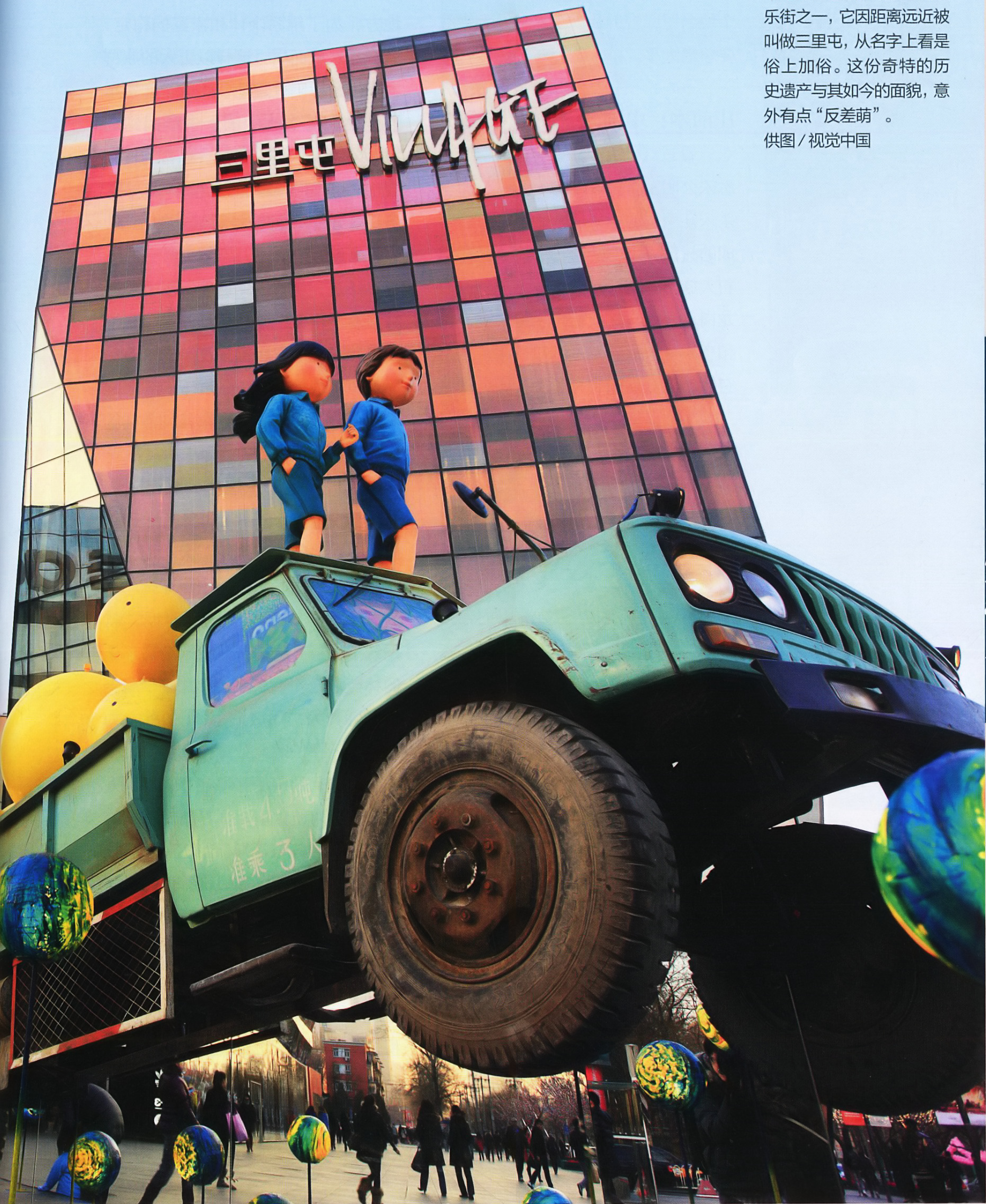
当时间的指针走到了1644年，明祚将尽，满清八旗子弟从龙入关，杀伐而来。而北京城，首当其冲地被改造成一家挂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大号“兵器铺”。多尔衮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下达“清城令”，将内城汉人和茶楼酒肆文化一并清理，汉族百姓被赶到外城，甚至郊外。而内城被大卸八块，分驻清军八旗，号称“京旗”。

接下来，各旗都设置了工匠营，分头打造前方战争机器所需要的弓、铁、鞍、盔、铜。五匠编制规模极大，人数最多的铁匠，多达1118名！这样，伴随着众多军工企业入驻，带有军方背景的房地产事业在内城中迅速崛起。如东直门内海运仓有北弓匠营胡同，阜成门内福绥境有东、西弓匠胡同，建国门内古观象台的附近有铁匠营胡同和盔甲厂胡同等。相对于内城中的冷兵器兵工厂，位于海淀区蓝靛厂正北的火器营，因加工生产子母炮，并操练火枪手，可以算作那个年代的“火箭军”了。

“屯”字也保留着军人血统。整个中国北方拥有大量以屯为名的村落，从东北炸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到殷墟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村。以屯为名，起初或屯兵或屯田屯粮，多带有或多或少的军事色彩。北京的屯不可胜数，从昌平区早期有蒙古血统的畲色（hǎ bā）屯南下，到四环外的大屯，再到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连成了线。

营、屯、皂（养马之处）、驿（传递军情）、站，今日的地名能够还原出一套完整的古代军事系统，这些地名多形成于明清时期，也恰恰反映了当时北部中国边患严重的时局特点。

“营”中有兵器，故属金，历史



这屯儿不简单

因为军事驻屯而得名的“某某屯”，是北方乡村经常出现的地名，具有浓浓的乡土气息。但北京就有这样一个屯儿，是帝都最繁华的娱乐街之一，它因距离远近被叫做三里屯，从名字上看是俗上加俗。这份奇特的历史遗产与其如今的面貌，意外有点“反差萌”。

供图／视觉中国

把北京城对战争的后遗症，放在无数个地名里，告诉我们今人身处太平更要珍惜太平。

庄前木：中国式“圈地”运动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熟悉宋公明三打祝家庄这一情节。那连杀宋江两局的祝家庄，虽是个自然形成的村落，但与一般村子比，又充满着大族豪强的荷尔蒙味道。同样，独龙岗上还有与其成犄角之势的扈家庄和李家庄，道理也是这般，除了有田有钱，还有武装到牙齿的护卫队——“墙内森森罗剑戟，门前密密排刀枪”，时刻给来犯之敌预备一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书面语的“家庄”，在今天最有名的，当属被调侃为“天下第一庄”的石家庄了。然而，“家庄”在北方多被读写成“各庄”。如北京的郭各庄，如果在华北平原这条“大街”上叫名字，估计能有一堆郭各庄答应。因为这个名字，仅北京周边的保定市就有3个，唐山市有12个，廊坊市更有23个之多。

以郭为大姓聚集的村庄本不稀奇。但都不约而同叫“各庄”，原因何在？经语言学家考据，从东晋到宋金再到近现代，“家”的读音，经历了ga-gia-jia的变迁。很多地方保留了对“家”的古读，加上口语上的轻读，家庄就完成了向各庄的转化。所以，铁打的“各庄”，流水的姓氏，北方地区的“各庄”也就渐渐叫开了。

再说说姓氏的问题。北京以姓为名的“庄”，大多数是在明代初期移民潮背景下产生的。新移民到了一个地方，为了维系个体和家庭的稳定，会选择聚族而居，这样以更大的族群为纽带，在陌生之地，生成了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熟人社会”，是农业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正如客家人的土楼一样，“X各庄”成了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土楼，装进了百家姓氏、万家烟火。

不过，北京的“各庄”虽多，但并没有出现像祝家庄那样“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的军事集团，原因很简单，天子脚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北京各种各样的庄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些庄的名字。在今天大兴区南苑一带，有这样一群庄——寿宝庄、万聚庄、太和庄、有余庄、富源庄、西毓顺庄等等。

原来，这里在元明清时期，就是统治者蓄养野兽，让贵族游猎享乐的林苑。元朝贵族在冬春之交擎鹰走马，呼其为“飞放泊”。明朝称之为“南海子”，说明此处湖泊众多，水草丰美。清代留下的名字在今天更深入人心——南苑，里面饲养麋鹿（俗称“四不像”）等奇珍异兽。然而，盛极必衰，到了晚清国家风雨飘摇时，这座贵族的桃花源也要和自己的主子同命运、共呼吸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攻打北京的途中路过南苑，烧杀抢掠，掠走了麋鹿和大批珍禽异兽，掠不走的，付之一炬。后因为庚子赔款，清廷再无力承受南苑巨额修缮维护费用，索性于两年后成立南苑督办垦务





贫富皆有庄

任你走在华北大地的哪个地方，都少不了“某家庄”的存在。在古代移民背景下，以姓为名的庄更是在北京遍地开花。但和离乡背井的“某家庄”比起来，另一种“庄”可谓豪奢至极。比如这个“海淀黄庄”，实则为明代的“皇庄”，是皇室成员的庄园。更为著名的是大兴南苑一带的富源庄、寿宝庄等。

摄影／谢昊

局，出售龙票拍卖国家资产。

限购政策十分宽松，“八旗内务府以及顺直绅商仕民人等”皆可购买。京城的贵族、富商，乃至宫里太监纷纷跑到南苑，置办产业。这场晚清的圈地运动，既为了垦殖，又不乏有享乐的初衷，在皇帝家的林苑只种地，岂不是焚琴煮鹤，浪费资源。于是建一座大庄园，以期过一把皇帝瘾成为时尚。把地交给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耕种，而京城的老爷们要干的就是给每一处庄园起一个名字。他们或查古书，或用城内自己幡上的老字号，因此，各种悦耳赏心的庄园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庄和其他形式的村落，区别在于它一般依傍于广阔的农田，所以移民驻足的“X各庄”，多在可广泛种植作物的平原地区。但贵族的“庄”更切合庄的本义——草大，即草木茂盛之意。他们为享受草木园林之乐，兴起圈地运动，甚至霸占农田，让农民流离失所。所以当田连阡陌的富贵“庄”，与无立锥之地的穷苦“庄”狭路相逢时，矛盾终将爆发。

坑里水：一段“不平”事

之前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在夏季大雨中，公交售票员报站：“乘客您好，积水潭到了。下一站是——下一个积水潭。”

一系列的暴雨，让北京城掩藏于晴天时的坑洼地表，一下无处遁形。但要知道这还是路面基本硬化，且排水高度发达的现代北京城。若想想在几百年前那个缺少公共排水系统，路面还是坑洼土路的北京城，雨天会是怎样的场景？

一样的暴雨打在古老的北京城里，会让大大小小的坑洼变成蓄满水的碟碟碗碗，居民世世代代从此过，难免走得深一脚浅一脚。只要是未硬化的土地，无论怎么修补，坑洼都是常态。然而，每年的暴雨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人们对着坑洼有太多的无可奈何，索性把它放在地名里。

北京仅在城区范围，带“坑”的地名就有20个，八宝坑胡同、大坑胡同、黄土坑、苇子坑等。光重名的苇子坑就有三个，以北四环健翔桥一



带的最为知名。

坑洼坑洼，说完了“坑”，再说说“洼”。叫洼的地名在数量上并不逊色于坑。据资料记载，北京带“洼”的地名，共有36个，朝阳区、海淀区坑洼最多，分别坐拥12处和9处。当土地太洼而雨水太大时，坑洼就会进化成湖渠。今天北京的一些湖渠，就是因此得名。如东北四环一带有南湖渠、东湖渠、北湖渠等。若说湖渠二字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朝延祐三年（1316年）的湖渠村，七百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抹去这里对暴雨来临湖渠水泽的记忆。

上面说了没有被岁月填平而“陷”在今天地名中“坑”和“洼”。更多的坑洼或被改名，如曾是泥坑洼的知春里；或被百姓整容，化名其它流传下来。在通州大兴等地，会见到许多地名中带有“垡”字，所谓的“垡”是指耕地起土。这里曾是沼泽湿地，在辽金时期，沼泽干涸，于是有人来此“起土耕种”，如目的明确地起名“小耕垡”。还有一些垡，则以挥舞第一锄的农人姓氏命名，如胡家垡、朱家垡等。

地势坑坑洼洼，再因水而得名或闻名，民受其患，在名字中报以微词，然后流传到后世。今天虽然很多地方不再低洼，但地名却倔强得很，还在讲述这一座城曾经的“不平”之事。

窑中火：“窑”远不可追

今天外地游客来首都参观，总会在地图上兴奋地寻找“装垫儿台”（中央电视台），通过手机地图，找到它的位置，然后叨念着“国贸”，从四面八方奔赴这个地方。国贸如今高楼林立，还有着很时髦洋气的名字——CBD。但老北京人，一听“国贸”，可能会有些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更愿意叫它的老名字——大北窑。

作为北京最有名的“窑”，大北窑村以窑厂命名。这个窑厂是侵华日军于1939年修建，之所以取址于此，因为此处土地开阔且土质细腻，能烧出好砖。经过几年经营，这里窑厂遍布，而坐落在场区北边，有一大窑，烟囱极高，如拔地孤峰般傲视四下。这一醒目的大家伙，给南来北往途径于此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坐标物。“大北窑”这一名字声名鹊起，因而此处村落便以此命名。

大北窑过去因高大烟囱驰名东郊，今天因同样高大的现代建筑享誉世界。但相比于明清时期北京城内那些老资格窑地，他只能算个年轻却自带流量的网红弟弟。

北京带“窑”的地名很多，如刘家窑、崔家窑、鲍家窑、邓家窑、严窑、魏窑等等，顾名思义，这些地方在成为村庄聚落之前，多是烧制砖瓦的窑厂，并大多以窑厂主人的名字命名，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刘家窑。据传说，刘家窑在明朝时就已经开窑，并且闻名十里八乡。其中原因有二，一个是传了三代手艺，掌握烧窑核心科技；其二是砖瓦产品色泽好，不易碎。一旦烧出了口碑，买卖也像那窑里的炉火一样旺得不行。

我们今天看待窑地，多认为其不过是一个行业的生产单位，但在传统

积水成潭

每逢夏日雨季，北京总少不了这样的新闻：某地“看海”“水帘洞”云云。细究其由，除了排水系统的孱弱之外，还少不了一口地势低洼的黑锅。而这口锅在北京的地名中留下深刻烙印，上到海淀区，下到某湖渠、某潭、某洼，皆得名于此。当雨水过大，积水难免成潭，坑洼化作湖渠，右页图中的玉渊潭公园，前身便是蓄积而成的湖水。

供图/视觉中国





CBD的另一种解释

以国贸大厦为中心的一圈地带，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即CBD，全称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但网上有另一种调侃般的解释，更接近这片地区的近代历史面貌：China Beijing Dabeiyao（大北窑）。上世纪三十年代，侵华日军曾在此修建窑厂取土烧砖，因其中一窑的烟囱高耸醒目，竟成为这片村落的地名。北京以“窑”命名的地方不在少数，右页图为陶然亭公园内的窑台，是明清时期此处黑窑厂取土形成的高土坡。

社会看来，它的意义远非如此，而是意味着，一旦你成为窑主，就拥有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和窑地上人的支配权。作家张涛有一本小说叫《窑地》，里面就反映了一个窑地七代窑主的兴衰。相同的是，每个窑主对窑地的所有权都充满着极度渴望，因而出现了兄弟相杀、新窑主还未接手就喜极而亡的荒诞场景。有了窑地，真正成了“土”皇帝，当有些土皇帝和真皇帝攀上关系，成了官窑，甚至还会拥有治外法权。山东的一些官窑，窑门两侧会树立御赐的虎头牌和黑红棍，凡有私闯窑地并在窑地闹事者，用黑红棍当场打死，窑主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有作奸犯科到官窑避祸的，只要被窑主收留，可保平安无事。

北京虽民窑众多，但除了海淀的后窑传说是晚清为修建颐和园所建，大多为“民生工程”，炉子里的砖瓦盆罐多流向了寻常百姓家。而作为明清两代皇帝居所的紫禁城，其砖瓦是千里之外的临清特供。临清在今天山东，因其位于黄河冲击平原，特产的“莲花土”烧制成砖后，“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在朱棣修建北京城时，就钦定为“贡砖”，而后越南裔建筑师阮安在扩建维修北京城时，也多用此砖。

临清又位于京杭大运河边上，虽距北京山水迢迢，但借着运河，发扬起“勤来勤去搬倒山”的精神。除了专船运输外，规定过路官船捎带不得少于四十块，民船不得少于二十块，因而有俗谚说明清帝都是“水上漂来的北京城”，也是很有道理的。

有大窑厂的地方就有村落，因而，在“官窑万垛青烟袅”的临清，

留下了一连串以窑为名的村子——张窑、陈窑、唐窑……

窑中火渐渐熄灭，但窑外的村落生生不息。

坟上土：土馒头也非铁门槛

聊完了地名中金木与水火，领略了五行中的战争与和平。我们最后聊一聊地名中的“坟”和坟头上的“土”。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祁老人在德胜门外的土城西边儿看中了块坟地，地界大小有三亩，他典租后渐渐找补点儿钱买到了手里，厚葬了双亲。因为在城郊，地儿也还算平坦宽敞，就返租给之前的地



主常二爷耕种，每年收点租子贴补家用。他觉得即使父母在天有灵，也看不出坟前后那片“绿油油”是树木还是小麦、白薯秧子。这障眼法，很有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意思。

这是老舍小说《四世同堂》里的情节，写出了老北京坟地文化的一些特点——把着城边儿，选处阴宅，家境好的，再在周边配套田地，雇人守着，一来种地发展农业，二来守坟发展物业。但是，根据前面对四种地名聚落形成原因的讨论不难看出，一定是有巨大的政治或经济的引力，才能让百姓背井离乡，从四面八方赶来，扎根、生长出一个新的村落。所以，像祁老人这样的富农是很难支撑起一个村落，衍生出一个地名的。

但悲剧的是，有人能。他们是和祁老人同样生活在四九城的皇帝和贵族。但为什么是悲剧？因为他们看中一块地方，就如老舍先生描写得那样，“皇帝便会把他们（土地上的农民）的田墓用御笔一圈，圈给那开国的元勋；于是，他们丢失了自家的坟墓与产业，而给别人做看守坟陵的奴隶。”

由于皇亲国戚、显贵要员们家大业大，排面儿在那儿；又加之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所以会招呼很多“奴隶”来种地守坟。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村落就出来了，“X家坟”或“X王坟”就如出屉的馒头排列开来。

祁老人辛苦盘下那块祖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这里符合人们的阴宅美学——风水好。

中国古人讲究风水，何谓风水？晋代郭璞在《葬经》中定义道：“葬者，藏也，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也就是说选择的墓地要有生气。这无疑浸透着古人“慎终追远”的思想，希望能够让祖先安息，并得到祖先的庇佑。因而，古人选择阴宅，会根据个人喜好或



死人坟，生人居

北京地铁1号线西端有个公主坟站，是北京数座公主坟中最著名的一个。这里曾埋葬着清代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然而如今除了一座旧时殿宇之外，再无遗迹残存。右页图为北京大学静园内的杭爱碑，这片校园曾是康熙时期的杭爱墓地。从埋葬死者的坟墓，到人烟蕃息的居所，“坟”这种地名仿佛是联结生与死两个世界的纽带。

财力，尽可能地按照风水一板一眼地选择。

小说里，风水先生极力夸赞那地方背枕土城（北平城的前身），前面西山，主家业兴旺。贵族肯定比平民百姓更看重风水，所以离祁老人家坟地不远，就有一处显贵的坟茔——铁狮子坟。

铁狮子坟，在今天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公交站就以此命名。此处在明清时期就已遍布墓葬，从附近地名就可窥一二，南有小西天，北为太平庄，东边“铁狮子坟”，西方索家坟。到了秋冬时期，乌鸦会来此应景儿，一到傍晚，成千上万的乌鸦，遮天蔽日，很是有些萧杀、恐怖的氛围。至于“铁狮子”的得名，狮子作为镇墓兽，自汉有之，但多为石制，建国后挖出铁狮子一对，却不见了所镇的墓主人，也是颇感遗憾。因为挨着北师大，这对铁狮子就被放在北师大里，而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铁狮子被投入炼钢炉，化为铁水一滩。铁狮子坟，坟塌狮子去，只剩下地图上的坐标意义。

注重看风水的古人，怎么会想到“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他们无暇思考太久远的后世，而是把心思用在买顶级阴宅上。所以，在海淀西山和西北郊皇家园林附近一带，坟地数不胜数，看坟的村子多如牛毛——牛碌坟、瑞王坟、礼王坟、胆家坟、贾家坟等等。

还有两座坟，离西山远一些，但更出名。一座是位于玉渊潭公园西南的公主坟。因为满族公主死后，需要

单独埋葬，所以北京的公主坟就有好几个。而人们对这座坟墓主人身份投入的想象力和研究最多，虽后来确定埋的是嘉庆帝的两位公主，但“乾隆义女”说、“汉族格格”说也还在传说中很有市场，各种假说让这公主坟的墓内空间，略显拥挤。

另一座是八王坟，据说埋的是努尔哈赤的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这王爷在1651年多尔衮病死后，密谋承袭摄政王位，事泄遭幽禁，后被赐死，骨灰埋在这里，八王坟遂得名。

这两座坟相隔不到15公里，却一哀荣极盛，一落魄苍凉。但无论哀荣盛衰，以坟为名之地，在当时算荒郊野外、鲜有人烟是肯定的。而如今，许多曾经的“坟”，坟上再无黄土青草，而是种满了高楼大厦和似锦繁华。

坟上土变成钢筋水泥，估计在祁老人看来，可能比自己的地被皇帝抢走，还要想不通吧。



后记

村落这一级别的聚居单位，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行政村，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村落都被收编，村委会就是依法设立的、一切农村行政事务的集散地；不过，用另外一种即不加“村”字的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和行政村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村委会组织），还之以庄、屯、营、窑的通名“本色”，或许它们历史文化的DNA就会更容易被破解一些。

北京地名的产生，巧合地带着五行色彩，金戈铁马的军事风云、穷富庄园的草木荣枯、渠水沟壑的地貌百态、城建民生的砖瓦窑火、坟土炊烟的人事变幻……地名的历史是民族演进的化石，更是文化心理的呈现。大家不妨借屯、庄、渠、窑、坟之名，去上溯一段过往，作一番“古今多少事，都付地名中”的感叹吧。

北京地区的公主坟们


责任编辑／安洋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胡同地名里的北京

如果要给北京的历史传统找几个标签，那么，必然少不了极具特色的胡同文化。胡同并非北京的土特产，关于它的来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胡同始见于元朝，是一个来自于蒙古语的名词。其本义为“聚落”（一说为水井），当蒙古人营建元大都时，居民片区之间的通道便是今天胡同的前身。历经元明清三朝发展，北京的胡同规模蔚为大观，甚至广义上讲，所有的街巷都是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从历史上看，元末熊梦祥《析津志》称：“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明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街巷胡同约1170条。到了清代，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列出的数字为2077条。

如此多的胡同，名称也是琳琅满目，俨然一本北京城的百科全书。它们承载了北京人的衣食住行，市场买卖，宗教信仰，等等。置身于这大街小巷，或许只看胡同地名，就能体会到百年以前的北京市井生活。本页地图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最新北京精细全图》为底图，展示了部分胡同名称的来源。





人物·胡同

以人名命名的胡同超过百条，或是民族英雄如文天祥、赵登禹，或是历史人物如明初武定侯、广宁伯，或是平民百姓如商贩、小手工业者。

市场·胡同

市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肉市、菜市、灯市、花市……丰富着人们物质需求的每一个方面。主要分布在南城北部和东四、西四一带。

衣食住行·胡同

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基本内容，出行有轿子、车辇，饮食有水井，日用如盆儿，等等。所谓东西交民巷，实则是江米音讹而来。

宗教·胡同

北京的寺观星罗棋布，曾多达数百处，至今以寺庙命名的胡同仍不少于八十条。因宗教活动形成庙会，是经典的民俗文化。

机构·胡同

官府衙署、内府仓库，这些古代政府机构很多都已不复存在，但因此命名的胡同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工厂·胡同

明清为了营造北京城，留下了诸如琉璃厂、桦皮厂、台基厂、草厂等名目繁多的工厂，可见当时工程之繁重。

江南的水上密码

撰文／骆文

塘、浦、泾、浜、湖、荡、港、渠、洪、溇……江南水乡中，与水相关的地名千姿百态，互不重样。一笔一划，勾勒出破解水乡生产方式的重要密码。

洪　浦　塘
泾
荡　渠
浜　港
湖　溇

运河为名
运河清澈的水面上，倒映出嘉兴西塘古镇的面容，如诗如梦。西塘原名“胥塘”，就得名于流经全镇的这条运河——胥塘河。
供图/视觉中国



“水”“田”交响谱地名
这是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的桑基鱼塘，这一种桑、养蚕、养鱼“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即从“塘浦圩田”水利系统延伸出来。正是这种对“水”与“田”的精细运用，才孕育出“塘”“浦”“圩”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地名。
供图/新华社

横塘纵浦画圩田

作为一个从小熟读“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文艺女青年，我十分欣慰地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人。婆家在杭嘉湖平原的濮院镇，亲戚们则广泛分布在周边的小镇上。展开地图，这是一片河网密布、水道纵横的名副其实的“水乡”。带有“三点水”的地名花样百出，诸如“洪家浜”“王江泾”“芮家湾”“钱家汇”“高家洋”……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我，早已习惯了简单粗暴的“某家村”“某家庄”之类的命名方式，面对接踵而至、毫不重样的“泾”“浜”“湾”“洋”“沟”，颇为好奇。

“浜、泾都是小河沟，但浜有一边是走不通的，泾一般是比较直的……很多我们也说不出区别，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也没仔细想过。”慈祥的外婆解释说。

“还有一些叫‘塘’叫‘圩’的，也是我们这边才有的地名。”公公补充道。

“塘浦圩田？”我脱口而出。江南的历史，当然离不开赫赫有名的塘浦圩田，然而以前大多是在书本上看个一知半解，莫非现代地名中还藏着关于此的生动线索？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了。

关键在于江南的水。江南位于长江流域下游，长江水量巨大，支流众多，为江南地区带来密布的河网和充沛的水量，让这片地区变为天赐的水乡泽国。

不过水最初带来的不是沃土和财富，而是灾难与贫瘠。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描述长江下游地区：“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nòu）……无积聚而多

贫。”江南尤其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沿江滨海，既要经受江水带来的洪水过境，又饱受海水的倒灌冲刷，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早期，并不是一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福地乐土。

“治水”于是成为江南土地开发的关键。而所谓的“塘浦圩田”，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利+农业制度：在沼泽中，人为地整理出棋盘状的河网，东西向叫横塘，南北向曰纵浦。挖塘浦的土，垒筑起高高的堤岸，形成“圩岸”。圩岸外的塘浦，承担了丰年排水、旱年补水的任务；而圩岸内部的“圩田”，则可免于水害侵袭，适合居住与耕种。这就是塘浦圩田。

塘浦圩田制度，在五代时完善，终于使得江南成为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嘉兴地区至今保留着许多带“圩”字的地名，如海宁市东独圩，小村子三面环河、地势低洼易涝，旧时筑有圩堤；而钱家圩，虽已看不出河网，地名志中却留有“村四周环河，旧时筑堤御水，冠姓得名”的记录。

与水相伴的“王江泾”
这是浙江省嘉兴市王江泾镇，一年一度的“水上庙会”正在举行。这里水网密布，运河穿镇而过，人们世代伴水而生，因此“王江泾”的地名里就带有了两个“三点水”。
供图/视觉中国



泾浜



洋泾浜的历史记忆
这是1865年上海的洋泾浜。上海开埠以后，它成为英、法租界的界河，和上海内河航运的重要干线。尽管1914年洋泾浜因“填浜筑路”而消失，但以之命名的地名“洋泾乡”、中国式英语“洋泾浜英语”，却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供图/文化传播/FOTOE

洋泾浜的“冠名”与“除名”

除了“塘”“浦”“圩”外，嘉兴地区还有大量以“泾”“浜”命名的村、镇、路。婆家所在的濮院镇周边，就有“祁家浜”“北庄浜”“柳案浜”等等，都是得名于叫做“某浜”的小河。

“浜”这个字，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洋泾浜”这个颇有些喜感的词。19世纪的上海，中国商人操着蹩脚的中式英语，与外商词不达意地交流，懵懵懂懂地迈开了开埠之路。这种语言流行于当时的洋泾浜周边地区，所以叫做“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原是一条河。明清时期的上海，是江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嘉兴一样，有许多“三点水地名”。在19世纪中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洋泾浜”了。而通过追寻这条明星级的河流，或许可以看到“泾”“浜”此类河流得以“冠名”众多地名的原因所在。

洋泾浜蜿蜒曲折，东起今延安东路外滩，西至现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路口，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西连长浜（今延安中路），全长约1600米，东段宽约40米，中段和西段约60米。

在河网密布的上海，这原本只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不过随着1843年上海开埠，在洋泾浜的北边、南边，先后出现了英租界、法租界，于是这条不起眼的小河摇身一变，成为英、法租界的界河。于是乎，两岸高楼突起，人口激增，中西商贩熙熙攘攘，逐利而来。一时间，



"泾"镇"浜"路

泾、浜是圩田系统中的小河道，兴起于宋代，用于排水灌溉、水路运输。江南地区有很多带有"泾""浜"字样的地名，如上图的陆家浜路（供图/QUANJING），左图中的"枫泾"古镇（供图/视觉中国），由地名即可想象当年沟渠纵横、圩田遍布的景象。

浜上新建和翻建了不少桥梁，最多时有14座，密度之高超过上海任何一条河浜，洋泾浜也成为上海一条十分重要的内河航运干线。在这样的形势下，这周边不仅有了洋泾乡，还出现了"洋泾浜"英语。

然而在一片"洋泾浜"英语的喧闹声中，这条备受瞩目的明星河流，却在一日日变得臭不可闻。两岸激增的人口，让小河沦为垃圾场。淤泥日积月累，无人疏浚，再加上潮汐作用，黄浦江不断地灌入泥沙，洋泾浜河身越来越浅狭，水运价值直线下降。

终于，在臭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这条被时人讥为"露天大阴沟"的小河，迎来了命运最终的审判。

1914年，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与法公董局协商一致，将洋泾浜和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一段）改为大道，敷设排水系统，取代两条河浜。11月1日，洋泾浜截流封闭，停止航运，填浜正式动工。而随着洋泾浜的被填平，一条东西向的通衢大道出现在世人面前，被命名为"爱德华七世路"，音译作中文就是"爱多亚路"。"洋泾浜"甚至失去了作为路名的资格。

洋泾浜的消失，只是上海"填浜筑路"中的一环。"填浜筑路"兴起于上海租界，辐射至上海老城厢及周边地区。据研究，在开埠以后的百余年间，上海中心区被填河流多达六十余条。而当一条条河浜被大路所取代，上海也从传统的江南水乡景观，向着现代大都市的模样

圩

石坑头
李家泾桥
西去桥
袁家汇
文星桥
金
长
赵吉社
池塘
池塘
浜
庙桥
杨园墓
北总管堂
牛
杨园里
池塘
杨园祠
池塘
朝阳庙
板桥头
龙星桥
会斗里
塘田里
塘
郭璞桥
费家新桥
亭子头
圣头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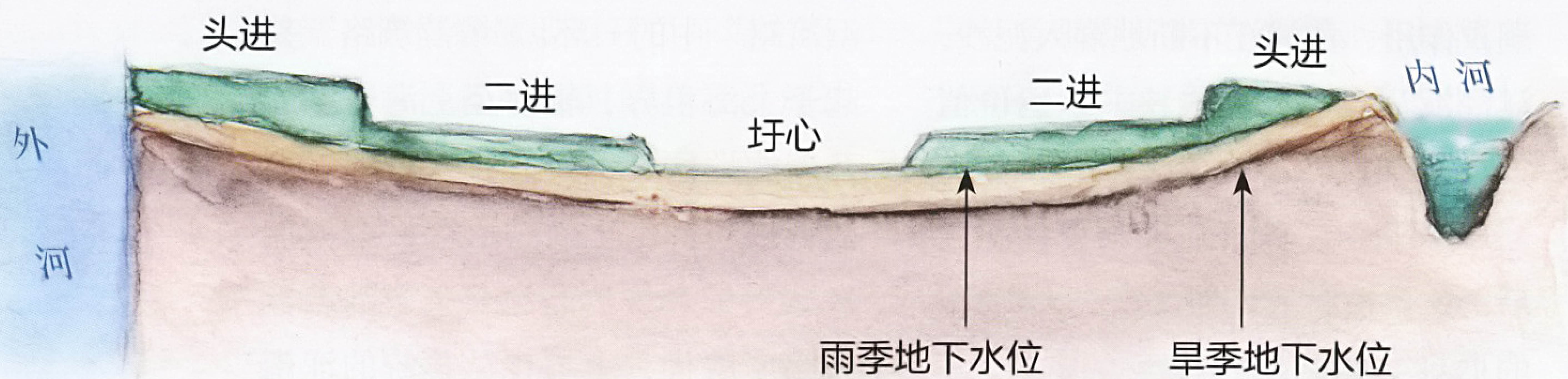
河流
主道
桑地
水田
村舍
竹园
桥
池塘
松柏
杨园里 带“里”的地名
石坑头 带“头”的地名

链接

从地名看杨园村的圩田格局

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的杨园村，处于一个面积较小的圩田之中。从如今留下的地名，能够大致勾勒出明清时期的圩田格局。地名中带有“头”“老”等字样的，一般是“圩头”所在地，也就是小圩中的“头进田”，地势较高，适合栽种桑树，建屋居住。地名里带有“里”字的，一般是圩心所在。“圩心田”或者说“里进田”位于圩田中央地带，低洼易积水，但经过治理后，也能建屋种树。

圩田纵向结构示意图



参考资料：陈恒力等著《补农书研究》、周晴《河网、湿地与蚕桑》

绘画 / 花花酱

原先居住和耕种在大圩里的农户
贪图自己出行和灌溉方便
私自在横塘、竖浦的堤岸上开挖小河道，也就是“泾”和“浜”
进而在大圩内部切割出自己的小圩田

转型。只有从后来长期存在的洋泾乡、张家浜等地名中，才能想象当年水网纵横的水乡田园情景。

水运交通价值，及由此带来的商贸价值，是小河浜向大上海贡献的无价之宝，也是它们能够“冠名”众多地名的原因所在。而它们被公路所取代，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水运功能的急剧下降。不过在婆家濮院镇这样的传统江南水乡，仍有不少泾、浜保留着固有的水运价值。

当“弱枝”取代“强干”

“反正这些小河道全都是连着的，你们外婆年轻的时候哪有现在这些公路？去平湖、去嘉善，甚至去上海，都是从咱家后面那条河上坐船过去。”公公指着屋后的一条小河，印象中是叫做“梅泾”的。梅泾畔，就有以此命名的梅泾路。

江南地区以水为路，以舟为车。“塘”“浦”“泾”“浜”不仅是排水灌溉的沟渠，也是行船运输的交通水路。比如驰名中外的嘉兴古镇西塘，原名“胥塘”，就得名于一条流经全镇的运河——胥塘河，相传是春秋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讨伐越国时开凿的。如果传说属实，那么胥塘河的开挖初衷，是便利军队运输，而在后来的农业水利、水网运输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塘”“浦”与“泾”“浜”均拥有水运价值，何以要叫不同的名称呢？这就得到它们出现的源头——圩田制度中去一窥究竟了。

塘浦圩田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勾勒出的是较大尺度的棋盘格局，被塘浦分割成的土地，一般被叫做“大圩”。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塘浦圩田的大圩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原先居住和耕种在大圩里的农户，贪图自己出行和灌溉方便，私自在横塘、竖浦的堤岸上开挖出一条条小的河道，也就是“泾”和“浜”，进而在大圩内部切割出自己的小圩田。

北宋著名水利专家郏亶曾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泾、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为白水也。”

泾浜的开挖破坏了高大的圩岸，带来令人担忧的水灾隐患，且随意性较强，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因此宋代治水者总是试图维护大圩体制，力图消灭泾浜体系，“强干弱枝”。然而灵活便利的泾浜体系，毕竟适应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且“多开沟渠”的做法，也不失为一种治水的方式。因此到了明清时期，小圩体系基本取代了古老的大圩，成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农田形态。

江南的“塘”“浦”“泾”“浜”

小地名中带有“头”“老”“岗”的
往往就是“圩头”所在地
是小圩中的“头进田”，适合栽种桑树
也适合建屋居住

之类的地名，大多数都是这段治水历史的鲜活注脚，其余如“溇”“港”“渎”等，也都是表示纵横交错的沟渠水道，与大大小小的圩田伴生，成为江南人以水勾勒出的特殊地理观念。

明清时期，在小圩体系确立之后，心思精巧的江南人，开始了对土地更加集约、高效的经营方式，又由此带来一系列花样翻新的地名。

高低起伏的花样地名

临近濮院的杨园村，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农学家张履祥的家乡。而张履祥正是玩转小圩的大行家。

村子依稀可辨的圩田格局、蕴含丰富信息的历史地名，以及张履祥以杨园村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写出的《补农书》，让这个小村子成为研究江南圩田经济的圣地。甚至在1957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还专门组织力量来嘉兴地区深入调查，对《补农书》进行专题研究。

不过张履祥原本志不在此。他从小勤于学业，刻苦攻读，15岁中秀才，完全是冲着科举入仕的前途去的。只是此后屡试不中，岁月蹉跎，不知不觉就过了而立之年。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灭亡。得知此消息后，张履祥悲愤莫名，一路狂奔，硬生生靠着双脚走回了老家。从此，绝意仕途，息交绝游，隐居乡间，做起了明朝的遗民。

张履祥的隐居生活是这样的：“耕”“读”并行。教书之余，亲自经营农业。在他看来，这叫“务本”，是读书人该做的事。每到农忙时节，他甚至会停馆主持收种，或率家人下地劳作。他还常常与老农交谈，从中获取各种鲜活的农业知识。47岁那年，张履祥终于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补农书》，详细总结了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

如今，根据《补农书》的记载，现有的圩田遗迹，和杨园村流传下来的地名，我们还可解读还原当时圩田生产的诸多细节和秘密。

杨园村处在一个面积较小的圩田之中，圩岸是大运河支流金牛塘的塘堤。紧挨金牛塘的圩田，地势稍高，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圩头”。小地名中带有“头”“老”“岗”的，往往就是“圩头”所在地，也是小圩中的“头进田”，适合栽种桑树，也适合建屋居住。如杨园村的“石坑头”“亭子头”等，以前均种有大片桑树，也是村舍所在地。

一般来说，“头进田”与“二进



田”排灌条件好，而“圩心田”或者说“里进田”则因位于圩田中央地带，低洼易积水。在嘉湖平原圩田区，一般地名里带有“里”字的，往往都是圩心所在地。如1950年代的杨园村，仍有叫打炉里、塘田里、杨园里的小地名，提示所在地特殊的小环境。

圩心田的开发，需要比头进田花更多的心思。张履祥在《补农书》里帮友人策划了一处圩心田的开发，方法是疏浚与圩心田相连的溇沼，深挖溇港（溇港：为了防洪防涝而开凿出的一条条规划有序的河流）以加强排水，挖出的土垫高房屋地基，这样就可以“筑室五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悠然自得与圩头无异。

地势更为低洼地区如湖州菱湖镇，村庄几乎全被河港、漾荡包围。水中较大面积的高地为“墩”，一般是村舍聚落之所在，如菱湖镇西北的竹墩村，就是由建于姚家墩、南墙门墩、沈家祠堂墩等6个墩之上的村舍组成。在叫“墩”的高地上安村建宅，种桑植树，而低洼处，则是水产养殖业的宝地了。

顺着那叫“敦”、“头”、“老”、“岗”、“里”的地名，可描摹出当年圩田间的高低起伏；顺着“塘”、“浦”、“圩”、“泾”、“浜”的流向，可勾勒出大圩、小圩的格局和水路运输的脉络；而从那成千上万与水相关的地名——湖、荡、港、渠、洪、溇……可见江南与水几千年扯不断的牵连，鱼米之乡细腻精致、充满智慧的小农经济。地名不仅仅是地名，而是一组组破解水乡经济秘密的密码。

水样地名
绍兴安昌古镇，一位村民正在河畔晾晒鱼干。江南水乡的村镇中，人们不但沿河而居，也沿河做生意。或许正是这样与水息息相关的生活，才让这里的地名充满了“水”的痕迹。
摄影/青简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最“奇葩”的地名

撰文／李怡淙

大多数地名，都有着吉祥文雅的寓意，有些地方却反其道而行，偏偏以“另类”的字词命名，令外乡人印象深刻。如果评选一个最“奇葩”的地名，你会为哪里投上一票呢？

地名之最

“奇”在何处？
《中华遗产》杂志在官方微博上，面向读者做了一次各地“奇葩”地名的征集活动。令人捧腹与意想不到的名字出现了。究竟什么样的地名才算奇葩呢？哪个又最奇葩呢？恐怕没有标准，但看了上百个地名之后，总结出了几种类型：恐怖、谐音、恶俗、令人摸不着头脑或与现代网络用语重合等等，不论属于哪种类型，这些地名总叫人过目难忘，图为江苏常熟翁家巷门上的壁画，它的路牌正镶嵌在壁画当中。
摄影／邵小峰

“井”字村的难过

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乾安县，有不少以某字井为名的地方。这些地名的存在不过100年。

1926年4月，时任吉林省长的张作相与人商议，决定勘地招垦。勘测时，人们有计划地以3公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称为“井”。丈量完毕后，全县整井274个，无法构成边界方正的“破井”35个。

这么多个井，要租给农民们开垦，可很多地方却连个名字都没有。张作相便采纳了一个特别的命名方式——按照“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中国传统书写习惯，以《千字文》排列村名。同音字、近音字只取一个，不详、不吉、虚词、数字都跳过不用。使得乾安地名成为了地图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据说某一年，吉林省乾安县一位新上任的乡长来到过字井，计划分别在村中的南北两个自然屯——“南过屯”与“北过屯”视察备耕生产的情况。刚一进村，乡长就友好地拦住一位农民问：“老乡啊，这儿是南过吗？”

谁料，这位乡亲满不情愿地回答：“俺们屯比那个屯建得早，不叫南过（难过），叫老过。那边也不叫北过，叫新过。”

此地“有味道”

现代都市中最爱干净的男男女女行走在重庆时，可能会突然一惊，因为眼前的路标分明地写着——“粪草湖街”。看看“粪草湖”，再看看如今整洁的道路，这座美丽的山城为什么会有如此有失风雅的地名呢？

“粪草”二字虽难登大雅之堂，来历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里本有一片水域，大慈寺中的粪船从这片水域进入金水河；有人说“粪草”是西南方言中“垃圾”的意思，所以粪草湖实际上是垃圾池。编著《成都街巷志》的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则结合民间传说作出推断，认为这里曾经是运送马粪的地方。

其实，粪草湖街并非山城唯一一处“臭名远扬”之地。除它以外，更有三处“臭毛屎”分别位于锦江区和彭州市。“毛屎”是“厕所”的方言，在民间传说中，“臭毛屎”所在

黄粱梦镇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宝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托里县

奶子房
北京市朝阳区

尼玛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庞光镇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

仙女镇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菊花村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绝望坡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

大纱帽巷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死人沟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

火星村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六月冻死鸡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奇葩地名的过去

贵州省贵阳市，有条“粑粑街”（图1，摄影／崔忆东）。这个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来自贵阳洋芋粑粑、甜酒粑粑等小吃。另一种说法是这条街形似糯米粑粑，故名粑粑街。

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个网红路牌，上书“猪头巷”（图2，供图／视觉中国）。因古时巷内居民多以加工、出售猪头肉为业。

吉林省长春市有条胡同的名字带着童年的味道——冰淇淋胡同（图3，摄影／小米），据当地人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区域内有一个大型的冰糕冷饮厂，或许胡同的得名与此有关。

杭州有一著名的站牌——“立马回头”（图4，摄影／谭易成），相传，乾隆到杭州时，对普福岭破败的山路不满。于是地方官将其修整好，等乾隆在此经过时，很是赞赏，于是立马驻足，故名。

南京新街口附近有个“螺丝转弯”（图5，摄影／陈春雨），此地原本作“罗寺转弯”。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路曲处乃铁塔寺墙脚，寺旧名罗寺。此路值其隅角，故曰罗寺转湾（弯）耳。”后讹传为螺丝转弯。

地，曾是某大户人家的厕所。而据家住锦江区的市民描述，“臭毛屎”附近曾常有农民拉粪经过，将粪水洒在周围。如今，这令人掩鼻的场景已经消失不见，唯有地名还能引发老人们儿时的记忆。

若说重庆的这些地名反映的是旧时居民的生活状态，有些“臭臭的”地名更有深层的经济原因。比如自贡的“牛屎巷”“牛屎山”可不少，究其来源，竟与井盐开采密切相关。自贡的盐卤资源非常丰富，其开采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规模。当时盐场所依赖的动力除了人力便只有畜力，牛在采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被民间形容为“山小牛屎多，街短牛肉多”。牛屎能烧火、能施肥，于是源源不断的牲畜“副产品”，就在自贡的街巷摊晒、售卖。此般“景致”与直白的地名，既折射出当地盐业的兴盛，又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民间智慧。

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还有一些地名已远远不止于不雅，甚至是不祥。浙江宁波有“尸骨坪”，湖北远安县有“尸坊垭”，湖南醴陵县、四川自贡市还有“尸骨坡”……这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常规”地名背后，又有怎样的血雨腥风？

以“尸”为名的中国地名鼻祖，自然要数河南偃师市的尸乡，《史记·田儋列传》中记载，秦末起义首领田横不愿归顺汉朝，曾“至尸乡厩置”并最终自刎于此。然而在古时，“尸乡”与死亡、杀戮其实并无关联。古人眼中的“尸”字，指代表亡灵参与祭祀活动的人，东周时期，一批周召公的后人迁居于此，并以“尸”为氏，丝毫不以为阴晦。直到汉字简化后，“尸”与旧体字“屍”画上等号，才被赋予死者身体的含义。“尸乡”的名字，也让不明所以的当代人感到惊悚刺激。

可是除了尸乡，还有很多带有“尸”“死”“骨”一类字眼的地名，它们又作何解释？民间习惯于根据当地的景物特色来创造地名，那么这些地方，是不是如我们想象一般，曾经尸横遍野、白骨森森？

事实上，有些阴森的地名，的确记录着那片土地上惊心动魄的过往。昆明五华山的“篦子坡”，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处死的地方，从此以后，百姓根据谐音将其改作“逼死坡”。长沙南郊醴陵县的“尸骨坡”，据考察为中南军区第六预备医院旧址，曾安葬着许多医治无效的革命烈士。也许这些牺牲太震人心魄，后人才选择用地名来铭记。







奇在费解

在遥远的边陲之地，还有一些独特的地名。它们的“奇葩”之处不在于不雅，也不在于不祥，而是在于——不懂。

“阿究王底”是什么地方？“老姆登”又在哪儿？想不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连地名也需要破译。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寥寥几字的地名中包含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民族杂居的特征也在地名中得以体现。例如“阿究”是怒族所使用的怒语，而“王底”是傈僳族的语言，两个词都是坪地的意思。“老姆登”中的“登”在白族共用的白语中是“地”的意思，直译过来就叫“紫竹地”。在接受汉语影响后，这些少数民族地名逐渐被转译，才形成了现在“无厘头”的样子。

东北的满语地名则是另一种奇特了，他们往往让人“不懂装懂”。看到一座“兔子牙山”，你可能会觉得小清新？实际上“兔子牙”指的是老虎徘徊的地方，运气不好则会一命呜呼。路过“滚蛋沟”，你心想当地人怎么这么不文明，而“滚蛋”其实形容的是浪花翻滚的样子。“马屁股”呢？明明是满语中的“马萨红”，也就是山沟的意思。在东北，就连那些看似很吉祥的地名，也并非字面上那样美好。比如你觉得“元宝沟”抒发了对致富的向往？不，“元宝”是满语中的一种猫头鹰。“欢喜岭”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种植毒药——白附子的地方。面对这些地名，谁还敢说自己看懂了？

当然，这些不雅、不祥、让人费解的地名虽“奇葩”，却也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情感的烙印。你若问一个老重庆要不要改地名，他十有八九会对你说：“咋个叫都不丢人嘛，习惯就好咯！”

责任编辑／黄鑫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最吉祥的地名

地名不仅仅是路旁的指示牌和地图上的标识，它如同人名一样，附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是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向往。所以，在给县市命名时，往往带上祥瑞、祈福之意的字词，以求吉利。





责任编辑/张舒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会员招募

热线：4006-521-360

杂志会员价

	1年 （2018）	3年 （2018—2020年）
《中国国家地理》	360元	980元 ~~（原价1080元）~~
《中华遗产》	360元	980元
《博物》		
《中国国家地理》+《博物》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博物》		

付款方式

方式一：网购（支付宝 / 网银 / 微信）

1. 地理商城

http://store.dili360.com

2. 淘宝旗舰店

http://zhongguoguojiadili.tmall.com

3：中国国家地理微店

方式二：银行转账

账号： 110060210018170104758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开户名：北京翰林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为便于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请把转账凭证及收件人的联系方式和所购产品信息一起传真至 010-64859755

方式三：邮政商务汇款

商户客户号： 111310100

商户名：北京翰林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手机淘宝扫描


微信扫描

注意 杂志社接到读者反映：有不法商贩电话推销本刊，在支付刊款后却收不到书刊，造成财产损失。故此提醒读者，请到杂志社认证发行渠道购买，或致电杂志社服务热线 4006-521-360 确认。

杂志订阅卡



《中国国家地理》订阅卡

包含 12 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负责邮寄。为企业和个人准备的可以享用整年的问候，持卡人只需刮开密码就可自行激活卡片并完成下单，杂志每月寄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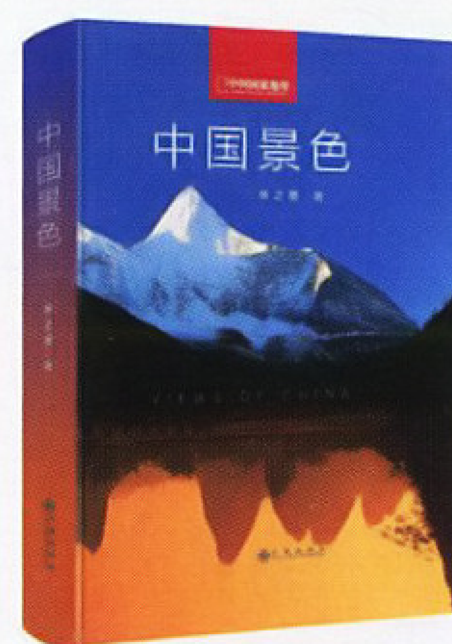
售价：360 元 / 张

《博物》杂志全年订阅卡

（含 12 期杂志、12 次快递费）

售价：180 元 / 张

销售排行榜



中国景色

页码 ※351 页
开本 ※16 开
纸张 ※ 彩色铜版纸
装帧 ※ 软精装
定价 ※68.00 元
会员价 ※55.00 元



中国美色明信片

开本 ※64 开
纸张 ※ 彩色特种纸
装帧 ※ 精装
定价 ※59.60 元
会员价 ※49.80 元



中国纸专辑 + 传统手工纸文创

开本 ※16 开
纸张 ※ 彩色铜版纸
装帧 ※ 软精装
定价 ※60.00 元
会员价 ※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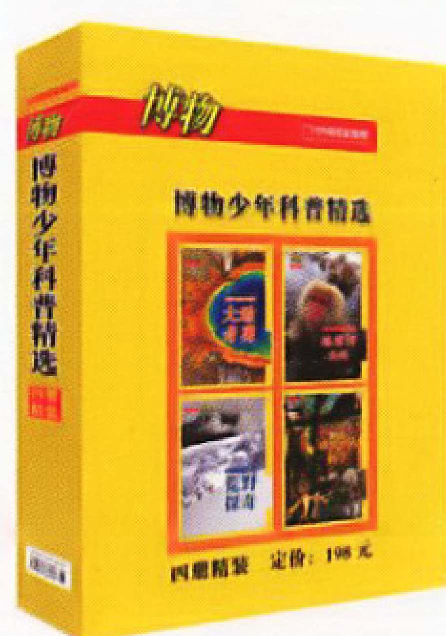
销售排行榜



雄浑大西北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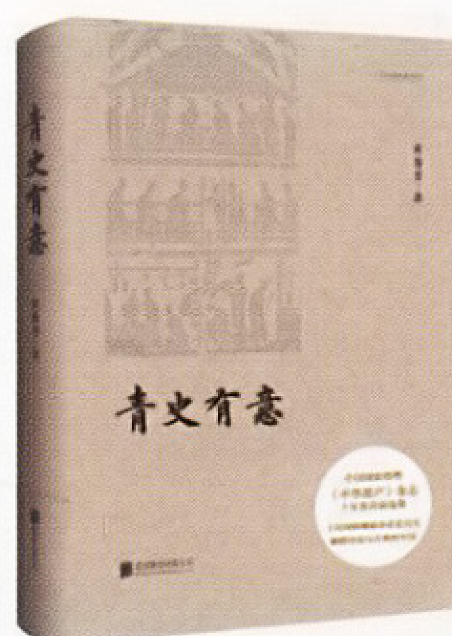
西北五省区专辑：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

页码 ※1376 页
开本 ※16 开
纸张 ※ 彩色铜版纸
装帧 ※ 精装
定价 ※299.00 元
会员价 ※269.00 元



博物少儿科普精选

开本 ※16 开
纸张 ※ 彩色铜版纸
装帧 ※ 精装
定价 ※198.00 元
会员价 ※17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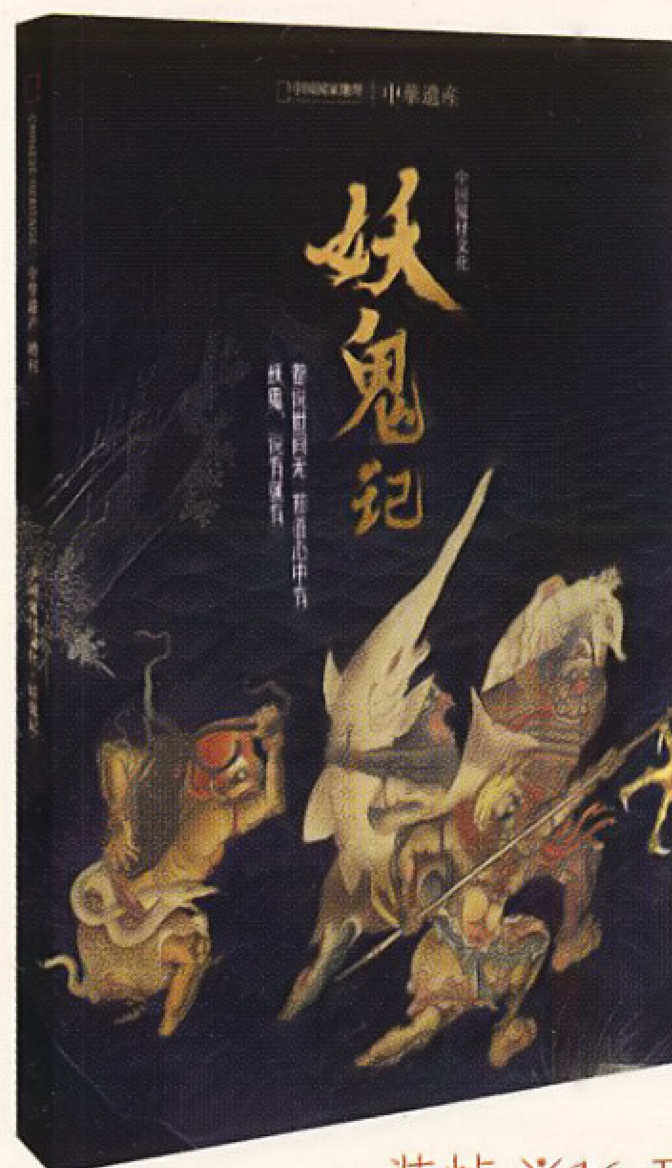


青史有意

《中华遗产》杂志近十年卷首语精选

页码 ※314 页
开本 ※32 开
纸张 ※ 彩色特种纸
装帧 ※ 精装
定价 ※68.00 元
会员价 ※51.00 元

《中华遗产》2018 隆重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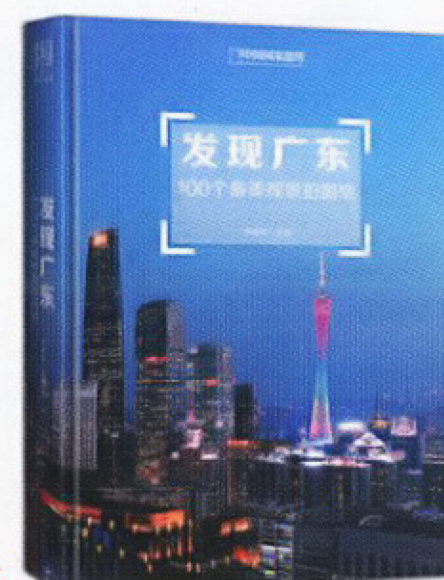


《中华遗产》杂志"鬼文化专辑""妖怪专辑"系列新编合辑，绝版重现。《阎罗》、《城隍》、《僵尸》、《最怕妖怪"有文化"》等新增文章，倾力奉献。全册共 296 页，附精美插画。


淘宝扫码购买

装帧 ※16 开 ◎软精装 ◎ 296 页 定价 ※68.00 元 会员价 ※61.20 元

《发现广东：100 个最美观景拍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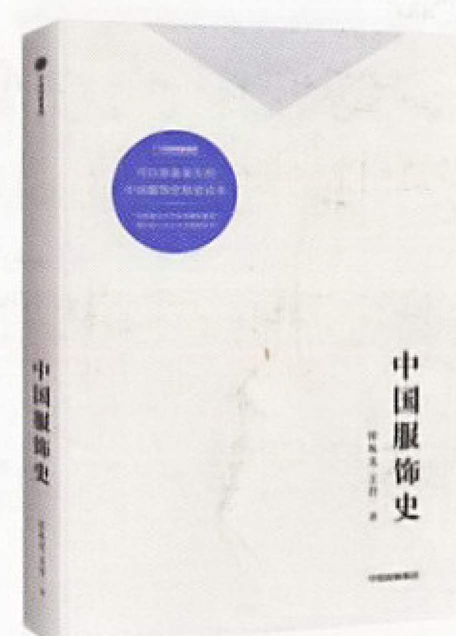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地理》原创团队、签约摄影师合力再创作，继广受好评的《发现四川》《发现内蒙古》之后，"发现"系列图书又一扛鼎力作。本书不仅有 500 张美图，还有关于广东旅游摄影的更全指导攻略。

主编 / 李栓科

装帧 ※16 开 ◎精装 ◎ 424 页 定价 ※88.00 元 会员价 ※52.00 元

《中国服饰史》



本书从原始社会讲起，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和近代，将中国主要历史时期的典型服饰娓娓道来；凝练文字配合数百幅插图，呈现中国传统服饰的丰盛世界。

沈从文 王㐨 / 著

装帧 ※32 开 ◎ 169 页 定价 ※68.00 元 会员价 ※51.00 元

《历史的底片》



20 世纪是摄影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本书即是一部通过影像来记录社会历史的摄影作品集。它浓缩了 Corbis、Bettmann、Sygma、合众国际图片社作品精华及普利策获奖作品，展现了自 1900 年以来人类在战争、灾难、科技、文化、时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过往，并讲述了每幅影像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柴继军 / 著

装帧 ※8 开 ◎ 320 页 定价 ※238.00 元

《博物少年百科·了不起的科学（第 3 辑）》



专为 7-12 岁中国孩子定制，精选《博物》杂志 14 年专栏内容，涵盖《博物》微博 900 万粉丝最关心的主题，激发孩子们对自然与科学的兴趣。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通晓天地万物的"博物君"！

许秋汉 / 著

装帧 ※ 平装 定价 ※196.80 元（全六册） 出版时间 ※2018 年 8 月

国宝录 The Files of National Treasures

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商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摄影／李一